

目 录

孙中山先生在桂期间对柳州政事的指令……陈铁生整理	(1)
西安事变后白崇禧在柳的一次表态讲话……彭 德	(5)
桂平抗击日寇亲历记……张正明	(6)
蒋桂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柳州城防工事建设 ……刘雄 蒋霖供稿 邓运光作图	(10)
热心地方文史工作的老先生……肖泽昌	(13)
血溅龙城恨难休 忆抗战初期日寇轰炸柳州的罪行……于辉云	(14)
日寇铁蹄下的柳州……梁祐章口述 彭德整理	(17)
两个局长的悲惨遭遇……董成熙 梁镇海	(21)
柳州沦陷期间见闻……肖 焜口述 彭德整理	(22)
汉奸石补天在柳罪行录……韦秉康	(24)
柳州沦陷时，柳江、柳城、雒容三县边境对日斗争片断 ……蒋 霖整理	(26)
柳城大湾抗敌回忆……全洪方	(34)
洛崖抗日游击战忆旧……秦永固	(36)
铁蹄践踏沙埔街……全树茂整理	(41)
沦陷时的沙埔……刘克武	(42) ✓
沙埔记事……张宏德	(45)
抗日时期柳州机场扩建见闻……梁 材	(51)

抗战期间有始而未能善终的筹建柳江大桥始末	阎维端 吴陵 (54)
抗日时期的柳州图书文具业.....	盛德萱 (60)
抗日期间兴起的柳州钟表业.....	许待安 (65)
柳州市镜画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	覃宝峰 (75)
抗日战争前后的柳州银楼业.....	刘郁卿 (77)
柳州沦陷前后工商业疏散概况.....	刘郁卿 (85)
柳州盐史.....	谢贤修 (91)
抗日初期柳州文化界的救亡活动.....	陈雄子 (97)
抗战时期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迁柳复课的经过	黎远明 (103)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在柳活动概况.....	刘 雄 (105)
柳江县救济事业协会的一些情况.....	刘启煥 (110)
柳州光复后的失依儿童收容所和育幼院	蒋 云 蒋宝智口述 蒋霖整理 (113)
行知公学的前前后后.....	邓凡平 (117)
柳州私立克强小学沿革.....	陈显达 (127)
金田抗敌史料一束.....	莫兆端 (131)
抗战时期柳州沦陷前夕的回忆.....	黄克群 (134)
抗日时期的柳州制革厂.....	卢钟明 全炳礼 (137)
柳州沦陷时保二团的撤退和在宜山作战溃散的经过	谢贤修 (139)
柳州市被日寇焚烧破坏图说.....	彭 德 (141)
解放前柳州的兵工厂.....	彭 德 (144)
质疑·订正·补充.....	(146)

孙中山先生莅桂期间 对柳州政事的指令

陈铁生 整理

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四月，是孙中山先生莅临广西，筹备北伐的日子。这段时间，他从广东经梧州入广西，行程在梧州——南宁——梧州——桂林之间。其中又在桂平、昭平、平乐、阳朔等地停留或视察、或游览，并在各地均有演说，以期唤起民众，共谋壮举。最后把北伐大本营设在桂林。

据上所计，孙先生筹备北伐期间到过的广西市、县达七个之多，唯独对于柳州，大约是戎马倥偬和不在行程计划之内的原因，所以尽管其为广西重镇，地位显要，却始终没有到过和驻留，柳人至今引为憾事。不过孙先生在此期间不仅对柳州地方政事有所指令，还曾派人到柳处理过问题。

那次处理的是唐继尧不服命令，破坏北伐行动一事。唐氏原为云南大军阀，一九二一年春被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驱出云南后，流落香港。因唐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孙先生为团结力量，一致对敌，遂于到桂林后，邀唐赴桂商议北伐大计。十二月四日，唐继尧由香港到广州，五日抵梧州，在梧发电孙先生：“……兹拟休息一、二日，即便按程

前来，面聆教诲，谨先电闻，维冀鉴察。”孙先生收到电报后，即发电通知桂林、柳州各县文武：“遇唐氏过境，妥为保护。”谁知唐说要到桂林只不过是虚晃一枪，他的目的是为了到柳州。原来柳州当时驻有唐氏部下张开儒率领的滇军一部，唐利用了孙先生的信任，堂皇地到柳州，要策动这部分滇军打回云南，以实现其重新割据的野心。十二月十四日，唐氏抵柳，连日在柳检阅滇军，并召集将士会议，决定“先求云南局面之稳定，然后决行北伐……”，公然不听孙先生的指挥，搞起分裂来。一九二二年元月五日，唐甚至通电要在柳设置总司令部。孙先生为了劝阻唐在柳设总司令部，密谋回滇，于元月七日派员一名赴柳，催促唐尽快到桂林参加北伐军事会议。被派者为当时北伐警卫军司令龚师曾，同行还有一人，乃李烈钧的参谋本部参赞耿毅。龚师曾是这样回忆他赴柳办事经过的：

“行前我们向孙大元帅请示，他对我说：‘你去柳州劝唐不要回滇，还是一同北伐。顾品珍问题，是我们革命内部问题。如果顾在滇政绩不好，俟我们底定中原，只须一纸命令，即可解决，现在我们的兵力，应该用于铲除北方军阀。’我说如唐提出意见，再行电请训示。孙大元帅说：‘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我都可采纳照办。’我与耿毅到达柳州后，即向唐继尧陈述孙大元帅意旨，并多次劝他不要回滇。詎料唐坚决率师回滇讨顾，又说：‘请你对孙大元帅说，仅须给我三个月时间，我到滇布置后，即当率师由黔出发，协同北伐。’我们回到桂林，向孙、李报告后，孙大元帅极为震怒，遂下令各军沿途截击唐部，并与李烈钧商量分

化各部滇军，使其不为唐用。”

由于唐一意孤行，强率滇军回云南，孙先生于二月廿三日急电马君武，刘震寰等人：……当此大军北伐之时，西南皆一致讨贼，唐继尧身虽在野，自当以其力所及者为国驰驱。自希图回滇之事发生，本大总统犹电令来桂，盖深惜其为奸人所惑，思有以启其悔祸之机……本大总统之优容如此者，无非为国家惜有功也。旋闻唐继尧行抵柳州，擅设总司令部，私自委任军长、近更调遣军队，自由行动，假名筹备北伐，实冀反戈回滇。兹得确讯，唐继尧已率队取道河池，向东兰、凤山一带前进，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若不迅予制止，势将妨碍北伐进行，而扰乱地方，为害何极。特再通令，着各该省长、总司令等，迅即严行制止唐继尧前进，毋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切切。此令。大总统。梗。”（印）。但最终未能制止唐的行动，唐于三月廿二日回到昆明，重新窃踞云南军政大权。

孙先生对唐继尧的一系列行动，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豁达大度，以及革命第一，个人感情服从革命需要的崇高品质，而唐氏的率兵回滇，削弱了北伐力量，拖延了北伐进程，罪不容诛。

孙中山先生对柳州政事的指令当不止此，他还任命了刘玉山为柳州警备司令。当时广西匪患严重，民不胜其扰。孙先生为解民困，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电令军队在广西各地清匪患，其中令刘震寰负责思恩、柳州、庆远等地，统限一个月肃清，大大地削弱了广西匪氛。

从以上所举的事例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莅桂期间虽末

到柳，但他对柳州仍是重视的，他对柳州政事处理的详细情况，有待更深入的挖掘收集，以充实、完整这段史实而告慰于柳州人民。

资料来源：《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

《孙中山在广西纪念文集》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西安事变后白崇禧 在柳的一次表态讲话

彭 德

西安事变后，桂系军方首脑白崇禧于十二月十七日赶到柳州，召集全市各界万余人，在桐油山下广坪（今市一中学校里广场）讲话，专题为广西军政当局对此非常事件明确表态。笔者当时作为制弹厂徒工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过去开大会一般在体育场（今中山东路52号原市人委大院）举行，这次为何选择这处新地点？因为体育场四周尽是民房，不利防备安全措施。当天上午驻柳第七军部早已派人上山搜索清野，在山顶布置岗哨警卫，可见当时情况之格外紧张。

白崇禧说到：“……南京方面决定讨伐张杨，决定派飞机轰炸西安。这两个决定都不妥当。张杨一贯倾向共产党，逼虎跳墙，说不准张杨会先收拾蒋介石，然后带兵就近投奔延安；轰炸西安嘛，炸弹落下来，说不准先炸死蒋介石。蒋介石现在处境是万分危险的！我说不愿在这个时候杀掉他，因为他统领着许多直属部队。如果蒋介石死了的话，别人掌握不起来，弄不好他们就会鬼打鬼，自相残杀，造成天下大乱。各省各地也是矛盾重重，虎视眈眈。那时候大家互相攻

桂平抗击日寇亲历记

张正明

一九四四年秋，当防守桂林紧张备战之际，第四战区长官张发奎，根据蒋介石关于“死守全州、桂林、柳州各三个月”的指示，着手调遣和新编组部队，作好对柳州的防守部署工作。他除指挥粤系之第六十四军（军长黄涛）及第三十

（紧接上页）击混战，谁胜谁败，都是损伤我们国家元气，好了日本帝国主义。

“事变以后，西安同外界断绝了通讯。现在有消息说，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延安派出代表去西安协商。南京方面也派了外国人端纳（他原来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认识张学良）去西安进行营救。蒋介石还没有死。张杨提出八项主张，只要蒋介石肯答应，马上就送他回南京，实现抗战大业。”

白崇禧说：“我们广西方面，去年六月已经兴师出湖南，请缨北上抗日。蒋介石压制我们的爱国行动，没去成。现在只要他承认抗日了，我们仍是拥护他。我们拥护他抗日，不是同他妥协。我们的让步是有道理的：比方运动员跳高、跳远，一定往后退几步，然后一鼓作气往前冲，才能跳得更高、更远。”

当天，白崇禧的讲话长达两小时，这不过是其中的小部份，仅凭记忆节录。

五集团军邓龙光部之第六十二军外，另有由第十六集团军副司令周祖晃指挥之武宣守备队的一个正规师和两个临时编组成的纵队（相当一个师）。他们是三十一军的一三五师（师长颜僧武）和广西绥靖主任公署（简称桂绥以下同）之独立第一团（团长郭槐邦）、独立第四团（团长周兢）及一些临时配属部队与一个保安团（这个保安团始终未来归建制）编组成的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姚槐，参谋长张正明，纵队代号为“砺山”），和以第二第三两个独立团及一个保安团编组成的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唐纪，纵队代号“带河”），守备队指挥部设在武宣县城。姚、唐两个纵队于十月初在柳州仓促编组完成后，第一纵队于十月十八日左右由柳州出发，日夜兼程，经象县、武宣向平南、桂平方向前进。十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桂贵石龙，正拟在该地占领阵地之际，据报日寇已在桂平县东南之蒙圩及西山后之赵里坳附近构筑工事。我们判断进占桂平之敌（番号及兵力不明）是以桂平为据点，以掩护由平南向柳州进犯之敌（第二十三军第一〇四师团、及独立混成二十三旅团）的侧后安全。一纵队立即向桂平县城推进。十月二十七日到达石岗村，开始展开，以独四团为右翼队，担任对赵里坳之敌阵地攻击；独一团（缺一营）为左翼，担任对兰山高地之敌阵地攻击；独一团之赵焕营为纵队的预备队，利用夜间接近敌阵地，二十八日实行拂晓攻击。敌人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我纵队两个团多系老兵，而独四团全是美式装备，并经美国顾问亲自严格训练过，战斗力较强。特别其“六〇”迫击炮的射击，准确性较高，为日寇所重视（我纵队转移到河池县九圩时从自卫队解

送来日俘口供得知这情况)。从接触开始，在整个作战过程中，盟军空军飞虎队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飞临敌阵地上空，进行扫射（因石山地少投弹，而对蒙圩敌阵则扫射和投弹轰炸同时进行）。因敌人利用山岩或石隙作掩体，无法给予他多大损害。我军士气旺盛，官兵作战勇敢，但因缺乏重武器（纵队只有临时配属一个“八二”迫击炮排）敌人利用坚固阵地顽强抵抗，我始终未能攻破敌阵地。因此，双方成胶着状态。直到我纵队奉命作战略转移前两天，我独四团海代清营长身先士卒，率部向敌猛攻，一度冲进坳口敌阵内，但因受其预为设伏在坳谷两侧之火力扫射，旋被迫退出坳口，归回我原阵地。敌我激战兼旬，到十一月七日，我纵队奉武宣守备队电令，作战略转移（在这之前两日找到前线指挥所，姚司令面谕谓：据报唐纵队已后撤，我们应作好应变准备），我部始于当晚利用夜暗脱离火线，向桂贵石龙出桐岭来宾县方向撤退。当时撤退行军部署是独一团在前，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在中间，独四团在后。姚司令亲自指挥独一团第一营为前卫，由于当时战地雨多，兼在农田小道地区行动，道路泥泞，又是黑夜，大部队行进甚是迟缓。当晚十时左右，部队到达桂贵石龙附近，姚司令指挥之前卫部队已先到达预定集中地点，并告诉我说：前面情况不明，莲花坳口有篝火和许多人在吡呀狂叫。我与姚司令交换适才发现我部队行进时之右侧数百米处有火光时隐时现的情况，判断是日寇已先我占领莲花坳口，即决定改变行军计划和行军部署，以独四团在前，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在中间，独一团殿后，绕道突出重围。不幸的是，在我改变行动计划时，一些官兵不

明真象，争先恐后地狂奔乱跑，部队秩序顿时紊乱起来，有一小部分失散官兵与我独四团发生误会，作了短暂时 间交火，整个部队秩序都乱了。独四团已迅速先走，我率领司令部及独一团在山岭中摸索行进，至八日拂晓始 到达勒 马对岸。正在渡河间，我盟军飞机两架在渡口上空盘旋，飞机见我陆空联络符号后，始向西南方飞去。我整理队伍继续向来宾迅速前进（此时始发现有许多行李辎重在突围中落下悬崖深沟间去了）。就这样，我们这个纵队虽不打败仗，也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是我对部队转进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造成，是有责任的。

附记：

1、对桂平日寇攻击战，是八年抗战中桂林防守战后的最后一次战斗，历时亦仅两个星期左右，在八年抗战中只是一个小战役，人们很少重视，迄今已发表的文史资料中尚未见此项记述。但因时隔数十年，对这一战役的实况，多已淡忘，而亲身参与此一战役的人，健在的已不多。此稿之作，旨在抛砖引玉。希知情同志指正！

2、当十一月七日晚上我部队后撤时，在我部队行进路线右侧数百米地方发现时隐时现的火光，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奸为日寇作指示目标的联络讯号，中国人而受日寇利用，来害中国，这说明国民党政府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而在八路军战区则未听说有这种情况，从而使我深刻体会到“人民战争”（群众战争）只有相信、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共同战斗，才能起到真正的群众战争的作用，而保证战争取得胜利！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写于柳州

蒋桂战争和抗日战争 的柳州城防工事建设

刘雄、蒋霖供稿 邓运光作图

（一）蒋桂战争时期

民国十八年（1929），桂系主力部队第七军、第十八军、第十九军（军长分别是夏威、陶钧、胡宗铎），在湖北宜昌被蒋系中央军包围，全部缴械。李宗仁、白崇禧只身逃回广西老巢，重整残部，扩充武装，以图东山再起。

民国十九年（1930），冯（玉祥）、阎（锡山）联合李、白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冯、阎战败，桂军于北上途中，在湖南再受挫折回广西，继续整军经武，等待时机。

那时，李、白为了巩固广西这块地盘，锐意加强防卫能力。鉴于柳州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他们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特派南宁军校工兵科长刘勤、交通处长蓝香山到柳州与驻军第七军共同筹划构筑柳州地区城防工事，工程浩大。混凝土工程由第七军工兵营负责。土方工程则征集柳州城厢镇后备队壮丁负责。笔者刘雄当时任屏山镇镇长，亲率后备队壮丁参与土方工程，全部工程历时半年完成。施工期间每个壮丁每日发给伙食费银毫四角。该工程所有地堡掩体全是混凝土结构。战争防御壕宽三米，深三米，甚为坚

固。工事分布如下（用现地名）：

1，柳州以北地区：黄村以北，白露以南—木材场—柳州第二安装公司—长林公园—经编针织厂—柳州纸制品厂—白沙村。如今保存下来能见到的碉堡有木材场的两个，柳州纸制品厂三个；白沙村二个。

2，柳州南岸西南地区：航空站—大门西南山麓—火车站—第二空压机厂—电机厂—红庙木器厂—中药厂—鹅岗桥。现二空旁民房内仍保存有遗迹。

3，柳州南岸东南地区：西江造船厂—金鸡岭坳—食品厂—味精厂—第八中学—箭盘山—铸造厂—猪头塘—窑埠—柳州烟厂—马鞍山东侧—乐群小学—柳州一中—糖果厂—开关厂—制药厂。

4，张公岭：岭顶有永久性地堡、散兵壕，四周战车防御壕环绕。现均保存下来。

5，马鞍山、鱼峰山，两山山顶均构有堡垒。

（二） 抗日战争时期

1944年8月，衡阳失陷，日军分两股进犯广西：一股沿湘桂铁路南犯；一股自粤、桂边境西犯。黄沙河、龙虎关相继失守，桂林、柳州告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急命柳州地区驻军第四十六军，赶筑城防工事，并命丁治磐部防守柳州。不久，敌迫近柳州，未经接触，丁部便放弃柳州，致使构筑在市区的防御工事，没有发挥一丝作用。

在郊区外的是野战工事，在城区内的都是混凝土永久性工事，其分布如下：

〈一〉，柳州以北地区：铜鼓岭—白露村—马厂—鹧鸪

江矮岭—欧阳岭。

〈二〉柳南地区：升官塘—社湾坳—机务段外。

〈三〉市区内的永久性混凝土碉堡：〈附图〉

设在市区内的钢筋水泥碉堡，则星罗密布：中山东路与罗池路十字路口—培新路斜坡上与兴仁东路交叉口—小南路斜坡与兴仁西交叉口—解放南路旧邮局门前—中山中路与解南交叉的五角星处—映山与景行交叉的十字路口—中山西路与柳荫路的交叉口—鱼峰路与飞鹅路的丁字路口—乐群社前面柳邕路口—马鞍山顶—马鞍山的水塔处—张种路口—驾鹤山脚的水南路口—一中门前—鱼峰山顶—鱼峰山脚文笔路口—云头岭—社湾坳—四三四厂—无线电厂和电灯泡厂门前—依山村酒厂—窑埠猪头塘—机务段通文笔路口—车站前的丁字路口等处。

由于柳州解放后各项建筑逐年发展，郊区野战工事已全部湮没无存，在市区内各街交叉路口构筑的碉堡，也均已拆毁，只留存在老年人的回忆之中。

〈附图〉

热心地方文史工作的老先生

肖泽昌

50年代我初来柳州，曾在二区府搞街道工作，常和陈显扬老先生在一起，看见他常为群众公益义务地服务、奔忙，使我深受感动。不久，他被群众推选为人民代表，并被聘为市政协委员。随着，他常驻在市政协主持文史室，转眼又是30多年了。在这期间内，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一是50至60年代中央考古研究所裴文中、吴汝康等教授来柳考查“柳江人洞”、“白莲洞”和柳城“巨猿洞”文化遗址的时候，地方上是由陈显扬老先生陪同他们前往各处进行科学考查。二是与此同时，由陈显扬老先生协助杨（义）、翟（念劬）、龙（月卿）三老，以市政协名义，出版了《柳州简介》油印小册子，提供了市内石刻、古迹、古墓的所在和分布的资料；三是在陈显扬老先生的主持下，市政协文史室已编印出版了《柳州市文史资料汇编》4辑，每辑都有十多万字，为我市修志工作提供较为丰富的素材。这真是：“老牛不怕黄昏晚，不用扬鞭也奋蹄”，他们对地方文史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后辈钦佩和学习的。

血 溅 龙 城 恨 难 休

——忆抗战初期日寇轰炸柳州的罪行

• 于 辉 云 •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铁蹄未及之处的西南大后方的柳州，我人民也不能安居乐业。自1938年起，柳州不断遭受日寇飞机空袭，市区房屋被炸毁不少，无辜者死伤惨重。据资料不完全记载：“1938年，空袭8次，34人死亡，48人受伤，被毁房屋74间，经济损失达3,900,800元；1939年，遭日机空袭5次，蒙难而死者达573人，受伤388人，房屋被炸毁4227间，经济损失竟达6,910,000元；1941年——1942年间，日寇派遣飞机空袭前后达7次，有57人死亡，192人受伤，遭炸毁的房屋有74间”（1944年《广西年鉴》）。

笔者当时正是在学的少年，对日寇的狂轰滥炸血腥罪行，身受其害非浅，记忆难忘：

1938年秋季，日机狂炸市区，投弹百余枚，一幢座落在培新路口（现立新路人民银行储蓄所处），新建的壮观华丽，当时广西首屈一指的，能容千余观众的“曲园戏院大厦”中弹倒塌，瞬间化为废墟。

日机肆无忌惮，屡犯柳州边境，防空警报频繁，警报汽笛时响时停，马鞍山上的黑色灯笼时起时落，空袭——紧急

——解除警报一天数次之多，虽然头年“曲园”被炸后仍心有余悸，但现正是炎热夏季，逃难者往返数次奔跑，疲惫不堪，丧失警觉，产生了就近树荫躲避的麻痹大意思想，就这样，一场悲惨夺命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就是在1939年7月15日这天，空袭警报发出不久，紧急警报接踵而至，马鞍山上的两盏黑灯笼没有了，刺人心弦的短速汽笛声催促着逃难者。笔者这时估计已难跑出北较场（现人民广场），便转向场的西面（现八一路日杂公司附近）场地简易防空洞里钻，挤满在洞的人静静地听着洞外的动静。突然沉重的飞机“嗡嗡……嗡嗡”的震鸣声，自东北方向由远而近传来，随着震人肺腑的轰炸声和刺耳欲穿的机枪声，如同在防空洞周围似的，洞口不断发出“噗噗”冲击的气浪声，和被震落泥土的“沙沙”声过后，接着传来了凄惨异常的哭叫声和呼救声。飞机声消失了，出洞巡视刚才发生的一切：相距约二百米左右，北较场、映山街大树脚一带（现粮店与水产公司之间）弹坑处处（平射杀伤弹），树干机枪弹痕累累，地上躺卧着被炸死、炸伤的遇难者皮肉、布片挂上树枝的历历皆是，惨不忍睹，连停在大树脚的红色消防救火车也全被炸坏。这一惨状在柳是空前的：灾区东自牛皮铺码头（牛皮铺）、东台路中段、湾塘路、李子园（拼入公园现盆景园一带）、柳侯公园；西至一路塘（现五一路）大树脚；南到人字街口江西人开的金铺（现小南路2——4号）及河南马鞍山脚一带，均遭平射弹、重型炸弹、机枪弹的杀伤，破坏得狼藉不堪。特别是在大树脚、柳侯公园、牛皮码头一带树木成荫，人多聚集的地方，受难者伤亡惨重。收尸埋葬不及，停放在北较场

的棺木便有400多具之多。在回归路上，笔者听到目睹者谈到：日本鬼太可恶，今天发动50架（次）飞机来炸我们。

与此同时，龙城中学校舍亦被炸毁，学校被迫疏散到市郊凤凰嘴（鹧鸪江）搭草舍继续复课。这是日寇对柳州市区进行的一次毁灭性轰炸。正如朱午迟诗（柳州文史资料第二辑119页）云：“破片万千惊直射，残尸四百痛横行。北关玉宇成平地，一路塘边尽血淋”。

一星期后，正是7月22日下午，紧急警报过后，日寇飞机9架，从东北方向作人字队形侵入市空，盘旋一圈，朝东门一带俯冲，疯狂地投下大量炸弹，顿时烟尘冲天，设在东门城楼附近的刚建半年多的“柳州电话局”新楼中弹，被炸毁西北角二楼、三楼，两扇大门震塌，二楼机房设备和两部总机全遭震坏，总杆断成两段，造成河南、河北两岸电话中断，影响电讯交通，损失惨重。

从当时官方披露的不完全统计看：这些数字是使人心惊的：在1938——1939年，1941——1942年四年中，日机先后空袭柳州20余次，死伤近1300余人，炸毁房屋建筑达4500多间；仅从重大灾情的前两年，经济遭受损失超千万元。更为严重的是，迫使市民流离失所，骨肉分离，市场萧条，民不聊生；广大学生学业受阻，教育事业遭破坏。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丧心病狂地狂轰滥炸，给柳州带来深重灾难。

1987年7月20日

日寇铁蹄下的柳州

梁祐章忆述 彭德 整理

一九三二年间，我跟随老板从广东上柳州做伙计，因为生意不好，被辞退了。后得朋友照顾，投资做本，在庆云路租一间小铺面，摆卖芝麻糊，绿豆沙之类甜品小吃，以后又增加牛奶、面包等品种。一九三八年日本飞机大肆轰炸柳州，我的摊店正中炸弹，全部精光。逼于生活，暂且设点修理单车，维持一家六口生活。因为天天跑警报，收入总不够糊口。

到一九四四年秋后。衡阳失守。柳州人口大疏散，全城男女老幼有九成人数走去了。在柳州附近乡村，我无亲无靠，走投无路，非常焦急。到十一月六日上午，风闻将炸毁浮桥，断绝交通。幸得同乡好友骆瀛招呼我去运江。逃到运江，难民如蚁。我每日做些糕饼摆卖，勉强维持生活。这时柳州已经沦陷，日寇四出骚扰，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附近村镇，常遭抢劫。有一天，坏人在圩外零星燃放爆竹，极似枪响。坏人狂呼：“日本鬼来了啊！”故意制造混乱。群众如同惊弓之鸟，仓惶逃遁。坏人乘机抢劫发财。待我回转住处时，所有衣物用具，损失一空，连饭锅、饭碗都没留。在这人地陌生的运江，身无分文，乞借无门，面临绝境，确实没法生存下去了。同我一样遭灾，处境困难的人不少。大家

计议：“死在运江，不如回柳州死里求生，侥幸得保存性命，再想办法。”这时候维持会招诱民众回去定居，说有种种“优待”。许多难民试探着先回去了。我们挨饿了几几天，小孩饿得哇哇大哭。无可奈何，逼得携带老小跟随众人，两手空空地离开运江。当时陆路不通，只能走水路。航道上乱得很，江面浮尸连翩飘流。各人乘坐的民船，紧跟日本人的运粮船只前进，才得安抵柳州。回到柳州，我们住在今映山街19号门牌，这时约在1945年春末。军阀陈炳琨在中山东路的琴园（今地区土产公司），驻扎的是日本军司令部。初回柳州之时，在此领得三天粮食，领取手续相当麻烦，又费时间。以后让领也不愿领了。

沦陷时期的柳州死气沉沉，家家关门闭户。窗前街上，野草丛生。蓬蒿齐腰，有两三尺高，简直象个狼窝。凡是无人看守的房屋大门、窗片、板壁、梯板、楼板等木料，全被日寇撬的撬，拆的拆，当作燃料军用了。十室九空，荡然无物，炊烟尽绝。市面极端荒凉，河北城区，除小南路等几条主要街道有少些人做小买卖之外，其他地方，杳无人迹，甚少象样的商店，更没有成批货物交易。即使做小买卖，也是提心吊胆，惶惶终日。强抢白吃不算，倒霉的还要挨皇军、汉奸刮耳光。以前小南路、人字街口、大十字街口等繁盛地段，现在只不过开设几间赌场、烟馆，聚集一群赌棍、道友（吸鸦片烟的）胡混其中。这班亡命之徒，十足强盗作风，输打赢要，往往拔枪搏斗，流血死伤实属平常事。老百姓逃走不及，一时乱枪流弹，万分危险！

我没有生意可做，也没工可做，就买得些玉米粉、木薯

渣、黄糖等原料，做些糕饼零卖。买卖是用汪精卫发行的储备券，毫无价值，幸好还可以用来向小贩买高价原料，不致于束手待毙。

河南方面：经常拉伕，挑运从柳江县属掳来的农产品及军用物资。日寇对地方上的生面人怀疑是游击队派遣的密探，动不动拉进宪兵司令部（今天主堂）去，往这些人的鼻孔灌辣椒汤。我决不敢往河南去。河北方面：在城区以外则严密封锁，提防游击队袭击，没有通道，所以没有拉伕。但是经常捉人打针——那些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三五成群，携带注射器械药品，拥上街头，抓住行人强迫注射。若说是注射防疫药苗，有益健康，应当人人要引臂接受防治。但日本大夫见了我们这些小贩一概放过不理，只抓生面人穷追不舍。人们产生疑虑：是不是日本鬼给老百姓注射什么慢性发作的致病毒品？为何强迫注射呢？危险！大家见到日本大夫出动，吓得魂飞魄散，飞奔逃命。

映山街一间（今24号城中公安派出所）原是私人洋房，日本宪兵用作俱乐部，夜夜跳舞作乐。他们掳来的妇女有操湖南口音的，有讲白话的，约五、六十名。久不久带牵些掳来的猪、牛、羊就在门前树下屠宰剥皮，狼吞虎咽，喝醉了酒，就大打出手。

过了一段时间，日伪人员好象形色慌乱，没精打采。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起，郊外四处起火，晚间满天通红。×月×日早上，我那十二三岁的小儿子回家来告诉我说：“日本鬼出了告示：下午放火烧平柳州，叫大家即刻搬出柳州。”果然，街上行人慌乱，肩挑背负，拖儿带女，向映山街北面

大树脚方向逃去。我走投无路，不能远去，在街上徬徨，只见汉奸们携带引火之物——有汽油罐，有烧夷弹，有火焰喷射器等，实行放火烧屋了。他们不是逐门逐户点火的，而是在左边街第一家放了一把火，往前走几家，在右边街第五家又放一把火；再往前走几家，在左边街第十家再放一把火……曲折前进。遇到那种钢筋水泥结构的建筑物，纵火者则投放烧夷弹，轰隆一声爆破，烟硝弥漫，烈火腾空，不消三日，整个柳州河北商业繁盛地带，完全焚毁。从小南路与中山路交接处往东遥望，一览无遗，可见到解放路以东各处，颓垣断壁，焦土废圩，余烟不息，死灰复燃。隔江南岸同样遭殃。我所住的映山街（今19号）木屋，左侧是一条小巷，右侧是砖墙房。我家前后左右都被烧光，独我家幸存，确是奇迹！入夜，有三个同乡的家已被烧光，就到我家求宿，随身携带三个小包袱，塞进我制饼的炕炉下面。半夜，几个汉奸冲进屋里来，持枪威胁，要我们交出财物，否则放火补烧这间房子。其实我们身无分文，他们搜身搜屋，搜出炕炉下面三个小包袱，强抢而去。

当火烧映山街之时，我一家人卧伏映山塘畔芦苇丛中（今住宅工程公司），但见日寇狼狈撤离，从俱乐部里捆绑一批敌对派别的汉奸出来，押到塘边，执行枪决，尸首则推入映山塘里，任其腐臭糜烂。汉奸之中有李宝文及其第三小老婆。李是飞虎麦芽糖厂老板，柳州沦陷前当过××同乡会会长。不料他甘受敌伪驱使，为虎作伥，得此下场。

两个局长的悲惨遭遇

董咸熙 梁镇海

一九四四年日寇深入广西，十一月十日，柳州沦陷后，曾先后任过柳州教育局长的钟震吾、余炳华两位老先生均被日寇拉去当挑伕。钟老身材瘦长文弱，余老身材肥肥矮矮，二老一向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现在非挑重担在肩不可！钟老好不容易挑到宜山时，日本人却把他释放了；余老却死于日本人刺刀下！

当钟老挑到宜山时，适逢一个读过大学的日本人当班长，懂得英语。钟老用英语同他对话，说明自己是留学英国的，是广西大学教授，请求他多多关照，结果，获得释放了。当时，罗城的县城——东门已给日本人占领，沿途土匪猖獗，拦路抢劫，亏难钟老先生，千辛万苦，一路求食，终于一九四五年春，抵达罗城的龙岸圩找到柳州师管区司令黄梦年的驻所，幸得安身。当钟老先生讲述这段极为悲惨，狼狈不堪的遭遇时，逃难在罗城龙岸的高天骥，陈如平、王剑功和董咸熙感慨万千。

余老先生是梁镇海的姑丈，逃难时是率领家小逃到东泉

柳州沦陷期间见闻

肖焜口述 彭德整理

当年本人绕广东小道贩运西药到桂林、柳州转卖，因此认识尹鸿钧、郭仁晞名医师。柳州沦陷当天早晨，我正在打摆子（疟疾发作），等到间歇之时——大约上午九点多钟，浮桥已断，无法渡河，走投无路，无奈逗留柳州，目睹沦陷期间柳州的灾难。

日寇驻柳州最高指挥官叫福兴大佐，住东大路琴园。他牛高马大，经常巡行街市，着东洋军服，挂指挥刀，穿皮统靴，戴眼镜，阔步先行。侍卫十余人跟随在后，宛如棘人送丧。

柳西镇维持会长庞忠，滑头滑舌，很会欺骗民众。柳东镇维持会有个副会长黄○，经常深夜带领日寇四出拉伕抓人，为虎作伥，民众痛恨入骨。

商业交易方式以物换物为主。汪精卫发行的储备银行伪钞，价值很低。商品来源：一是国民党军匆忙撤出，日寇尚未侵入柳州时，城区顿成真空状态，留在市内的亡命之徒及

（紧接上页）遇害的。当日寇将入东泉时，全镇人都跑了。余老先生全家亦跟着跑了。他突然想起还有些东西忘记拿走，转身回去，恰与进镇日寇相遇，被拉着，强迫他挑担。因不能胜任，在离东泉不远的路上被日寇用枪尾刺刀刺死的。

胜利后，余老先生的遗孀及女儿等，回到柳州外家叙述他们逃难经历及余老先生惨遭杀害的经过，大家悲愤不已。

少数居民，四出掳掠未及疏散的公私物资，搬回家中或盘据大屋囤积，好的刮完之后，又搜集其次的；二是柳州沦陷后，日本军方同汉奸头目串通，出具通行证往外地抢运劫来的物资，武装护送到柳州出卖，中饱私囊；三是近郊农民将收获的农副产品带到柳州，交换煤油、火柴、药品、衣料……等生活必需品。他们进入柳州是相当冒险的，路上有汉奸、土匪打劫，进入市集又会无端被诬，指控为游击队间谍，严刑逼供。只有疏通了关节的商贩才敢进行。

日本鬼子经常破门入室拉伕，见人就抓。开门稍迟，不由分说，先刮耳光。抓到的壮丁临时集中街头巷尾，派个武装看守，其余鬼子又去各家各户继续搜索抓人。有一次我被抓到兴仁东路街口，由一名日本鬼子看守着。被抓来的在场的壮丁有十几个人，眼见我众敌寡，时机有利，大家会意之后，一齐动手把看守我们的鬼子冲击倒地，立即四散逃开。鬼子爬起来叽叽呱呱吆喝，毫无目标地乱放枪。因为晚上全城无电灯，又没干电池，鬼子连个手电筒也没有，可见日军物资非常缺乏。我飞奔窜进洛埠巷，转弯抹角三步两下就跑到河边埋伏起来。我前后被拉伕四次，都侥幸逃脱。被拉去的人，凶多吉少。当时铁路、公路完全破坏。陆运不通，依靠人力解决。从柳州运送日用物品去贵州，又从贵州肩挑军用物品来柳州。挑夫如果力竭走不动，或者落后掉队的，日本鬼就用刺刀来捅，血淋淋的踢倒在地，再踏上几脚，杀鸡吓猴。剩下的东西均匀给同伴分担。为了逃避拉伕，居民寝食难安，常常从河北混过河南，河南偷渡河北，疲于奔命，希能免死。至于水运到柳的东西，船只泊岸，也是拉伕卸货上

汉奸石补天在柳罪行录

韦秉廉

1944年8月，日寇攻陷衡阳，沿湘桂铁路指向广西，桂林失守于11月10日，柳州不战，先一天沦陷。日寇铁蹄进占柳州后，到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作，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有苦难言。

柳州沦陷后约十余日，日寇便在河南岸驾鹤山上西面的半山酒店处，成立了“柳州地方维持会”，当时用思贤乡黄岭村的刘植森出来做维持会长，以板桥村的刘炳荣做维持会的秘书。维持会下设民政、财务等科室，至于军事武装力量及权力，均属日军宪兵队及敌特务机关所掌握。出面的日特，多数是本地汉奸充当，因为日寇素无人性，老百姓纷纷向四乡躲避，不敢归家，所以沦陷区内人烟稀少，城中亦无

（紧接上页）岸，挑运进仓堆垛，累得要命。盟军飞机经常来炸柳州，那时赵家井一带房屋被炸得一塌糊涂，起火焚烧。那时我依靠尹鸿钧医师照顾，治好了虐疾，买些粮食来熬酒零卖，终因本少利薄，度日如年。历尽艰辛，幸喜光复，阿弥陀佛！只为日寇撤退时放火烧毁许多房屋，这时只见街市摆卖掳来的家具木器，逃难回归的人们家成焦土，争相抢购床板、凳桌，栖息于颓垣断壁之间。满目疮痍，痛感人间浩劫！

买卖。日寇的生活补给困难，为此一面派兵四处抢劫粮食，一面于柳江河南河北两处开设赌馆、烟室，欺哄老百姓归家谋生，也有少数人受其蒙骗回城。敌特在河北小南门及大南菜市一带开赌收规，河南区在老浮桥头一带，开设牌九番摊数起来招引赌徒，另在赌场附近设有茶楼酒馆。

继维持会成立后，1945年春，汉奸石补天（又名石方剑，广西桂林人，他是中日混合种，母亲是日本人），善说日语，他于桂林沦陷后，跟随日寇来柳做特务工作，接充柳州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他任意残害同胞，以取悦于敌军。是年春末，他指使敌特在河南街搜捕了我自卫队派入城里活动的战士钟显廷、丘麻子（名字未记得，一般人都叫他丘麻子）二人关进了驾鹤路集中监狱内（在天主教堂），第二天敌特将钟、丘二人捆绑，提出在天主教堂门前示众，后施用辣椒水从他二人口鼻灌入腹内，腹部顿时膨胀隆起，敌特将大木棍在其腹部上用力踩压，将这两人置于死命，惨不忍睹。有的无辜民众也遭审讯，用红铁烙身，甚至挖坑活埋……，总之日寇在柳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日寇好饮酒，酒后必到处寻找花姑娘，以供其奸乐，搞得沦陷区的难民妇女四处躲藏，神鬼不安。

1945年6月，日敌将要撤退之时，到处拉伕，在城内跑不掉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少，皆被拉去做运输挑担。日敌声言：“六十岁挑六十斤”，那时河南太西街的民众刘耀堂、刘广合都是超过六十以上的老人，被日寇拉去，因无劳动力，最后惨死于日刀之下。

是年6月下旬，日寇将投降撤退，伪警察局长石补天，

柳州沦陷时，柳江、柳城、

雒容三县边境对日斗争片断

蒋 霖

1944年11月柳州沦陷后，在柳江、柳城、雒容三县边境地区，成立了三个自卫大队。一个大队是由潘志谷领导，下属十五个中队，约有千余人，活跃在鸕鹚江、长塘、沙塘、香兰、黄土、青茅、杨柳一带。队员多属上述地区农民。住香兰的柳江县民团副司令柯传源，常给予潘志谷指导，但自卫队

（紧接上页）奉其主子之命，亲率伪警察敌特等，在城内及河南等街，施放大火焚烧居民房屋，较坚固的建筑物，他则用日寇配给的化学药物来焚毁，弄得全城一片火海，被焚烧的房屋约百分之九十以上。

抗战胜利，柳州光复，汉奸石补天被逮捕。闻说石补天是随日寇在逃途中被捕的，关押在柳州地方法院。开审那天，很多群众闻讯到场旁听，因国民党法院，囿于死板的条文，没有人证，不能定罪，曾一度宣布释放他，当场全体听众，鼓噪起来，法院畏于舆论压力，不敢释放。二次开庭审判，法院才宣布判决石补天犯汉奸罪处以无期徒刑。

1949年临解放前夕，国民党法院的监狱员逃跑，石补天等一群犯人才破监逃出。他初逃到柳江县属的米村藏躲，以后不知其所终了。

不受其指挥。这个队的纪律严明，不准伤害群众，就是抓住汉奸、日寇也不许虐待，待调查清楚事实后，整理材料往县自卫大队押解、所以深得民心。

另一个大队是由何秀良领导，也有千多人。以梳桩岭为大本营，活跃于洛埠、雒容、东泉、龙村、雷村、泥布头、东溜村、西溜村一带。队员是附近农民，但也有外地流窜来依附的土匪，纪律松懈，各自为政，何秀良也控制不住。沦陷前，他们曾多次拦劫三门江的汽车。沦陷后，又抢过洛埠渡船，还洗劫过鸬鹚江居民达数十家。光是葛老旺一家，就被拉去十三条耕牛。就是居住在梳桩岭的居民，也免不了要受其害。这个队受何次三的领导。

还有一个大队是由何仲超（解放后改名向天雷）何宣勤（浑名何大炮）领导，以古木坳为大本营，与何次三、何秀良有联系，约六百余人，活跃于黄村、白露、马厂、双冲、云头冲、磨滩、维义村、小村一带。纪律也不大好，但对该辖区内群众，不予骚扰，而对外来的外乡人，如不熟悉当地的人，也会遭他们抢劫或杀害。

在鸬鹚江对面的茅洲村，还有一支自发组织起来，保卫本村群众安全的武装群众。

何次三、向天雷、何秀良、何宣勤，解放后都参加1950年土匪暴乱。何次三在东泉兰山嘴剿匪战场上被击毙，向天雷被枪决，何宣勤逃去香港，何秀良出来自新。1976年在家病逝。

这三个自卫大队与日寇分别在长塘、沙塘、梳桩岭、洛埠、古木坳和茅洲发生过战斗。

梳桩岭的战斗

1944年11月底，柳州沦陷不久，一个鬼子窜进梳桩岭的山巅屯，被五个自卫队员开枪围攻，由寄居梳桩岭的泥布头农民黄木打死，缴获一支短枪，揭开对敌斗争序幕。

同年12月初，由汉奸黄松带领日寇五、六十人，配备有机枪、小钢炮，带领百多箩筐队，进犯梳桩岭的小岭。何秀良派出百多人，有机枪，还有两门点火药放铁片的土炮，架在山坳上，等鬼子接近时，两炮齐发，打死、打伤鬼子六人。从早上六点打到下午三点，鬼子见攻不下，又从东泉方面调来五、六十人增援。自卫队消耗弹药太多，不敢恋战，退进四十八弄，自卫队无一伤亡，日寇攻上大岭。由于事前已将粮食藏好，鬼子攻上去却扑了空。不久，即撤出大岭，却占据了梳桩岭硝崖崖顶。

在硝崖，何次三、何秀良却藏有一大批食盐。必须把这批食盐夺回来。何秀良又派出百多人攻打硝崖；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在打退鬼子以后，抢运食盐，每个群众运出一百斤，则给予十斤。战斗从早上六点打到中午，鬼子支持不住而撤退，双方均无伤亡。在自卫队监护下，群众将食盐运至石龙队何秀良家收藏。

古木坳和双冲的战斗

1945年元月底，有百多鬼子由柳州方向开来，沿公路北上，途经古木坳时，被守在坳顶的何冬超自卫队拦截。当自卫队第一轮枪响时，有两个鬼子倒下，其余的马上占据有利

地形，进行还击。但自卫队坚守坳口，居高临下，鬼子无法冲过。潘志谷大队得知情况后，急率队支援，拟截断退路，合力围歼。但待潘队赶到时，鬼子已迅速后撤，转向柳州逃窜。

1945年3月，何宣勤接到双冲沈小友的报告：“过两天日寇有一个班的人，要到他家吃饭。他请云头冲的金猫张帮煮菜，自卫队是否要行动？”何宣勤答复：“来了多少鬼子，带有多少武器，先来报告，然后同你们联系如何打法。”鬼子到双冲沈家有十多人，六、七支长枪，一挺轻机，一门小钢炮，人进屋吃饭，武器放在门口。何布置外围五十人负责警戒和收缴武器，由金猫张发讯号，何宣勤五兄弟穿便衣执短枪冲入，当场击毙一名，伤六名。鬼子身上还有两支短枪还击，由后院突围。外围自卫队狙击时，发现从黄村方面来了百多鬼子骑兵，于是迅速撤退。鬼子骑兵入村，将双冲、云头冲各家的门板、床板及所有木制家具，全部搬下河边搭桥，然后过河撤走。

收而复失的洛埠战斗

1945年2月，日寇有五、六十人驻扎在洛埠，设立了一个据点，何秀良、何明、何知甫带领了几百人，对洛埠日寇进行围攻。柳城的韩冬山也率队赶来参战，守住浪江河边上的土岭。战斗打响后，从三方面向洛埠墟上进逼。日寇从雒容方面调来百多人增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三天半的激战，日寇不支，从雒容方面撤退，死伤人数不详，也未见留下敌人尸体，最后有八个鬼子被逼下河，从洛埠泗渡对

河雷村。其中一个被雷村自卫队××（姓名已忘）抱住，滚在一起撕打，两人互相抢夺长枪，被日寇脚踢枪托，枪头刺刀刺入自卫队员咽喉而亡。最后游上岸的一个鬼子、被黄滩村××（姓名已忘）生擒，缴获长枪一支。逃脱的七个鬼子分别被龙村、雷村、黄滩、东溜村的自卫队先后消灭。

自卫队占领洛埠只有两天时间，动员群众回来成墟，群众害怕鬼子重来，不敢回来，第三天自卫队撤出洛埠，却占据墟外的岭顶。不到两天，大批的鬼子从雒容开来，打退了自卫队，重新占领洛埠。

1945年3月，洛埠成立维持会，才开始成墟，自卫队员混入开赌。鬼子、汉奸、群众混杂其间，市场混乱。鬼子汉奸调戏妇女。强抢强买，赌棍打闹，互相开枪，鬼子不理。群众入墟换些必需生活用品，则匆匆回家。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农历六月初，自卫队跟国民党军队进入洛埠，何次三才大肆开赌，收捐。

长塘狙击战

1944年12月初，一批日寇五、六十人，有马队，从浪塘尾（现在射击场）方向来。

潘志谷自卫队得知情况后，派出百多人前往拦截，青茅曾远仁率领的自卫队，首先在猪槽寮与敌人遭遇，被鬼子抢占了制高点，围在槽里。潘志谷率大队赶到时，将敌人包围，才救出曾远仁率领的队员，双方从中午打到天黑。一名鬼子骑马冲出包围圈，搬来四、五十人援兵。自卫队见不能速战速决，弹药有限，在未伤亡的情况下，乘夜幕撤出战斗。敌

人乘虚侵入各村屯掠夺粮食。还在下青茅杀死王仁生和麻子老友两叔侄，然后撤走。这次战斗，未能给予日寇有力打击，相反使老百姓受了很大损失。

沙塘夺粮战

1945年2月中旬，白柳州方面来了三十多个鬼子，有六匹马，还带有六十多个箩筐队，准备到沙塘粮仓抢粮。队员得信后奔跑向潘志谷报告。潘即令全队十五个中队，千多人枪，先后出动，在桥头河口粮仓外拦截。青茅、黄土自卫队先到，被日寇优势火力围在一个冲槽下，以后大批自卫队员赶到，将鬼子团团围住，从上午七点打到中午，日寇支持不住，从融安方向突围撤走。后来据报：打死打伤三、四个，但打扫战场时，却未发现尸体。撵走鬼子后，自卫队员将粮食运至杨柳收藏。

柳东茅洲村群众的对敌斗争

茅洲村老人曾木生的儿子曾太保，与住在鹧鸪江的韦冠生两人去赶长塘墟，在回来路上，碰着两个鬼子。一个是当官的，身上有枝短枪还配有一把指挥刀；一个是士兵，拿了一支长枪。他们是驻扎在鹧鸪江的日寇。因为冠生是住鹧鸪江的，与他们熟悉，就一路谈话一路走。太保扛着一把锄头，冠生腰间藏有一支拉八手枪。路经欧阳岭山坳时，他们与鬼子就拉开了距离，两人同时下手，太保一锄头把敌军军官打死，夺了短枪和指挥刀，往崖头山跑去，由那里渡河回茅洲。冠生也打倒了那名敌兵，夺枪往崖头山跑，因为跑得急

促跌了一跤。这时，后面的枪声响了，原来这个鬼子没有打死，他装死躺在地上，长枪被夺走后，他身上还有枝短枪，冠生未有发觉搜去。这一枪把冠生背后的衣服撕破，背上划上一道弹痕。其后，这个鬼子跑回据点报告，把在鹧鸪江当维持会长的韦志生，拿去枪毙。光复后，柳江县举办缴获日寇战利品展览，太保曾把手枪，指挥刀送去展出。

1945年3月，茅洲羊栏石唐家驻扎有鬼子的一个据点。距离羊栏石约两百米处是胜冲口，在那里停靠了一张木排，一个鬼子把衣裤脱光，连同六五长枪、子弹盒一并收藏在河边的芦苇丛里，被本村的曹小弟发现。小弟偷偷地爬到鬼子放东西的地方，把鬼子衣、裤、枪弹全部拿走，等浸泡在水中的鬼子发觉后，急得光身跑回唐家据点。从此，据点的鬼子不敢再出来。过了一、二天，这个据点鬼子也撤走了。

茅洲羊栏石鬼子据点撤走，窑埠还驻扎有鬼子。曾太保有一天去窑埠，买点东西回村，途经秦家村到王家村的凹槽地带时（即解放后做水利地方）发现有一个鬼子在那里放马。他偷偷地从背后接近鬼子，然后猛扑过去将他擒住，本拟用石头把他打死，被擒的鬼子不反抗；只苦苦哀求饶命（这鬼子懂得说一点中国话），说他是被迫来的，家中还有老母妻儿。顺从地被太保押回茅洲，关在村长曹祖送家里，其后押交给潘志谷自卫队。

1945年3月底，由柳州来了一班兵力的鬼子，带着二十多个箩筐队，到茅洲村掳掠。曾木生老人在棋崖山下召集了黄金友、何荣德、曹祖友、曹小弟、阮五、黄满、张××等人商议，在村口石头桥拦截，不让鬼子把群众财产夺走。鬼

子在村里掳掠时，经过大榕树社庙开拓地，被潜伏在对面河凤凰岭上的自卫队发现，用机枪点射，将一名鬼子打伤。这时，鬼子才收兵往村外撤。撤走时，放火烧了村里的烂公的一间房子。鬼子带队出村，刚下到石头桥凹槽地带，先从后面三棵大树方面响起了枪声，等他们回过头来还击时，正前方岭上坟背的枪声又响了，前后受夹击。他们一个个滚到芭芒丛中隐蔽，顺着沟槽，往羊栏石唐家前面的冲槽撤退。箩筐队将掳来的东西也丢满了一地。自卫队分组从小路拦截，一方面从后直追，一直撵到龙家坟才撤回。站在山梁上一片黑压压的群众，大声呼喊助威，有的还指点敌人逃窜的方向。撵走敌人后，群众回来拿回了被掳去的东西，兴高彩烈地欢呼跳跃，真象打了一次大胜仗而凯旋归来。从此以后，鬼子再也不敢下来了。

最后的一次行动

1945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晚，日寇将撤出柳州前夕，潘志谷自卫队获市区内线报告，柳州东门还有五十多名鬼子驻扎。当晚，潘志谷率领覃志满、朱国禄等三个中队，约百五十人、由报讯人带路，沿白沙村、黄梦年别墅、湾塘路，直扑东门敌人驻地。清晨在罗池路口与国民党军队相遇。双方对峙喊话，潘志谷亮出“国旗”，双方互派一名代表会晤，才知城里的日寇，已于昨晚全部撤出。于是又会同国民党先头部队，赶回鹧鸪江。

另一支国民党军队，由窑埠开下茅洲，进入茅洲村小憩，还有一支直下油榨、水冲，队伍前面扛着“国旗”，被占据

柳城大湾抗敌回忆

全洪方

1944年，柳城县大部分乡村都先后陷于敌手，各地均先后组织了保家卫国、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地方自卫大队。当时我在地方群众的要求下，和全德顺组织了自卫大队，下有大湾、田村、六贡三个中队。我任大队长，全德顺任大队副。

同年十二月下旬，驻柳江县属的流山更村的日军约八十人，从更村沿大湾对河河边直下柳城县凤山。我接报后，即命大湾中队，利用大湾村前河岸冲槽布防，严阵以待。同时并命田村中队，把守河之上游，堵住敌之退路。六贡中队镇

对面河小山顶日寇狙击班发现，打了三发小钢炮都落在茅洲村里；一炮打在大村脚田里，一炮打在韦小宝家的屋角，把葛水友的弟弟胸仔打死。第三发打在黄金友屋后的玉兰花树上，打断了一大杈树枝，金友家有国民党军队在吃粥，全家老小均在屋里，幸好一个未伤。

等潘志谷和国民党先头部队赶到，才将占据小山顶上的鬼子撵走。

据鸬鹚江葛水友、茅洲村蒋霖、黄金友、梳粧岭梁子英、梁子朝、青茅唐永宗、云头冲刘茂坤、刘茂乾等人口述整理

守河之下游，堵住敌之去路，目的是要把敌人堵于大湾对河无躲避地带歼灭之。

未久，敌人果然浩浩荡荡沿大湾对河河边而下，当敌人行至我大湾对河象鼻村之河边时，我团队乘敌人不意，集中予以最猛烈之射击。敌人一时措手不及，即龟缩至河岸冲槽之间，不敢越出一步。尔后我即命六贡中队，派出三十果敢勇猛的队员，距敌人所据冲槽下游之一公里处，徒涉渡河，在敌人龟缩之冲槽前的三个土岭，用火将顶上的草燃烧。此时正值初冬季节，岭上都是黄草，又恰遇北风大作，火势熊熊向着敌人所龟缩之冲槽烧去。敌人发现满天火烟弥漫便冲出冲槽，到处乱窜，企图转回更村。那知又被我大湾河上游之田村中队团兵截住回路，无奈始由顶背折回更村。

敌人退后，我团队即渡河清理战场战果，在冲槽即发现敌尸四十六具，内有敌大尉官一人，并当场获敌六五轻机一挺、六五盖扳步枪六枝，和指挥刀，雨衣、望远镜、等军用物资，我团队则无一人损伤。

（柳城县政协供稿）

洛崖抗日游击战忆旧

秦永固

1944年10月间，桂林黄埔第六分校开赴湘桂边区，在龙虎关同日军战斗后，军校官生奉命转移至宜山怀远集中待命。当时笔者是军校教官，由龙虎关退至柳州时，即向组织请假，去柳城安排家眷，准备由柳城转道去怀远归校报到待命。时值柳城在下疏散令，我全家只好向洛崖亲戚处奔去，在洛崖住下两天后得知柳州已陷入敌手，沙塘、凤山已有敌人，冲脉、三义、马山、洛满、六塘之线也有敌人分别占领。我们认为洛崖乡是处在死角，敌人可能暂时不会到此处。因此所有各地逃难来的人都在洛崖暂住下来，看看情况如何，再作打算。

次日，广西省府直辖住柳城无忧农垦区，由麦绍东主任带着农区的垦民200百多人，也到了洛崖。他们有步枪40支，弹药少许，编成1个中队。设中队长1人，排长3人，司务长，家属300多人另组为3个分队，设有分队长。每排有10支步枪，每分队有3至4支枪，以作警戒自卫之用。队伍到后住在小学校内，他们很有纪律，有秩序，分配住地后各处都派岗放哨，校门口也放了哨兵。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农民自卫团体呢！

当时我心中对麦主任这位50开外的老前辈很钦佩（我当

时32岁)，因此我马上以军校教官的身份，去拜见他，得到他很客气的接待，互相谈得很精诚，并且得知他是甘丽初主任的同乡又是亲戚关系。我谈到在此避难的群众有千多人，自卫能力全靠地方自卫队力量是不够的，我建议他出面把人召集起来把力量扩大。为了保卫地方，打击敌人，我还建议向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官甘主任请求支援一些枪支弹药，与敌人打游击，也为抗日尽我们一份力量。我向他表示如能得到甘主任的批准，愿尽我之能力帮助军事方面的指导训练和负责作战方面的工作。他听了我的意见后，也有同感，我俩之间是志同道合的。

第二天，我们正式请了地方绅士、乡镇长、自卫队长、学校校长和男女老师以及疏散在此的西大学生，高中初中学生，还有大埔社会青年男女和流亡在此的军警人员，由麦主任召集开一个群众会议。会上，麦主任提出要组织防火、防奸、防敌、防盗的自卫队伍，以保护在此的所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还要组织能同敌人战斗的队伍，在日寇来抢村时，我们才有抵抗的能力，更能有力量杀敌。

会上大家都同意麦主任的意见，并请出前柳城县政府军事科长陀××（名不记得）、大埔青年何正华及笔者，与乡长商讨定出计划及组织方法后，派出麦主任和陀科长为代表带上垦民十名携枪保护去向甘军长汇报，请示发给枪支、弹药、服装及开办经费，并以93军辖下的游击支队为命名，推麦绍东为支队长。两天后，麦主任陀科长满面春光的回来，很高兴召集了会议宣布，由支队长麦绍东和副支队长秦永固组织支队部，下辖3个营。以无忧垦民为基础扩大1个营，

另由乡镇自卫队组织1个营，由疏散在洛崖大埔的军警人员及学生、社会青年组织1个营。

由龙岸传来消息：第16集团军教导总队队长夏富光，副总队长陶衍江在龙岸山中集训人员，我即派员上去联络。总队知道我们人多枪少，即派陶衍江副总队长带两个班由船押送步枪100支、轻机枪10挺、重机枪2挺送到洛崖补充支队各营。

我队领到93军发给服装3000套，留下2000套给教导总队补充使用。同时教导总队欲向46军接近，因为他们在下个月可能通过此地向湛江出发。陶副总队长事先到此说明了情况，等总队到来连同我支队一齐前赴湛江参加正规军作战。

正在此时，古砦乡传来情报：日寇一个小分队到古砦抢粮食及抢妇女。我队即派谢副营长带一排，由乡自卫队龙正文带一队去包围敌人。并派一连在离洛崖北面20里处山地占领阵地，防止敌人向洛崖逃窜。

经过8小时之后，我派出之排回来报告：敌之小分队20人左右加上伪军40人正在古砦村抢粮食及妇女，被我一排袭击，敌人抵抗1小时，我自卫队赶到后向敌侧翼攻击。敌人不支而败走。此役打死伪军3人伤数人。我一排长负轻伤运回医治。

经过此次小战后，估计敌人可能会来打击我支队。因此一方面派政工队到附近村庄发动群众；另派员侦察伪军、日军行动。并同柳城县府、十五坡连防队，古砦镇公所、田村乡公所、冲墨镇公所和头塘、大埔、太平镇等处联络。有敌情即通知我支队，以便及时打击进犯之敌人。还在我住地四周

通道日夜派出班哨守卡监视。

经过半个月的整训，我支队各部队已准备就绪。在七月中旬，据报敌一个连队加上伪军200人左右，押运25条民用大木船由三江顺河而下，船上载有粮食及军用品，妇女200多人，在三日内可在我洛崖江面出现。敌船意图是给驻柳城凤山之日寇补充军需粮食并以200多名妇女作为慰问品。

接情报后，我支队长召集各营、连开会，并下达作战指示：

1. 敌船顺江而下，约三日内经洛崖。我支队决心将该敌堵击消灭之。并把船只缴获，救出船上200多名女同胞。

2. 派第一营以一个连占领洛崖左面之太阳岭构筑工事抵抗敌人；以一个连为预备队；第三个连在洛崖山下之岩洞配机枪一挺封锁江面之敌船，堵止在江两岸以备缴获。

3. 第二营以一连在通风山大道左侧之高地埋伏，待机袭击敌人；以一连在北岸洛崖山对面占领阵地，准备敌渡河时歼灭之；以一连为营之预备队随时听调。

4. 第三营之一连在冲脉路边之高地，支队部之右侧集结待命。

5. 通知洛崖镇所有人民群众由镇自卫队保护，疏散至杨柳村岩洞内暂避危险；并由该自卫队负责治安，保护该村避难群众；政工队在杨柳村负责放哨守卡，并与人民群众联系。

布置命令下达后第三天下午3时，发现敌人的先头侦察兵在我太阳岭前面1000米处河边造饭，我部队发出通知，注意监视敌人。

我们的目的是不打硬仗，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实力。

据了解敌人船队有其伪军一个连，有枪20多支枪，其日寇一个小分队约50人左右，步枪40支、轻机枪二挺、有六零小炮一门、掷弹筒四个，并有烟幕弹配备。

我们摸清这一情况之后，为了救出我妇女同胞和船民，缴获所有粮食，因此我们当夜放开阵地，给日寇船队过去一半之后再打。天将亮，我们发现敌船由上游下来，将至洛崖山洞前，被我军火力阻住前进不得，敌、伪军被迫泗水上岸逃跑。

我军立即上船把200多名妇女带回洛崖镇公所后，给她们在学校教室住下来，为她们烧水洗凉，没有衣服的则向居民征收来发给她们穿用。

第二天把所有各部队打死的日寇及伪军的左耳朵割了下来共得80个，挂在镇公所门上示众。把所有粮食（6万斤大米）搬了上岸交给镇公所，给得救的妇女每人发给20斤米让其回家，船夫每家发大米300斤，在战斗中牺牲的我游击队员二名，每家发3000斤大米作为家属的恤金。

我支队所获得的战利品运到大埔展览三天后交给乡公所保管。船只却待船主来认领。

这次战斗结束两天后，16集团军教导总队夏赛光总队长，带着7个大队经过洛崖，邀我们一同前去湛江找46军报到。当时我支队枪支系教总拨来，为了把这些枪支送到湛江，就把我支队编为第8大队，大队长由第一营长彭志远担任。我们就在8月上旬整装出发。到湛江后1月，日寇也投降了。

铁蹄践踏沙埔街

冯基仁、黄亚发口述 全树茂整理

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初八日晚上十二时左右，当地廖五的自卫队组织了从柳州疏散来的桂剧团二十多人，在沙埔新街圩亭演桂戏《杀子报》。当晚看桂戏的群众约五、六百人，挤满了圩亭，非常热闹。在看到精彩场面时，突然遭到从凤山方向来的日本鬼子约五百多人的袭击。据说这帮日本鬼子是当时凤山的维持会长大汉奸黄科瑞带来的，枪响后，不少群众连东西都顾不上搬就成批的向大村、大穴、长塘这条路线拼命逃跑。当时的自卫队长廖五领导大约五十多人驻扎在乡公所，但也被日本鬼子包围了，于是展开了激烈战斗。到次日上午十时，自卫队因无部队增援，被迫突围，向黄桂村和大村方向撤退。在这次激烈战斗中，自卫队牺牲十多人，鬼子伤亡约七、八十人，他们的死尸用马掙走。鬼子在街上对群众进行大屠杀，约有30多人惨死在刺刀下，还有30多名女青年遭日本鬼子拉进水二寨屯赵宝元家院子轮奸。鬼子侵占沙埔后，每天杀人、放火、强奸、掙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群众的强烈愤慨，要求自卫队、国民党驻军教训鬼子。农历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国民党军队的马副团长带了一个营的士兵来到石桥村叶家屯驻扎，配合当地冯常钧的自卫队200多人，在鸡公山和大安一带准备向驻扎在

沦陷时的沙埔

刘克武

日寇侵入，沙埔沦陷，我县先前已组织自卫队。当时曾贯之为柳城县河东抗日指挥所主任，冯常钧为沙埔上雷、太平乡联队队长。联队所属的有自卫队长廖武、肖冠廷、汤观明、黄白宾、陈仲明、朱清、农一荣等。抗日时期，各个自卫队担负治安之责，同沙埔境内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兹将沙埔沦陷时的惨状，略述如下：

一、日寇侵入沙埔是在1944年农历9月23日（公历11月8日）半夜。鬼子兵连续地过了三个昼夜，有些走不急的群众，被打被拉，谷米猪牛鸡鸭被强取豪夺，住房被烧光。24日黄昏，适有由柳州疏散来的难民男女老少成百人在沙埔圩街上住宿，遭受灾害，男的被拉、女的被强奸、小孩被蹂躏，情景凄凉，鬼子太无人道！

二、1945年农历五月初八晚间二时左右，驻在凤山日寇，开进沙埔街，团团包围，驻扎在街上小学，廖武、肖冠

（紧接上页）沙埔街的日本兵发起进攻。但狡猾的日本鬼子闻到消息后，估计情况不妙，于是在24日晚上12时左右，被迫向东泉和凤山两个地方撤退。（柳城县政协供稿）

廷自卫队也被围困，双方激烈地战斗起来。将至天大明，廖武、肖冠廷因为自己势弱力薄，寡不敌众，立即撤退，有11位自卫队员被打死。街上群众被拉夫成十人、被打死七人、年轻学生、妇女被拉20余人。强奸的强奸、轮奸的轮奸，猪牛鸡鸭谷米被抢掠一空，房屋、门窗、桌椅多被打烂毁去，在沙埔驻扎十余天，弄得圩街一片悲凉，损失惨重。

三、1945年农历五月初九（公历6月18日），在沙埔宿营的日寇，开往古仁，围攻曾贯之的住屋，团团包围。里面有指挥所自卫队长农一荣领兵四、五十人防守，坚持激战到深夜。农见敌兵众多势强、武器精锐，穿墙炮、毒弹炮都有，围墙房屋已穿烂，遭受毒弹烟雾的袭击，眼泪双流，鼻子出血，当时死去二人。更深时，农见情况不良，便命令打一条路撤出。疏散出去的约三百人，大部份已退出，少数来不及撤出的，被捉20余人。翌日即行枪毙，连同阵亡，总共50人左右，敌人在古仁驻扎十多天，就撤回凤山城关去。

四、1945年农历元月初八（公历2月20日）早上，日寇由凤山开来三百多人马，围攻四角村，把全村围实。村里有朱清率领民兵20多、188师一个班正规军也在里面坚守战斗，直至当天下午二时许，当场击毙鬼子约40个。沙埔联队冯常钧、黄白宾也前来解围。用机枪扫射片刻，鬼子便溃退，向龙船山退兵，抵达龙船山侧时，被龙船山村林九自卫队用重机迎头射击，鬼子便退后转沿龙船山小河上游前进。在平坝过河，过河后不久又适遇白竹村罗房自卫队迎头扫射，鬼子当场中弹死一人，被擒一人，仓惶

窜往麒麟山旁过，转回凤山城去。

五、沙埔上雷古仁的娘娘山是境内最高的一个山，附近的一个岭，唤做一字岭。鬼子在该岭最高处建筑有炮垒战壕，维护其部队来往经过，并防我自卫队攻击。指挥所联队为了维护地方安全，决心要将鬼子驱赶出境。在1945年正月20日，冯常钧率领自卫队三百余人围攻一字岭，在下午激战一小时，民兵被中弹死去的有沈亚田、杨水旺等二人，冯见势不妙，命令收队下岭，同指挥所曾商议再次围攻计划，决定翌日晚上继续行动。用重轻机掩护摸上，先锋摸堆的，曾主任自拨出纸票二十万元作赏金。翌日晚上按照计划出动进行围攻，民兵气昂昂地向一字岭前进，廖武队长率领自愿民兵七个打先锋。摸到炮垒、战壕，激烈鏖战约一小时，廖武发觉弹尽力倦，就命令收队下岭，转回队部，接着不久，鬼子也撤退下岭，此后鬼子不敢再登此岭。

六、1945年4月下旬，美机被击，跌落沙埔大穴屯、黄贵岭半坡。最先到达观看的是陈仲明自卫队。该机飞行员在机旁坐着，手持短枪，东瞄西望，惊恐不安。陈仲明见状不好，便拿起国民党的国旗来摇，给他观看，使他知道是中国人控制地区。而后该飞行员才放下手枪，民兵群众方敢近前。陈仲明接回他家山田屯住宿，翌日便送沙埔联队部。因语言不通，交谈时只用手划脚比。当时适有疏散来的曹炳涛（香港人），叫其到联队和美国飞行员住宿，共同生活，交接来往，三天后便着人和炳涛将该飞行员送到古案乡政府。曹炳涛送去归来谈及：几天后便派科员周炳辉和我一同陪送该飞行员到重庆中央去。

沙 埔 记 事

张 宏 德

一、沦陷前的沙埔

日寇侵入柳州之后，我们一家辗转逃难到沙埔。到了沙埔不久，日本兵也到了潭竹坪，但还没有向沙埔进发的迹象，所以这里还是个“世外桃源”之地，照样三天一圩，热闹也不减当年风貌。虽说是兵荒马乱年月，物资紧缺，但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油盐柴米还是能买到的。由于这里还是个暂时“安全之地”，所以吸引了许多逃难者，于是每天都有不少人逃到这里来落脚，我们住的那家楼上就有二十多人，都是来自省外，说话就有好几种口音。因各人情况不

（紧接上页）七、黄可遂（瑞）是凤山城关街人氏，凤山是旧县政府所在地。我们柳城沦陷后不久，黄可遂便起来联系日寇在凤山城关街组织维持会，凤山的以他为维持会会长。他到处活动，竟敢到沙埔上雷古仁四角等地来，抗日指挥所联队等处，坚决不答应，坚持抗战，把日寇驱赶出境，不做亡国奴。

黄可遂垂头丧气地回到凤山，不久他儿子失踪，他认为是指挥所和联队等处扣押其子，故带领凤山的日寇部队，前临沙埔古仁，攻打围剿。沙埔抗日沦陷，遭受灾害，损失惨重，卖国贼黄可遂罪责深重。（柳城县政协供稿）

同，经济有限，所以也只好“因地制宜”地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经济富裕的，就一日三餐，经济不富裕的就一日两餐（早稀晚干），反正吃了也没事做，在那里闲着度日。

不久这里来了一行二十多人的桂戏班子，不几天，就开始演戏，主要还是想弄两个钱维持生活而已。在那种年月，能看上桂戏是极其稀罕的，所以一开台就吸引了方圆数里外的人前来看戏，后来消息越传越远，每天晚上来看戏的人逐渐增多，把一个长约50米，宽20米的圩亭挤得水泄不通，戏台两边的空地也见缝插针，热闹空前。

有一天，一架美国飞机，因故坠落在沙埔圩左侧不远的黄贵松树岭上，此时不少人立即向飞机坠落的地点奔去，飞行员立即展开美国星条旗，以求保护。沙埔当局将飞行员带回来，安排住处，在物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把他象高级贵宾似的供养起来，晚上还陪他去看戏，当戏唱到精彩的时候，他也鼓掌和放声大笑。

不久，这里来了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自称是“国民党自卫队”。武器是一些老掉牙的“湖北漏”，弹药也不多。这些武器，在当时社会，只要有钱，随时都可以买得到。一天圩日，那位队长带着几个人，到圩上去宣传：“老乡们，我们这支二十多人的队伍，今天初到此地，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苦，但我们是为民抗战的，也得吃饭才能打仗，请各位父老兄弟酌量支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这是蒋总裁的一贯主张”。老百姓听说是“抗日的队伍”，如今来到此地，对保护沙埔的安全，也寄予了一点希望，当时有些人将自己在极度困难中的仅有也捐出了部分，以表心意。

二、沙埔惨案纪实

这支“抗日的队伍”的到来，一时给整个沙埔又增添了一层“安全”的色彩。戏班开台演戏，使人们沉侵在“安全”加“幸福”之中，从而放松了警惕性（包括那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在内）。

当戏班子处在演出高潮的时候，一天晚上，来了一批面貌陌生、年轻力壮的人，以往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来看戏，这一反常现象，并没有引起在大道口放哨的那些“抗战队伍”的警惕，这就是沙埔惨案的序幕。

这天晚上，戏临近十一点多钟才散场，大约鸡叫四巡，几声清脆的枪声震碎了黎明前的寂静，人们从熟睡中惊慌地醒来，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还没下得楼来，枪声已经越响越密，大家都感到，这是凶多吉少了。有人刚拉开推笼门，想出去看看，只见整个圩上到处都站满了日本兵，人叫马嘶，与密集的枪声汇成一首凄惨的交响曲。

所有的通道路口，无疑已经完全被封锁了，想从外面逃出去，那是插翅难飞，只好退回屋里，关起门来“听天由命”了。这时枪声渐渐停下来，大概是没有人和他们发生抵抗的缘故吧。但是接着的是枪托砸门，皮鞋踢门声，还有象野兽嚎叫般的喊声，充塞了整个沙埔圩。

天刚朦朦亮，大部分居民的门已经被砸开了，日本兵进家开始搜索。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外层是推笼，里层是比较结实的厚门板，所以一时还砸不开。这个家的人，借此一直退到最后面的厕所处，厕所后面是一道用薄板、竹席隔开的“墙”，已经退到再没有退的地步了。在这山穷水尽的时

候，为了逃命，大家一齐把“墙”推倒，人群蜂拥地从这个缺口冲出去。后面是各家各户分割开的菜园地，本来可以从这些不引起日本兵注意的地方转出去的，可是附近已经有日本兵的搜索队在搜索了，近到连他们讲话的声音都听得见程度，只因小菜园的围墙挡着，日本兵暂时没有发现我们而已。我们只好又顺围墙脚退下来，正好旁边有一间当地人叫做“灰房”的厕所（装干农家肥的茅草房），我们一闪进去就躲了起来。到了九点半钟左右，我们终于被日本兵发现了，七、八个日本兵，枪尾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把我们押走。

我们跟着日本兵，绕过几处菜园后来到一个果园，在果树下、墙脚下、小路旁，横躺竖卧着几十具死尸，从面容和血迹判断，是天亮不久被日本兵带到这里集体枪杀的。这些死尸中，多数是青壮年，有少数几具女尸。这时日本兵叫我们停下，一个日本军官从腰间抽出马刀，指着死尸，然后朝着我们喊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日本话。这时我们都慌极了，搞不好可能还会把我们集体枪杀在这里呢，约过了半分钟久，那军官挥动马刀，叫前面的士兵押着我们走了。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死尸旁边走过，害怕得连头都不敢抬。这些死尸，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只有加快步伐，尽快走出这块恐怖之地。后来打听到，这个果园的主人叫林道明，是沙埔街一户较富的人家。我们被带到圩边一间大房集中，那里已经有二十多人，加上我们这一伙，总数不下50人。

在黎明前的混乱中，各自都寻找逃生之路，我们家七口人就分成三伙逃跑，到集中地才发现父亲和三姐以及外甥都

不见了，这时才知道被冲散了。到第三天，三姐和两个外甥才被押到这里来，唯独不见父亲，一直下落不明，我们都为他的安全在日夜思念。

在我们集中住的房子不远，有一个约20岁左右的姑娘，当天晚上日本兵攻沙埔时，她爬墙逃走，被日本兵的机枪扫中大腿内侧，整个大腿全被打烂，骨头都露出来，她躺在竹床上痛得哭爹叫娘。在那种情况下，既无医，又无药，日本人是不会发善心的，象她这样的处境只有等着死，我们谁也没有办法相助。她的哭叫声把我们的心都撕碎了，不知后来情况如何？

我们住地后面，有一条流水清清的小溪，一天，我到溪边洗鞋子，一个日本兵朝我走来，挥动着柴刀，指着一捆生苦楝树皮说：“小孩，扛到那边，大大的米西米西，明白嘎？”我害怕，仍然低着头在洗鞋子，这时他又重复上面那句话，我仍然低头洗鞋子，装着没听见。这时他发火了，用柴刀背猛敲了我一下头部，问我：“明白不明白？”如果我再继续不理他，恐怕就有生命的危险，于是只好说：“明白、明白！”我走过去试扛了那捆苦楝树皮，因为太重，实在扛不动，后来他把树皮分成两捆，他扛一捆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出了南边街口就朝右拐，经过老乡公所前面就直向山脚一个村庄插去，沿途的坟地里、路边、水田里，到处都有死尸，尤其是倒在水田里的死尸，被水泡得拱起好高，此时正是高温季节，到处都发出死尸的臭味。估计这些无辜者都是那天晚上日本兵攻沙埔圩时，在夺路逃命时被击毙的，不然怎会死在路边和倒在水田里？

到了村前，日本兵叫我把苦楝树皮放在两口大锅旁，锅里正在熬苦楝树皮药水，不远的树下拴着几匹马，马背上驮东西被磨破皮，正流着黄水，招来无数苍蝇，原来他们是用苦楝树熬着药水给马洗伤口的。我放下树皮，立即往回走，这时那日本兵提着一只篮子追出来，把篮子给了我，里面装的是一些米饭和粗盐，我接过东西，回头就走，到了一个拐弯处就把篮子甩掉了（恐怕食物里放有毒）。回到圩口路边，见墙脚下躺着一具男尸，经仔细辨认，这人是日本兵未进沙埔前十天曾经在圩里讨过饭的乞丐，现在也没有逃过日本兵的枪杀，尸体已经腐烂，上面布满了大头苍蝇。我回到住处，把经过向母亲说了一遍，她才放下心头石。

三、忧中之喜

过了几天，我们就借故到河边洗东西之机，转移到离河边不远一间独立房去住，里面早已住着几个老妇人，她们见我母亲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同意我们在这里和她们一起住。

这房子附近有几个小村庄，每天晚上都有日本兵来这里找“花姑娘”，他们用刺刀掀开蚊帐，见都是一些老太婆，没油水可捞，每次都扫兴而归，几天以后，再也不见来了。

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刚躺下，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我们以为又是日本兵又来找“花姑娘”，全屋的人都醒着，但谁也不敢去开门。可是敲门声仍不断，并有熟悉的声音在呼叫我的名字。母亲在门边侧耳听了一会，觉得没有什么异常，就轻轻地开了半扇门，探头出去低声问

抗日时期柳州飞机场扩建见闻

梁 材

早在二十年代末，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集团统一广西之后，就选定柳州为其军事中心。常驻重兵、建立空军学校、开辟飞机场、创办兵工厂、机械厂等。抗日军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适设于此，柳州遂成为抗日时期军事重

（紧接上页）道：“那个？”“我”！原来是父亲，我们已经半个月不见面了，突然间在此相见，真是忧中之喜。父亲一闪进了门，只见他穿一身黑布唐装衣裤，脚上那双鞋子湿漉漉的。他低声对我们讲了那天晚上被冲散以后，被日本人拉去，在那里每天出外割马草喂马，他借此机会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终于知道我们住在这间独屋里。他还神秘地说：

“日本兵很快就要撤退了，因为他们近来的行动很反常，从他们说话和手势可以看出，在撤退前要把我杀掉。所以我今晚也和平常一样，挑着空箩筐出来割草，这样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顺便告诉你们，我今晚就逃过河去。”说话完，他伸头出门外望了一下，然后消逝在夜幕中。

第二天，日本兵就四出寻找我父亲，一个“二本鬼”问我们：“看见一个老头到这里来没有？”我们只用摇头来回答。从问话中就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大概又出于种种原因，日本兵又把我们重新赶回到圩里那间大房集中，到他们撤退。

镇。

一九三九年冬，桂南全线光复，美援物资源源运华。随着美空军来华参战，柳州机场已不足起降使用，且不能接纳盟军重型运输机着陆需要。地处西南枢纽的柳州，多山多洞，可凭藉群山作防空屏障，机场山洞宽深，可隐蔽飞机安全，乃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由于长期抗战急需，便于一九四一年春，趁桂南光复暂时平静，动工扩建新跑道两条、旧跑道也相应加长。新跑道设计，挖土深下米余，用料石填上后敷上水泥复盖成道面。用工甚多，用料甚巨，迨至当年秋季仅仅完成基础工程。抗日胜利，我远征军回国，就是以美国重型运输机将人马、大炮甚至大象载至柳州机场降落转运的。解放后，一九五三年由广西省建队又重修一次，更趋完善。

当年扩建、工地治安由46军、170师、五一零团担负。该部五月初旬由邕宁苏圩开抵工地。笔者任该团上尉副官，依稀记得工地情况。因跑道挖土工程庞大，征用民工（壮丁）七、八千人，还另有技术工程队（人数不详）。民工沿新挖跑道内侧搭棚安宿，吃于斯、干活于斯，用水靠气车运送，有滴水如油之贵，其工作与生活之艰苦由此可窥一斑。由于国难日蹙，北方逃难来柳难胞甚众。不少难胞竟往工地搭棚烧开水、煮稀粥、烤大饼、蒸馒头、贩卖烟丝香烟水果等，图谋一家糊口。据附近村民告诉：我团未到工地之前，夜间常有劫持难胞财物事发生，致使难胞雪上加霜。我团到来派兵日夜梭巡，于某深夜喊声四起，全员出动包抄，擒获持枪（土枪）劫匪三人。另一次发出空袭警报时，在机场

周围拿到手持太阳镜嫌疑汉奸六、七人，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治安重点放在防范汉奸活动。每闻警报就限制难胞行动，发现怀疑，立即搜身检查，保证了工地安全。八月间，我团奉命归还建制开赴湘南、因此未窥工程完成全貌。

扩建后的柳州机场，接纳盟国空军、如美国陈纳德飞虎队驻场。长沙三次会战及衡阳抗击战，飞虎队机群多由柳州起飞驶向前线助战。然广西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对柳州初建、扩建、修建均付出血与汗昂贵代价，在机场建设史上应占有其光辉一页。

注：①五一〇团团长是林一枝，归侨，原籍福建古田。陆大兼留学美国参谋学校毕业，谙英语、善交际，刚从南洋诸埠劝捐支援抗战回国。事业责任心强、生活朴素，素以良心血性为待人哲学，不久调升国防部少将处长，是桂系吸收的年青骨干。

②一九五三年机场修建，是广西省建队混凝土队长梁冠透露。梁是笔者的同乡，有布衣之交，修建期例假均见面叙谈。

有始而未能善终的 柳江大桥筹建工作

阚维端 吴 峻

柳州地处柳江中流，江水绕城而过，将市区分为南北两岸。附近各县物阜民丰，自古以来，柳州便是一个货物和木材集散的中心，亦为兵家必争之地。湘、桂、黔桂铁路建成后，更成为我国西南交通枢纽。抗战期间，柳州工商业逐日兴旺发达，市面繁荣，往来商旅云集。但有史以来，市内南北两岸交通，仅依靠一些落后的舟楫横渡，群众往返诸多不便，每年洪水泛滥期间，江面波浪汹涌，渡河很不安全，翻船事故，时有发生，死于非命者不知多少。而且在洪峰来临时，所有船只均无法往来，南北交通亦随之瘫痪，人民的生和生活和工作大受影响。抗战以后，北方大批难民迁移我市定居，部队来往亦多，军用物资调运频繁，市内人口猛增，南北两岸交通往来问题则更为突出了。原有的公路渡口，仅为汽车过渡而设，一般群众不能随便通过。不论军民等人，都为过河的困难而苦恼万分。再加上敌机经常来骚扰和轰炸，一遇警报，要过河找岩洞躲避，因过河不及而致牺牲的人为数也不少。

为了解决过河这个大问题，即由柳州军事当局的最高机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出面，架设两道浮桥。一道设在河南大码头，供来往行人通过；一道是车渡码头，专供车辆通过，但还是不够利用。后来又在窑埠码头增架一条临时浮桥，名义上是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人员通行，后来一般群众也可以通过；暂时缓和了南北交通阻塞的状况。

浮桥的结构，初期是征用木材商的木筏架设的。这种结构承重力不大，如遇空袭警报，老百姓来往过密时，浮桥就会整条下沉，过往行人随时都有跌下河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曾一度改用53加伦油桶作浮力架设，直至解放初期才改用船只做浮力架。

柳州自用浮桥作交通工具后，虽然暂时缓解了南北行人来往的拥挤问题，但仍出现很多麻烦，如晚间零时以后要拆桥，好让上下往来的船只通过，两小时后又要合桥。此外洪峰期间浮桥停止通行，有时来不及拆就被洪水冲断。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清晨，柳江河南岸发生了一起沉船淹死数十人的惨案，因洪水到来，南北交通由于拆了浮桥，人们过河，靠轮渡拍一拖驳运送。清早的头渡船人员最多，有学生、职工及做生意的买卖人等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由于人多，拖驳负荷超重，船身失去重心，瞬息间倾覆下沉，全船好几百人随滚滚急流落入江中。有的在赵家井一带获救；有的在灯台山被打捞上岸，事后调查，约丢掉了几十条人命，这场惨案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而国民党当局并未给予罹难的家属抚恤和其他善后处理。

沉船事件发生后，老百姓提出许多意见，市政建设当局

有鉴如此，为了缓和群众的激愤，杜绝类似惨案再次发生，以保障全市居民过河的生命安全，遂动了筹建柳江大桥的念头。即由柳州驻军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与柳州专员公署专员兼市政建设委员主任委员尹承纲为首，报请广西建设厅批准，成立柳江中正铁桥工程处筹备处（简称桥工处），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阙宗骥（字德轩）为筹备处主任委员，梁杓（字斗堂）为副主任委员。该处成立于一九四二年元月，行政业务及技术规划均直接由当时柳州市政建设委员会领导。兹凭笔者记忆所及，将其机构人员情况简介如下：

主任委员：阙宗骥。副主任委员：梁杓

秘书：陈延之

总务组组长：莫馁 组员：陈一旦，黎民望，黎楚石、韦祖定、蔡焕昌、李泽生、李金奎（字长庚）

财务组组长：徐炳章 组员：黎炳枢、吴峻

工务组组长：康泰庄 工程师：曾瑞福

工务员：杨丰、过培根、陈树森、陈树钦

会计组组长：谢碧荫 组员：罗承绮、杨延洁、杜肇荣、陈智馨

勤杂工：罗志、许松、涂荣英、黄炳光、马建生等。

桥工处的经费由市政建设委员会拨出当时的花捐附加（即从烟馆、赌馆、妓院抽出的税款）供给行政办公、水电和职工生活津贴用款。至于工程材料费，除等待上级拨款支付外，另发行房地产奖券第一期奖券，每张20元关金券。于1942年6月30日在三民戏院（现新华书店课本发行处，在五角星

附近），当众摇珠开彩。本市商人林松廷（林蕴辉中奖）。中奖房地基在大南门菜市斜坡，即现在的柳江路六号。中奖者为了庆贺获彩，立即宴请桥工处全体员工，表示酬谢，接着第二期房屋奖券面额也是20元，于一九四三年元月一日发行，当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慈善戏院（现今红会统战部对面）当众摇珠开彩。中奖者是来宾肖世英。中奖房屋在当时柳庆师范斜对面（现在中山东路6号）两期奖券得款，除用于建筑房屋开支的建筑费外，余款全部买了大桥钢材。正准备发行第三期房屋奖券的时候（奖品房已建好，地址是在龙家祠堂附近即现在中山东路11号柳州就奉命紧急疏散了。

桥工处原有两个办公地点，一个设在柳侯公园船厅内，在那里处理日常往来事务；一个设在五显庙码头（即现在大桥北端，亦叫覃连芳码头）的船上办公厅，进行河床钻探等工程事务。桥基河床钻探工程，原是市政建设委员会领导下的工程，后由桥工处继续承接这一任务，由工务员过培根负责。从南岸的光华码头开始，由浅及深，搜集了河床各部位的岩芯样品数百件，按编号顺序排列，分存保管，这些样品在疏散时，因沉船散失了。

柳州疏散是一九四四年秋，桥工处决定暂时迁往融县（即今融水），凡本处不愿随同疏散者，每人按原工资发给三个月遣散费。跟随本处疏散的，每月按原工资支付生活费。当时随处疏散的有主任阙宗骥（随家属6人）；总务组长莫媛（随家属3人）；财务组长徐炳章（随家属9人）；会计组长谢碧荫（随孩子1人）；庶务陈一旦（随家属5人）；单身职员蔡焕昌、吴峻、杨丰、杂工马健生、黄炳光、涂荣英

等二十余人。共租三条大船。船主吴太和。租金1000元(关金)。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三日，全处职工家属乘船溯江而上。当船驶到柳城上游鼓锣滩的时候，因滩浅水急，河道狭窄，船工船主措手不及，船遭巨浪撞击，两边摇摆失掉重心，水涌入舱，行李杂物全被打湿，部分箱柜落于水中，好不容易由熟悉水性的水手打捞上岸。真是逃难又遭难！据说那地方是草寇出没之处。年迈的主任尤其担心坏人趁火打劫，当机立断在现场召开全处职工紧急会议，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职工人身安全。幸好时值中午，立即组织警戒。抽调壮年职员陈一旦持土制手枪指挥，在岸边巡视，家属们则开箱晒衣物。九月天气，太阳炎热，不多时，衣物全干，收拾停当，已是晚霞满天，大家始安心上船吃饭。晚间在船泊湾水深僻静处渡过了一夜。次日拨锚继续起航，而载钢材之船，负荷过重，不能同行，经商量决定，载人之船先行，其余两艘载钢材的船，派职员蔡焕昌、杂工马健生押船后走，当第一艘船平安抵达融县时，正值中秋佳节，明月当空，家属烧香膜拜祷告无恙，临时租赁了桥头街欧均祥商号为住处。可是蔡、马两人仍未见到来。中秋后三、四天，蔡才急忙赶到，报告途中船出事倾覆下沉，马健生不识水性而葬身鱼腹。处里花了不少钱，多方打捞均无下落，仅将部分捞起的钢材运到融县。那时桥工处副主任梁杓出任该县县长，几经交涉，才将剩余的钢材，存放在县府内。

在融县期间，主任与县长相互往来，并与当地绅士胡宇平、余维倾等结识，得到他们指引，寻找退路，并打听到主任往日同窗永乐乡知名人士刘毅，及其胞侄阙维雍在军校的

学生韦志明的地址，旋即派人前往联系。融县疏散时，全体职工家属收拾细软，雇工挑行李杂物，直奔永乐乡。承蒙刘绅士的热情接待，主任与其畅谈古往今来，非常投契，直至深夜亦不愿就寝，其目的乃是联络感情而已。因敌情紧张，刘绅士漏夜安排伕力，拂晓时分启程，转往罗城龙岸，临行前由主任私人赠送一玉带砚给东道主，作为永久纪念，刘绅士感激万分。

由永乐至龙岸，约三十余里，均为山地，路经鹅颈坳，七上八下，道路崎岖，主任年近行走困难，不慎滑下山坡，跌得头破血流。经临时用竹杠绳索扎的一台过山轿，抬往龙岸乡地栲村韦志明家，全体职工就在那里安家落户了。

桥工处迁龙岸后，由于经费有出无进，物价又不断上涨，只好将疏散所存余款，提出一部分在当地购买稻谷，按月发给职工口粮，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五年夏天。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本处立即筹划迁返柳事宜。八月下旬，主任率领全班人马，由龙岸往小长安，乘船过和睦直下柳州。当船只驶入柳江河时，沿江两岸看到的都是断垣残壁，街市变成一片废圩，原来柳州城已经面目全非了。

光复后的柳州，民穷财尽，短期内实无法重建家园。主任有鉴如此，立即上书请示省府，听候处置，很快接到批复：桥工处暂时停办，即将逃难后保留下的档案资料全部清点，当时由陈一旦、吴峻两人具体负责清理各样测绘仪器和原来准备第三期房屋奖的楼房一栋，一一造册移交给柳江县政府保管。到此柳江中的铁桥工程筹备处的全部业务即宣告结束。

抗日时期的柳州图书文具业

盛德莹

一

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柳州的书店和文具店寥寥无几，开设在庆云路（现中山中路）较大的几间书店：其中有福记书局、兴盛书局、强华书局、元益商店、利群商店、生盛昌印务书局等六家，经营的图书文具大部分是由梧州四大书店（上海商务印书馆梧州分馆、上海中华书局梧州分局、上海世界书局梧州分局、梧州文渊书局）购进，以中学教科书为主，其次多是教学参考书和各类古典文学、小说等等，有几家还兼营部分文具纸张。

当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党政机关军事院校及沦陷区大批学校、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纷纷内迁，大批难民撤退来广西、云贵一带。那时四战区长官部也设在柳州，加上由广州、上海、武汉撤退的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名作家、出版社、报社、大书店大部分也撤退到桂林，其中由梧州最先迁来柳州的还有梧州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乐群书店、莫林记报局；同时，由广州迁来的还有开明书店、生活书店、新亚书店、北新书店、新生书店、上海图书杂志公司，还有由武汉、长沙、桂林迁来的有国新书局、荣

记书店、强记书店、群众书店、青年书店等。这些新迁来书店大都集中开设在庆云路（中山中路）、东大路（现中山东路）、培新路（现立新路），由于外地大量书店迁来柳州，而使本地原来几家书店也逐渐转营文具纸张文化用品。

当时迁来柳州这些书店经营范围方面也各有侧重。如商务、中华两家经营的图书都是发行本版的教科书、各种社会科学、科技、文学、文艺、中外名著、百科全书、万有文库，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历代经典著作，以及辞源、辞海、辞典等各种工具书。

从上述两家出版的图书目录来看，所刊印发行的图书各有数千种之多、都行销全国各地及海外香港、新加坡、南洋一带。

从全国来讲，还有一家较大的书店，这就是上海世界书局，它曾于一九二六年在梧州设立分局。在抗战前，由于它在几家大书局激烈竞争中失败，以致梧州紧张时结束没有疏散就来柳。

那时外地疏散来柳的书店以开明书店、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经营进步书刊为主。新亚书店、北新书店经营有各类教学挂图和学生读物。国华书局经营文艺、文学及学生课外读物及各种参考书。国新书局、荣记书局、强记书局、强华书局经营各种古今小说、通书（历本）等。至一九三八年，各地疏散来柳的书店和文具店又有不少变化：原来经营图书的几家书店，由于外地大批书店疏散来柳，致使一些图书生意逐渐衰退。如：福记书局、兴盛书局、生盛昌书局、元益商店、利群商店等五家改营文具生意。至一九四〇年开

明书店并到桂林、新亚书店也迁并到贵阳。

原新亚书店经理王吉人（江苏丹阳人）与光明书店周润波在培新路开设国风书店，当时上海几大书局出版教科书已在抗战后方贵阳重庆印行，由七联（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等六家与贵阳文通书局联合）出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订注册的统一教科书，版权所有不准翻印。但国风书店经理王吉人与第四战区长官部印刷厂互相勾结大量翻印，后被七联发觉向法院起诉，但久久不予处理。于一九四四年桂林上海印书馆经理钱辅卿来柳州，为了国风书店翻印其出版的两本书（学生模范作文、学生模范日记）。这两本书原由梧州乐群书店在广西打开销路、为各县小学采用作学生辅助课本，销量很大，几家大书局也对国风书店这种行为深恶痛绝。钱辅卿来柳后即聘请张兆元律师，代向法院起诉，但终因无法进长官部印刷厂查明事实，钱经理只得每天守在浮桥码头，有一天从河南长官部江边码头运出一船书至浮桥码头起岸，被钱及法警当场查出被翻版的教科书及模范作文日记等书，后来法院将国风书店查封。那时正值日寇逼近广西，柳州紧急疏散，国风书店已将大部分图书疏散到贵州独山。经理王吉人携家眷逃到都匀，后来独山大火，这大批图书被焚，王吉人也在都匀病逝，这样，一场官商勾结的讼案便不了了之。

二

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柳州的书店和文具店由原来的六、七家发展到五十多家，于一九三七年成立了图书文具业公会，选任（生盛昌经理）黄琳为理事长，当时会务主要

是摊派捐税、收缴商会会费等，会员无任何权利享受。在抗战初期由于外地疏散来柳的图书文具较多、市场供应未见紧张，但到一九三八年以后，图书要靠桂林和重庆来货，大部分书刊杂志是用土纸印刷的、文具教育用品除部分在内地能生产外，大部分要由沦陷区上海、广州进货。那时最缺的文具中有办公用品、学校和学生教学用品、科学仪器等，如复写纸、誊写腊纸、印刷油墨，价格猛涨，因此有同业不怕道途艰险由玉林步行至湛江（原有公路被破坏）乘海轮经香港转至上海采购运回，往返需一两个月，运什费用几乎是货价的一倍。至一九四〇年上海有很多文具厂商内迁，对柳州文化用品供应有所缓和。但每逢学校开学，学生用品：三角板、元规量度器、计算尺、作业本及教学用品，科学仪器、数理化教学工具等等，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福记书局不失时机在北门湾塘路菜园地盖起简易房屋，购制木铁结构划线机，以手工操作，生产各学生作业本、练习本、软皮抄本、日记本、批发给同业销售。三达文具社在北大路租得住房，生产墨汁、油墨、浆糊等。但是有很多文化教育用品在内地尚无法生产，要靠上海厂商大批经香港湛江玉林运来柳州，再由柳州运销给省内桂林南宁梧州等地。还有很多文具商在柳州设立临时批发机构，引来贵阳、昆明、重庆等后方中大城市经营文具的商贩。这些商贩大部分是经营文具的内行人，很多是上海鼎丰文化教育用品社、科学仪器馆、广州实学通艺馆等大公司的职员，在公司裁员的情况下离职改做行商（当时叫游击生意）。很多人发了财，同时也缓和了抗战时期后方文化教育用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但好景不常，到一九四四年八、九

月间，日军侵入广西，柳江商会通知各商店紧急疏散。

当时人心惶惶，国民党县府专员公署、四战区 长官 部等机关，到处封车封船，首先疏散官兵眷属、各车站码头一片混乱。图书文具业的店铺，疏散较早的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家，他们库存图书数量多、大部分由水运向融县三江一带疏散、还有几家老店刘福记、祝兴盛、生盛昌在柳州经营时间较长，对柳州附近各县乡镇的人交往甚密，有些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向柳城、凤山、大埔、柳江穿山三都、象县中平、罗秀等地疏散，而抗战初期由广州、上海、梧州及武汉长沙先后迁来柳州的图书、文具店，都由湘桂铁路和公路的沿线向贵州的独山、都匀、贵阳、方面疏散。还有几间书店到贵阳后继续向昆明重庆疏散。回忆当年柳州疏散时的一段情景，真是惨不忍睹。记得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几的一天，火车站内、外，挤满了难民，大部分是由湘桂路沿线撤退下来的。有军队、公教人员、有老百姓。再加上柳州疏散出去人和行李物资，都堆卧在月台和露天，估计也有两三万人，很多火车的车皮车厢排列在铁轨上。车皮和车厢上都用粉笔写了“长官部封用”、“铁路员工家属封疏散车”等等。很多人在月台内外睡卧数天，一见有车开动，争先爬车，扶老携幼。有些爬上车，又被赶下车，哭喊喧闹秩序大乱。有些难民爬上车厢顶蓬，更有些难民用木棍门板绳索绑在车底，一家老小爬进里边睡卧。有几次夜晚敌机空袭。飞机场投下许多照明弹和炸弹，一时人群乱跑，火车底下挤满人。等天亮后，很多难民的行李物资被偷，车站军警也无法维持，一片混乱，真是风声鹤唳一闻火车开动，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我

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柳州钟表业

许待安

（一）柳州市钟表行业发展变化的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以前，在柳州市（过去称为柳江县）没有完整的一家专业性的钟表店，只有在培新路有一家均和百货店（现在饮食公司办公大楼），兼营钟表摆卖手表、挂表不多，只在柜台行列里摆一角。另外在驾鹤东路有一家叫天大的修理钟表店（现在大桥左边食品公司驾鹤门市部），它是一家修理钟表和单车，兼卖一点旧钟表，老板是邓荣芳，一家人有的修钟表，有的修单车，也不是专业性的。

抗日战争以后，我父许有恒与友人合伙在上海租用亨达利钟表店招牌，来广西梧州经营钟表眼镜店，合伙资金共二万多元，上海股东占大股（占总资金约五分之四），当时组织的形式是经理周伦镛、副经理许有恒、协理周庆棠，帐房（会计）由上海股东派下来。店内经营权经理是名誉上的，实际是由许有恒全权负责，协理周庆棠协助经理管理好企业，责任是对上海股东负责。

（紧接上页）家老小四口有幸碰见了在铁路工作的同乡，帮我们挤上了铁路员工家属疏散车逃出柳州。以上记述是凭个人回忆，遗漏和不准确的地方在所难免，请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指正和补充。

（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梧州享达利钟表店于1937年8月左右在梧州大南路正式营业。经营钟、表、眼镜、表带，兼营修理钟表，是一个完整的钟表专业店。开业以后，顾客盈门，热闹非凡。每月营业额很高。但梧州是讲广东话的，店内除一个职工吴正才会讲广东话以外，其余十多个职工都是上海人，不会讲广东的话。为了要做生意，后来请了一个同乡胡承典（他是老梧州）做翻译，打通语言这一关，大大方便了顾客与营业员业务的交易。

1937年10月左右，广州沦陷，梧州日趋紧张。梧州享达利钟表店采取措施，把店全部搬到柳州小南路口继续营业。从那时起柳州才有一家完完整整经营钟表眼镜商店。在这个时期由于京沪各地沦陷，大多数经商者向湘、桂、黔、滇、川等地发展，柳州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外省人来柳经营钟表生意的也逐渐增多。

例如：①1938年间上海亨得利钟表店派葛传麟来柳州开设亨得利钟表店，资金由上海总店调拨，货源也由上海直接调拨。经理、会计、职工亦由上海总店直接任命调配。那时该店资金为20000多元，职工人数门市和修理约十多人，地址在小南路中段。

②1941年6月应国本与同乡合伙来柳州庆云路中段（现柳州大桥左边），开设大西洋钟表店，资金20000多元，职工十多人，经理应国本。

③1942年夏季，应国本、王雄夫等合伙在庆云路映山街口对面开设大中华钟表百货店，资金约20000多元，职工十多人，经理应国本，副经理王雄夫。

1943年初，在大西洋钟表店任职周麟彪退出大西洋钟表店，与人合伙在小南路口（当时真光照相馆隔壁）开设大光明钟表店，资金约五、六千元，职工不到10人，周麟彪自任经理。

在抗日战争后时期，柳州已成为后方的小上海，柳州的各条街道商店林立，市场繁荣，非常热闹，一般认为钟表业好捞钱，因而个人经营钟表又兼修钟表，开设门市部的人真是雨后春笋。如：

由亨得利钟表店退职的颜昌生在中山东路开设亨大利钟表眼镜店，主要经营眼镜。

由亨得利钟表店退职的张三益在河南浮桥码头驾鹤东路张钟路口开设徐昌钟表店主营钟表修理，兼卖手表。

湖南人姓刘的（名字忘记）在庆云路中段（现交通队附近）开设太平洋钟表店，主营修理钟表业务。

李仙传由桂林来柳州在庆云路映山街口开设惠林登钟表店，主营修理钟表业务。

由大西洋钟表店退职工人乐才新在庆云路中段开设亨大利钟表店，主营修理钟表业务，后迁坪石营业。

上面所述的是所谓一般大户和中型钟表店，个人摆设修理钟表摊兼售旧表的更多，遍及河南驾鹤路，鱼峰路、谷埠街，河北小南路、庆云路、正南路、东大路、潭中路、培新路下坡等各街道。柳州疏散时大部分向柳州四乡和附近各县躲避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回柳州复业者占少数。

（二）钟表商品货源的变化情况

从1937年到1940年之间，日军尚未南进占领香港以前，

所谓内地较大型的各钟表店所经营的钟、表、眼镜、表带等商品，都是向上海采购的，有的是由上海总店直接调拨的。如亨得利钟表店归上海总店管理，所需货源由总店直接调拨。

钟表货源因体积小，是由上海用邮包直接发往内地各省、市的。后来战火烧遍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的江、浙、皖、赣、闽、粤和沿海一带，并邮递线路长，邮寄时间久，因此邮寄的钟表类包裹，寄香港再转内地。为了加快资金周转，就将包裹先寄香港再寄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市），再由广州湾雇人力挑运至玉林。在玉林找汽车运至柳州。那时候柳州亨达利、亨得利两家钟表店在广州湾的赤坎均设有坐庄，专搞接货送货事宜。到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进，日军占领了香港，因而我们钟表的货源也告中断了。

其次，在手表的货源上，由于战火的关系，日趋困难；在1940年至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以前的一年多时间、也有运用飞机走私的。就是由航空公司内部人员与各钟表店联系，由各家写好一张要货清单到香港钟表店去按单要货。每只手表按进货价加10%作为手续费，货到交货交款，每次货款两清，这样搞了一年多，后来日军占领香港，这一方面的货源也断绝了。

（三）经营范围和品种的变化。

从1937年到1944年柳州沦陷前，柳州几家大的钟表店当时经营范围是国产挂钟、座钟；进口小钟（大部分是日本产的），进口手表、挂表、国产眼镜架、眼镜片和眼镜合；进口眼镜片，眼镜架，国产手表皮带，克罗咪手表带，克罗咪

挂表和修理钟表业务。

亨达利、亨得利两家钟表店在1940年以前还有一些国产的座钟和挂钟出售。后来因运输关系，钟（座钟和挂钟）也逐渐绝迹，主要是运输困难。到1941年以后没有钟卖变为纯粹的表店，只销售表，眼镜、表带了。到1940年下半年以后，为了扩大业务，钟表店也兼营自来水笔（即钢笔），所经营之钢笔是国产金星笔，美产的派克金笔和大卫钢笔等，1942年大中华钟表店开业时，又扩大为钟表百货店，它经营手表、眼镜、表带和洋杂百货。货源亦由广州湾进来。但在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以后，钟表货源越来越少，大部分钟表店都是卖存货过日子了。

（四）同行之间的情况

从1937年柳州开始有经营钟表专业店以来，较大的钟表店是亨达利、亨得利、大西洋、大中华四家。在当时只有亨达利、亨得利两家钟表店时，虽是同行，又是同乡，但同行如敌国，互不往来。从表面上碰面时还打招呼，实际暗中斗争是很激烈的，互找短处，想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如1938年间，上海亨得利钟表店来柳州开设分店，亨达利钟表店为了争夺市场，在培新路增开一家西安亨得利钟表店。为了招牌问题，上海亨得利向柳州地方法院起诉，控告西安亨得利冒上海亨得利招牌，要取消西安亨得利招牌和赔偿损失。两家各执一词，请律师大打官司。后来由上海亨达利和亨得利出面调解，西安亨得利改为亨达利而息讼。因此亨达利在柳州培新路和小南路各设一门市部，后来到抗战中期，同乡来柳州经营钟表也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转调和，互

相往来，不分彼此。

（五）柳州沦陷的前后钟表业的变化

1944年9月战火已烧到广西，柳州已呈为紧张状态。从9月初起，柳州各街道居民和商户，都准备向近郊、附近县份和贵州一带逃难。那时柳州的钟表业同行除中小户向近郊和附县份逃难外，其向贵州一带逃难的有亨得利、亨达利、大西洋、大中华、大光明、亨大利、餘昌等钟表店。其中亨达利钟表店当时遣散部分职工外，全店逃至贵州都匀继续营业约三个月。后因日军打到贵州独山，听闻独山大火，又逃至四川泸州市。大西洋钟表店由柳州逃至贵阳，在贵阳中华南路十字口继续营业开大上海钟表店；亨得利钟表店逃至贵阳，与贵阳亨得利钟表合并（因直属上海总店管理，贵阳亦属上海总店管理因而合并）；大中华钟表店职工全部遣散；大光明钟表店逃至贵阳，在贵阳中山东路十字路口三一商场内摆摊；餘昌钟表店逃至贵阳，在贵阳中华南路贵阳戏院摆摊；亨达利钟表店向贵阳方面逃难，后来情况不明。

当时，从柳州向贵州方向逃难是非常悲惨的。一路上日晒雨淋，没有吃，也没有睡。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国民党政府也不管老百姓的困难和病老死亡，真是怨声载道。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钟表业同行才逐渐回柳复业。

（六）柳州光复后相继复业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柳州光复。我们经营钟表同业，相继回柳。在被日寇焚毁废墟上重振旗鼓。柳州的庆云路（现在中山中路）亦由那时兴旺起来，外省人

首先来柳州复业的有大中华钟表店的朱道和和中美钟表店的应华章两人，店设在庆云路西段（即映山街对面），两家各有资金2000多元，经营旧表和修理钟表。后来李金鹤由独山搬来与崔柏芳两人在庆云路柳新街口对面开设亨达利钟表店，经营旧表眼镜和修理钟表。我父亲许有恒于1946年2月从贵阳来柳州筹备复业，在庆云路西段（现红会医院地址）以亨得利钟表店于当年4月初开业。大光明钟表店周麟彪（店设在小南路口）于1946年5月开业。大西洋钟表店应国本（店设在庆云路西段映山街口对面）于1946年6月开业。

那时资金最大的是大西洋钟表店，有10000多元，亨得利钟表店有6000多元，大光明钟表店资金有5000多元，亨达利钟表店约3000元左右。当时各店经营商品是经销旧的大挂钟、翻新的瑞士手表、旧庄壳表和原来带到贵阳等地卖剩的一些新瑞士手表，兼营眼镜、表带、钢笔和修理钟表。到1947年初，原来逃难在四川泸州的柳州亨达利钟表老板周庆棠也回柳州复业。当时在柳州经营亨达利钟表店的李金鹤将招牌归还周庆棠，店址顶与周庆棠（与李合伙的崔柏芳进亨达利工作），李金鹤自己另在庆云路近十字街口开美达利钟表店。总之，从1946年起到1948年底左右，专营钟表较大的有大西洋、亨达利、亨得利、大光明、大中华、美达利等外，其他经营旧表和修理钟表的有宝华、中美、桂成、天大等，但资金不多，大约在1000元左右，其余如奇新、铭记、利华、陈奇生、维纳斯、胜利等有十五、六家都是个人或两人合做修理钟表的。

（七）解放前夕和解放后钟表业的一些变化

到1949年5月以后，全国临近解放前，我钟表业同行亦由武汉、衡阳、宝庆等地搬迁来柳，其中拥有资金雄厚百年老店的武汉亨达利钟表店二家（陈老章兄弟俩）。太平洋钟表店庄宝钦，衡阳的华盛顿钟表店周永火，大光明钟表店缪成坤，宝庆的亨得利钟表店庄鸿安（他在湖南洪江亦有一家亨得利钟表店）。他们的变化是这样的：

1、武汉亨达利陈志章顶盘原柳州亨达利钟表店店址，继续营业，到柳州解放时将店内全部职工货物搬往昆明，将店址顶与美达利李金鹤营业（五反后搬往南宁营业）。全国解放后，陈志章由昆明搬往武汉复业。

2、武汉太平洋钟表店庄宝钦在柳州庆云路中段龙城街口对面复业，仍开太平洋钟表店。到柳州五反运动结束后，将店结束搬回武汉继续营业，将店址顶与仁信做百货店。

3、衡阳华盛顿钟表店租庆云路中段龙城街对面开设一铺面继续营业，后来合作化高潮时参加合作社。

4、衡阳大光明钟表店在庆云路中段天星巷口以西门子钟表店继续营业。

5、宝庆亨得利钟表店在河南驾鹤东路张冲路口对面以亨大利钟表继续营业，后来合作化高潮时参加合作社。

6、原来亨达利钟表店周庆棠将店址顶与武汉亨达利钟表店后，与亲戚崔大根合伙在庆云路中段龙城街对面开设派克钟表店以崔大根为经理，周本人回原籍宁波。五反后，派克停业，崔亦回宁波，将店址顶与大西洋钟表店营业。

7、解放以后到1951年底，亨得利、大光明、西门子三家为了进一步接受改造，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私人联

营改为联合为水笔行，于1952年1月开始营业。后来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企业亏本，到1953年11月初申请，获上级批准于11月底停业，周分顺、缪成坤回宁波。

8、大中华、美华利、西菲利、时代四家于五反后，为了进一步接受改造，四家合营，申请上级批准，于1952年8月改为国泰水笔行，以刘鹏为经理。

由于以上各种的变化，到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时，实际经营专业性钟表的只有大西洋一家参加公私合营，其他如天大等和个人钟表修理都转入合作社。到1956年公私合营高潮时参加公私合营的是大西洋钟表店应国承、国泰水笔行刘鹏、魏汉湘、朱道和、邱明辉、茂昌眼镜店许待安、以及两家摆水笔摊的王绍华、朱子明共八人。

（八）经营的钟表货源和商品式样的变化

在抗战初期，我们经营专业钟表在货源上当初是在上海进货的，品种花色都齐全。如大钟有进口的德国产的肯士林和美最时新的五音极刻打点长挂钟和打点长挂钟，有上海产的昌明钟厂和上海钟厂的新式台钟和一般座钟、挂钟，以及国产闹钟和进口闹钟及小钟等。当初运输畅通，来货容易。到1940年以后，由于物体大，路途远运输困难而断挡。

胜利后，到1949年以前所出售之长挂钟，均系广州翻新之长挂钟和八挂钟；闹钟自1947年至1949年所出售是美国货的大鹏闹钟和英国货的背铃闹钟，数量不多；挂表、手表自1937年至1946年之间所售的手表均系瑞士产手表占绝大部分。机件和质量以有细马和粗马两大类。粗马机件较差，其中也有一种日本产的精工牌手表，美国产的爱尔近，华

尔逊、抱乐佛、汉密尔顿等牌子的男女手表，式样多系长方形，圆型占少数。

到1947年下半年以后，有新型的手表进口，货源均改为从广州市采购。在国内来说，是手表更新换代的开始。从那时起，过去长方型的式样，改为圆型的；小三针的改为大三针的；半钢的改为全钢的；没有防水防震的都改为有防水防震的。男女手表式样新颖美观大方，有双日历的，单日历的，全自动的，半自动的，K金壳的，夹金壳的，镀金壳的。女庄过去是长方的，改为方的，圆型的，挂表也随顾客的心理由多种逐步转为单一的，品种也越来越多了。也可以说现在销售的圆型手表也是由那时起更新换代而来，也可以说对表的一种改革吧！

后记

我写这篇钟表业的纪实以1937年—1956年止。前后是20年，由于我认识肤浅，水平低，所写的内容是粗糙的。结构也是不紧凑的，只是说明在这20年中有这么一回事罢了。

在解放前的旧社会里，人对人之间的表现是唯我是上，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真是做生意要赚钱，连自己爹娘也要骗三分。

从接触的事物—商品的构造、质量、式样说明了社会在发展，人的智慧在飞跃，对物质的要求在提高。

（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柳州市镜画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

覃宝峰

一

在民国初年柳州的庆吊风习，凡亲戚朋友有婚、丧、喜、庆，都以送贺联、挽联、堂联为庆吊之礼。于是就有这种专做“长联”的店子了。在柳州开业最早的要算挑水巷（今曙光中）的顺安泰，它经营各种纸张和长联。这种“长联”经过人工裱画，还请“先生”撰写。顾客来店订制，按照顾客心理去选择。还有写好的贺联、挽联、堂联，没有落款，等待顾客选好那一副了才落款卖出。这是很麻烦的事了。后来顺安泰的童老先生，从广东带来新招，吸收西洋镜画改为各种“贺匾”，用玻璃框装起来，美观、大方、适用。于是，推广到柳州四乡去，遇到亲友喜庆日子（新婚、进新屋、商店开张等）就到那里买一块“镜画”来送礼，既简便而又有纪念意思，何乐不为！这样一来“长联”就被淘汰了。柳州文人朱午迟在培新路开了一间大号“新新”的镜画店，但因他的画太值钱了，一块“镜画”要卖几元光洋，一般农民买不起，市民又欠懂赏鉴，很少客人到这间铺上问津，生意冷落，也就关门了。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对日全面抗战，上海、南

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南移到西南抗战的大后方。柳州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在沦陷区的机关、团体、学校、难民纷纷地涌到柳州来。柳州人口骤增，由七、八万人口增加到十多万人，市场由此而兴旺起来。新建的铺屋，新开业的商店也多了起来，庆贺送礼之风也浓厚起来，这样就带动了柳州镜画业的发展。最早开业的顺安泰老店 员蒙厚 福分出来开蒙艳光，迁到兴仁中路后改商号招牌为蒙宝光；镜妆业户龙怡昌看到镜画销路供不应求，也改做镜画生意；做板鞋的陆安记也兼营镜画；宏兴原做纸张为主的生意，见镜画有利可图，也改为以镜画为主的批发生意了。从南宁、梧州、贵阳、广东迁来的丽明、义明、金明、常明、丽华等十多户，也生意兴隆起来。

三

玻璃镜画的手工业者，称为工艺师傅，大的镜画铺有两个到三个师傅。如宏兴、丽明，还有几个辅助工人或学徒。龙怡昌、李云瑞的丽华、蒙厚福的宝光、罗雅兄弟的义明、常明，都是自己是工艺师傅开业的家庭作坊。他们的产品有西洋水彩油漆画、有玻璃镜面雕花画、有纸版字画镜框等，价格便宜、美观、大方、适用，深受四乡用户欢迎。

当时，南宁沦陷，广东、湖南告急，比较安定的柳州，就成为镜画的生产基地。沿柳江上下游的乡村城镇的小贩，多来柳州进货批发贩运，甚至远销贵州、云南。一到秋、冬，镜画的生意进入旺季，镜画铺就忙开了，每夜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收工。那时的镜画生意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啊。（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抗日战争前后的柳州银楼业

刘郁卿

柳江县（现柳州市）银楼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47年3月10日。它的会员包括江西籍老字号各金号和广东籍如宝元、宝荣等公开专营金银首饰的商店，共有会员约32家。

一、柳州沦陷前经营情况

经营金银首饰行业，年代久远，已难稽考。抗战前，柳州苏杭街（现小南路）即有南泰、盛荣、东盛、钜丰、西南，大南门（现曙光东路）有金亿和，还有唐天茂、隆太兴、明生、公盛等都是经营金银首饰为主的店铺。产品有婚嫁装饰用的手镯、臂镯、项链、金锁、凤钗、金耳环、金戒指或儿童用品麒麟帽花、项圈、脚圈、长命牌等等。也加工金叶、银锭之类。西南、盛荣、公盛、隆太兴几家是合股生意，资金多则约黄金百两，少的几十两，来料加工的资金就较少了。业务以南泰、盛荣、金亿和几家较大，有的一直经营到抗战时期，如刘东盛、吴钜丰，其余如金亿和、南泰、公盛等早已先后停业。民国十九年以后，广西政局相对稳定，广西银行重新发行钞票（简称桂钞），明令禁止金银买卖和流通。市场交易，会计结帐，规定以“桂钞”为本位。但柳

州附近各圩镇除上缴公粮、税捐公款外，一般农村土特产品交易特别是谷米油脂之类，仍是以广东双毫交易。地方乡镇公所，只要群众不拒绝使用“桂钞”，上级不来督促检查，也就听之任之，实是明禁暗流。至于广东双毫的来源渠道，则是各地收购土特产后，装船运来柳州，交沙街（现柳江路）经纪行代销。经纪行计价卖出后（桂钞交易，暗中也有银毫交易的），根据货主委托，或代购货物（包括广东双毫），或将“桂钞”交原船带回。

“桂钞”开始发行时与“东毫”的比值是一比一，以后逐步下跌，除“六·一”运动时情况特殊，“桂钞”与“东毫”之比，曾跌至0.3比1外，平时“桂钞”比“东毫”大致在七折上下（即一元桂钞值东毫七角），因此，当时物价基本稳定。金铺生意，买进金银加工后卖出首饰，还不敢公开大肆投机。

抗日战争以后，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相继沦陷，湘桂铁路通车，柳州因其交通方便，疏散到柳州的外地客商云集，原来只有几万人口的柳州这时人口激增，逐渐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后方商业中心。

1940年江西人毛祥云在庆云路（现中山中路）开老凤祥金号，后来老天宝、新天宝等金号陆续在小南路、庆云路开业，柳州开始有以金号正式经营的商店。抗战初期，即使到1942、43年间，法币虽然贬值，但物价上升缓慢（指农副土特产），市场游资，大部集中在桐、茶油土特产品，转运出口抢运回汽油、花纱、布匹、西药、纸张等大宗物资经营。因进出口利润较大，金银波动幅度小，也不敢大

肆公开买卖，只在暗中交易，影响不大。

1944年后，香港、越南沦于日寇，广州湾（现湛江）、河内各地口岸，被日寇堵死，市场游资，转向金银外币。六月间以香港巨商永隆为后台的永隆金号，在沙街开业，并聘请当时商会常务理事张殿卿为经理。永隆金号的出现，使金银公开买卖推进了一步。过去只是柳江路经纪行暗中“斟盆”，庆云路金号店铺加工首饰，这时则有行市可寻。不过日寇南侵之势已成，长沙沦陷、衡阳告急，永隆金号在一片疏散声中夭折。

1944年十一月九日柳州沦陷。1945年六月底日寇被迫撤出柳州。在撤退时纵火焚烧全城，六月后疏散在郊区附近或远地的得到日寇撤出柳州消息的人，先后回柳，但房屋一片瓦砾，必须先盖好房屋才能回来。先回来的以西门为多，因而当时在人字街口（中山中、西路交界处）雇工的，买建筑材料的、摆摊设点的，直至金银买卖，都在这一带成交，人字街口十分热闹。由于为提前回柳州的多数或多或少带有硬币，这时抛出代钱应用，所以，黄金卖多购少，也不知外地黄金白银价值多少，由六月底的每市两法币七万多到七月份就八、九万元，以后逐月上升，到年底即已超每市两30万元，买港币每元值法币五百元，袁光每元值法币一千二百元。市面已逐步以关金为计算单位。一元版法币，市场叫做“湿柴”。

1946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双十协定》，发生较场口事件，群众眼看国共合作共建家园的前景即将为内战所代替，原先江西疏散去重庆、贵阳

等地的人，因回籍意存观望，于是纷纷在柳设店开业。而开业最简单的则莫如金铺，只要把门面装修、有柜台设备、摆上三几十个金戒指、耳环、项链之类，即可营业，资金多少，任由自己登记，是无人稽核的。开业之后资金不足可以提高利息，争取存金，周转不灵，急需应付，可以借入“日息”，平时还可以邀人做会，参加别人做会，用标会来筹集资金，敢于冒险，开业后资金是不愁的。

1946年到1949年间，先后以金号为招牌商店的，小南路有老凤祥金号、老宝成金号、老宝庆金号，其余为：同振、宝昌、刘东盛、吴钜丰。庆云路有老天宝金号、新天宝金号、同丰永金号、天宝楼金号、老丹凤金号、庆成、汇丰等。中正南路（现解放南路）有老天成金号。培新路口有宝元、国泰、宝兴、宝荣、永兴祥、福源、和昌、宝华。古香（曙光）东路有集兴金铺，河南驾鹤路有老文兴金号、老宝盛金号，老同兴金号同和、万园、永华，永兴等经营金银商号。

上述这些商店，凡有金号两字的几家，全是江西籍商人，故一般习惯称他们为“江西帮”，而广东籍及地方人士所经营的不缀“金号”两字，间有写金铺两字如“集兴金铺”的，习惯称这类商店为“广帮”。

1946年底柳江县商会酝酿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改选，金号为了争取经营的合法性，在商会同意下组织了柳江县银楼业同业公会，并推举老天宝金号经理余浩然为理事长。

1946年以后，柳州市内做会风气日盛一日，日息也开始出现，市场黄金白银买卖，也日趋活跃。金号名义上

是经营金银首饰，来料加工，实际上是炒买炒卖，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在这段时间，市场也爆出一些冷门，造成少数幸运人物，如王祥泰、罗文阶、骆廉、周莲英……或以投机致富，或以做会起家，一时引起人们羡慕，但通货膨胀，投机者未必长握胜算，最后还是要失败的。

1947年2月，上海发生黄金风潮。国民党最高当局紧急通知各地禁止黄金、白银、外币买卖（原来就不准），不准流通使用，还禁止银钱找换，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必须向中央银行出售。原来在柳江路中间的炒买炒卖，随着禁令停止，银楼业各会员商店也进入冬眠状态。

二月十七日中央银行挂牌收购黄金每市两国币480万元（足色）美钞每元兑换国币11,640元，中央银行的收购牌价，当时每两黄金约高出黑市价20万元。我们猜想中央银行提高牌价收购，以为可以多收购一些黄金，殊不知适得其反，挂牌以后，黑市金价迅速上升。开始挂牌时中央银行每天能收进一百几十两黄金，一星期以后，黑市金价即超过中央银行牌价，中央银行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黄金白银买卖，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禁止的。不久柳江路中段，骑楼底，街中心，一些“九八佬”在国华酒家（在柳江路）喝完早茶以后，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昨日各地传播的信息，物价的涨落，这个说我有几条“泰条”（指泰国10两装金条）出手，那个说：我有客要进几条金条，如是你一言，我一语，议定价格最后双方直接找到买主、卖主，一言为定，当面成交。如若议价不成，到下午四点多钟各自回家，明日再谈。这种炒买炒卖市场，不但迫使

银楼业会员每天要派人密切注意信息，制定自己的购销计划，就是经纪行虽有雄厚资金也得随波逐流，紧密联系。各行各业都得注意当日黄金成交价格。

二、两帮经营作风各有不同，信息也各异

柳州市专营金银首饰的金号三十多家，但作风不同，因语言关系大体可分为两帮，江西籍经营的金号，大多是购进黄金，加工金手镯、戒指、耳环等既赚加工费，也赚成色（戒指之类、成色不足）费，多数以门市为主，间中也在柳江路踏入一足。由于语言关系（或者尚有些排外性）与广帮同行来往甚少，因此江西帮在经营上较注重门市销售和吸收存金，在信息上虽也来自上海、广州、汉口等地行情，但是以本籍同行为多。“广帮”金铺资金较小的多以门市金银首饰零售为主，也做代换金银、外币生意。资本较大的除开展门市业务外还参与柳江路的炒卖黄金白银。“广帮”因占地利人和，业务一般较江西帮活跃。1946年起，由于市场的投机倒把，少数金号收购首饰、仿制泰条（6两装）、港条（十两装）出售，欺骗群众（首饰的金，成色不足）。1949年九月间柳州最大间金号老天宝倒闭，八十多个债权人，损失存金180多两，经理余浩然外逃，则是当时通货膨胀，投机倒把的结果，也是抗战胜利后最大的倒闭案。

三、金银外币的来去渠道

抗战初期，香港、广州疏散回来的富商巨室多数携带有黄金外币，经沙坪、肇庆而进后方，不少的就在柳州开店设市，换出黄金外币。也有出口物资，购回黄金外币带回。沙

金则来自藤县一带；银毫则由梧州、桂平等地运来柳州，光洋多数来自湖南。1942年以后，金条多数来自东兴，河内、西贡等地（即所谓六两装的泰条），抗战胜利后（1946年）金条大部分来自泰国，光洋在市面较少流通。以后泰国来货渐稀，金条则由港澳来货（港条是十两装），交易也以港条为主。这是由于当时国际工业用银较大，价格上涨，在国内出口到香港；五十两白银即可换回一两黄金，而柳州一两黄金值白银七十五两，至利率达5%。抗战初期，白银源源向少数民族地区销去，1948、49年间，白银仅由少数民族地区流回柳州，又由柳州流向梧州、广州、香港，市场白银外流了。

三、“币制改革”使银楼业望洋兴叹

炒卖黄金、白银、外币，向来是政府所禁止的。1947年政府重申禁止流通以后，金、银买卖，转入地下。一些官僚资本、军政要人、富商巨室的游资，加上通货以天文数字发行，物价飞涨，一日数度，于是黄金买卖，几个月之后，各地又逐渐公开。柳州也不例外，但究竟没有明开放，谁也不敢公开经营。因此，三几个“九八佬”开始在柳江路若即若离的闲谈，暗中成交，其后逐渐发展，为了保存币值，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既投机日息追求高利，又插手黄金，投机倒把。当时地方政府官员是知道这种情况的，可不知如何处理，听之任之。到1948年六月，当时政府准许黄金白银买卖时，市场更形活跃。当物价波动，市场看好时，柳江路中段骑楼底、街中心，人头攒动，互相探询，最多时一天花纱可成交三百多件，黄金过千两。有买一

百几十条的大宗交易，也有一条两条的小意思，有一亿几千万元的抛出，也有一千几百元的小债借贷，男女老少（女的不多），有的直接参战，有的作壁上观，聚散无常。

银楼业会员、虽有三十多家，但在这种市场，就显得太渺小了。即使根据外地市场判断：黄金价格就要下降，但你能有几多黄金可以抛出？反过来黄金明明就要涨价，你又能购进几条？在物价波动时，日息高达每百元3—5元，不是自己的固有资金，市场稍一徘徊，日息就要坑人。当时玉祥泰失败于前，惠德行垮台于中，老天宝倒闭于后，还有华记钱庄的垮台，当时都是很典型的。银楼业的会员在这种大起大落，大买大卖的场合，真是小巫见大巫，只有“望洋兴叹”了。

柳江县商会见黄金、白银准许买卖，想把这种街边交易管理一下。征得当时政府的同意，在黄公巷2号成立了“柳州交易所”，规定金、银、外币进所交易，成交登记，酌收费用。初时买卖双方认为这样成交有保障，乐意在场成交，但不久买卖双方都顾虑重重。因为要登记，当然是有人有地址的，以后追查，不要讲非法所得，就是纳税也纳不起的，因而交易所不到一个月就冷“落”。恰遇同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规定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元券一元，二元金元券换银元一元，全国以金元券为本位，持有金银外币者限期于九月卅日前兑换金元券（后延至十月卅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因此，交易所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金元券名义上是十足准备发行，但群众是清楚的，这

柳州沦陷前后 工商业疏散概况

刘郁卿

(一)

一九四四年春节过后，物价继续一起一落，呈盘旋曲线

(紧接上页)是“大钞出笼”，以蒋经国“太子之尊”，“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坐镇上海，强调打虎。可是虎是捉到了，却打不成，金元券却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崩溃，1949年二月又准许黄金、白银、银元流通使用和买卖。1949年六月批发物价，有人做过统计上涨了120万倍，金元券挽救不了国民党通货崩溃，又乞灵于币制改革，发行银元券，规定银元券一元等于金元券五亿元，但是老百姓几乎完全拒用，不愿存放过夜。到了十一月间，光洋一元可换金元券16亿，市面交易基本上恢复以银元为本位。柳江路的炒买炒卖，更形活跃，一夜之间，有发财的、有倒闭的，这就增加了柳江县商会不少工作，倒闭一家商号，商会要派干事到该商店登记债权，债务，召开债权人开会征求处理意见，商会的总务股几个干事，加上常务成六七个人都忙不过来，天天有调解处理的会开。银楼业会员自发行金元券以后能稳扎稳打，少点投机的多数能略有盈余，凡进行投机大胆买卖的即使不倒闭，到年底能挣得几个的也不多见。（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上涨。柳荫路金迷纸醉，发国难财的人们，仍然是笙歌夜夜，沉迷酒色。四、五月间，市面即谣传敌人有打通湘桂铁路，衔接越南的企图。接着交通运输，日益紧张，有钱有势的寓公，悄悄地向贵阳、重庆转移。

柳州市工商业者，虽也忧心忡忡，却又舍不得发财机会，也丢不下企业财产，以为几年来，还不是讲了一阵，敌人又给我们打退回去了，意存观望，能断然提前疏散者不多。

六月底确知长沙沦陷，工商业者才惊慌起来，开始作疏散之计。但当时柳州市场，畸形繁荣，是西南大后方的商业中心，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甚至远及甘肃、新疆都有客商在柳州设庄买卖。交通工具不足，疏散谈何容易。这个时候，该卖的全部压价出手，该买的紧急抢购，高价雇车，立刻抢运，收庄回去。

当时湘桂铁路黔桂段只到六甲，六甲上贵阳就要靠汽车运输。这时转运及疏散物资，官方的、百姓的，因交通工具不足大批停留在金城江、六寨、六甲、麻尾、独山之间，道路多塞，但除向贵阳疏散较为安全外，别无它途。到七月份就更困难了。

七月间，敌人陷株州，柳州河南驾鹤路的运输行以及自己有汽车的商行，将自己的货物、家属向贵阳、百色等方向疏散。如大陆烟厂、大成印刷厂等则高价雇车，直接向贵阳行驰（事后证明，这是最明智的）。此外如沙街仁泰行、新记行等与融县长安等地有联号或关系密切的往来客户，则将部分货物陆续由帆船向上游运去。

柳州的向外地疏散去了，长沙，衡阳、江西等地疏散的

群众，以及河南、湖北等省的大专院校师生，却大量向柳州涌来。唯一退路，只有向百色和贵阳走去，而贵阳线路，六甲以后就不易移动，逃难人群，狼狈不堪。

八月衡阳激战，柳州柳江路部份经纪行如德昌、厚福等，小南路绸布业如兴昌、仁昌等，其他行业如广芝堂药房、大同春药房、平安、仁安堂则用民船向柳江下游的运江、象州、武宣等地疏散。这部分人的想方是：万一敌人到来，就向中平、罗秀、大瑶山转移。也有的为求不致于全部损失，一部分货物向柳江下游疏散，一部分向柳江上游三岔、宜山、融县、三江疏散。如德昌、仁泰、大同春、仁安堂等就是分两处疏散的。逃难的人们，纷纷雇车雇船，装运货物、行李、家属（这时电船及大民船均为军政专用）。柳江河面平时有一、二百艘民船，这时已寥寥可数，就是住家艇也被雇一空。平时到运江的小船运费，不过三、四元（东毫），这时涨到20元光洋一趟，还不易找到船只。因此，与邻近郊区有亲戚的或熟识的则疏散到拉堡、三都、成团、长塘、洛埠等地，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国民党当局，只顾自己逃命，至于敌人从哪里来，群众应向哪方散，根本不管，这就造成极大的盲目性。例如当时群众只考虑敌人经衡阳、黄沙河，过全州向桂林，分向临桂，中渡趋柳州，就很少人考虑敌人经丹竹机场，扑向武宣三里、向寺村、象州、里雍而进柳州，因而柳州疏散到运江、象州、武宣等地的商号货物，除运到中平、罗秀有可靠的亲朋关照者外，其余的如广芝堂、仁安堂、厚昌、德昌等疏散在象州、运江、武宣一带的，虽然都有人随货同行在疏散地看守，但当敌人到来时

躲开，三两天回来一看，已荡然无存，胜利后回来已不能复业。有的疏散时还未到目的地，中途就被土匪拦路抢劫苦不堪言。

（二）

衡阳激战，开始时，《中央日报》报道敌人受挫，方先觉誓死抗战，不明底细的商人，以为衡阳有险可守，“国军”堵截于前，广西军民支援于后，必不致轻易沦陷。果然，八月中旬，又静静度过。一些已疏散到运江、象州或附近乡间的，或对生活不习惯，或因生活无着，也有人信任广西当局过去的宣传，广西实力可以拒敌于门外，因而又陆续回来柳州的亦不乏其人。实则这个时候，敌人攻占衡阳后，部队休整，准备着更大的冒险。所谓平静，只是人们的想当然耳。

八月底当人们确实知道衡阳失守，方先觉投敌，人心又惶惶不安。不安又怎样？黔桂线火车，时开时停，开车时不但车箱挤满人，立足不易，就是车棚顶，甚至车底都有人。汽车多数征用，柳梧、柳长线水路电船亦多被征用，就是较大的民船也不能幸免，因而用于民间疏散的交通工具，少得可怜。一般群众，包括中小工商业者，讲到疏散，既感交通工具不易解决，也感到疏散后一家数口，生活茫茫无着。因而当九月间，传闻梧州沦陷，柳州工商业者不少人仍在观望，意存侥幸于万一。不过这时市内正式人口，已急剧下降。很好的房屋，只要有人愿意居住，已不需付给租金（外来者例外）。每日过境难民，络绎不绝，加上阴雨连绵，狼狈不堪。要疏散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真不是滋味。到十

月底，不论哪种商品，除非便于运走的以外，无不削价出售。最典型的如生盐，九月份每包（100市斤）尚要价7——9元，这时每包只要——2元（法币）即可购到。副食品也跌价，活鸭已不论斤计价，而是每只2——3角即可买到一个；香甜脆皮的烧乳猪，每斤才6——7角，这种情况一直挨到柳州沦陷（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九日）。只是大米尚能维持在7—8元之间。

大疏散期间，进口物资包括花沙布匹均在飞涨，而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品的价格却急剧下跌，也无人问津。

在一般物价暴跌之时，黄金却是天之骄子。九月间尚是二万多（法币）一两的黄金，十月底已涨至三万多元。这是由于疏散者为了携带便利、易于收藏，互相抢购所致。到十一月黄金已如脱缰之马，三万几、四万几，甚至五万以上法币一两，市场一片混乱。

十一月三、四日谣传敌人已过黄沙河，梧州方面的则进入丹竹机场。虽然柳州市、郊都建筑有作战堡垒，但群众已清楚的看到，这只是形式而已。柳江路的经纪业，小南路的绸布业、百货业……，各行各业能运走的抢运出去，不能抢运的，则纷纷先后闭户锁门，各找自己认为最安全的地方走去。

事后知道，在疏散的人流中，向三都、成团一带疏散的和上雷、东泉一带疏散的，在途中都有遭到抢劫的。而沿柳江向庆远、长安一带疏散的货船，如德昌、仁太等的生盐火水等，在柴山塘、无忧、头塘、牛鼻等地，在敌人过长安、大浦、冲脉、庆远时，被土匪或群众作无主货物，搬运

一空。押运人员和船家，只要求人身安全，要搬就搬，噤若寒蝉。有的地方，生盐只卖东毫五角一包（100市斤）就是这个原因。十一月九日前由柳州疏散出去的货物，尚未达到目的地的，无一不受损失。

最惨的是向贵阳方向疏散的，多数的人既无权力，经济又不充裕，到六寨后便被阻难行。柳州沦陷后，据说因鹿寨与六寨音近的错误，遭盟机轰炸。敌人未到，不少人已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如皇宫旅店李文田，不但物资损失，还失踪了一个女孩，夫妻几天后来逃到贵阳托钵街头（这种情况就不止他一人了），后遇熟人资助牲利后才能回柳州。

柳州沦陷，疏散到象州中平、岁秀、三江、罗城黄金、龙岸以及融县洛板江的工商业者，除在途中的货物遭到损失外，到了目的地后就没有受到损失，此外，柳城县的龙头乡，称得上是“福地”。敌人一般由上雷过大浦、洛崖、冲脉去宜山，另一股经大良和陆，下小长安，过罗城，距离敌人经过路线只十公里，都没有受到敌人骚扰。

柳州沦陷，工商业者的损失是惨重的，一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笨重物资大部分未能疏散；二是疏散出去的货物或多或少都遭到损失；三是未曾抢运疏散的物资，在沦陷期间，即使不被分光，也被日寇放火烧光，回来时连房屋都没有得住，遑论物资。只有少数商号决心下得早，六、七月间即用汽车向贵阳疏散的，如大成印刷厂、大陆烟厂等安全到了目的地，还能开业。少数人当时卖了货物，购进黄金，疏散时人在物在，胜利后回来重整家园。如柳江路的万来行、仁泰行等疏散回到家乡，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也能迅速复业。

柳州酱史

谢贤修

一、柳州酱料业史话

凡吃过柳州生晒和生抽酱油的人，现仍有种齿颊留甘的余味，那香气、色泽、腴醇之味，是酒筵佐料，烹调佳品。头抽和魁油，味浓而价廉，为一般家庭煮菜配料，还有红腐乳，白腐乳，香滑软甘，咸味适中，是四季皆宜的佐餐之物。酱料中尚有芝麻酱、海鲜酱、酸梅酱、黄皮酱、苏梅酱等，都是柳州传统产品。因为生产过程复杂，要场地广、工具多、时间久、资金足，才可进行生产，而利润也厚。但老一套的方式现在用不着，只能把它写下留作史料罢了。

有能力生产上述酱料的厂家，从满清到民国也只有几家，都是老字号的酱园，如庞怡泰，是柳州工商联前主委庞晋的祖上于清朝咸丰年间开创的，有一百三十余年历史。和源华，是毛泽波的父亲创业的，有百年历史。福兴祥与合泰，都是光绪年间开设的。也有近百年。还有隆昌、隆泰也是老厂。只有聚园和王吉程，是民国年间才兼营酱料生产。

庞怡泰，福兴祥，合泰三家是以酱料为主，兼营海味杂货，都有作坊场地。其余都是以杂货为主，兼产酱料。

（紧接上页）其余合股生意的行号，十家有九家都得重新集资改组，另建新字号。日本鬼子给柳州市人民造成的灾难是罄竹难书的。

（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庞怡泰，开店于挑水巷(今曙光中路)，工场在苏杭后街即今小南路的后街。工场占地两亩，分晒场、厂房和住房。晒场陈列晒酱缸约两百个，轮流晒酱和抽酱油。厂房有原料房、煮酱房、酵房、腐乳房等。都有专门工人负责。成品或原料出进均在工场。店铺门面壮观，管理的都是买卖手，贩卖京果海味、南北杂货、油盐酱醋茶，甚至酒糖豆米、纸张火柴等等。批零兼营。福兴祥是合股经营，股东有唐姓谭姓，开设于苏杭街。资金较大，前店后厂，工场更宽，设备同样，但增加酒房熬酒。店面堂皇，多经营高级海味杂货，如鱼翅、海参、燕窝、瑶柱、檀香等贵重品种。从光绪末到1928年火灾前，生意推酱料业中的巨擘。长年有船往来梧州、广州、佛山及融县长安各地，运售货物，生意不但在两广，而且酱料腐乳销到上海北京去。可见柳州酱料是南北驰名的。在大南门城内大街的合泰，也是厂店分开，工场在东城脚，即今曙光东二街，场地较窄一些，设备同样，酱料生意很好，有时超过怡泰，门市也经营海味杂货。合泰是姓麦的家族弟兄合资开的，股东是麦万福、麦万发等，都靠合泰起家。住在山川社的麦五奶，分股息之后还兼放高利贷，金银之多，自己都没数，金叶子垫放床下被褥中，连她的丫头都暗中发了财。合泰在修建马路时铺屋已拆光，没有铺面，于民国廿年左右便停业各自谋生了。

老店和源(后和源华)是毛振荣于清同治年间开的。租用朱家的铺面，经售杂货海味，各类纸料，油盐酱醋等，还兼营布匹。那时的杂货店有三料，即酱料，纸料，醮料。所谓醮料，是供应各寺庙神诞节日酬神建醮以及民间办丧事打斋等

用的香烛供品纸张等物。开醮场面大的在醮料上花很多钱，正好让大杂货店做这门生意，用簿取货，结账付钱。和源的生意越做越大，买下朱家的铺屋，到民国六年开始生产酱料，但限于场地，规模不大，民国十五年，买得府衙门后花园地，扩大了工场。到民国十七年大火，庞怡泰、福兴祥、隆昌、隆泰等家铺屋都付之一炬，复业艰难。和源华得以大展宏图，称雄一时。除大量生产酱油腐乳酱品之外，还做小磨麻油，即名贵的香油。抗战时期改和源华，从事五金、建筑材料、棉纱等大宗交易，还出租货仓，真是生意兴隆。但柳州沦陷时因疏散损失太大，光复后回柳卖了对面一铺屋，得复旧业，在酱料业中仍是资金最大的。

隆昌，开业于清末民初，在沙街义渡码头附近。隆泰，在小南码头即今斜坡处。两家都经营酱料生产，亦做豆豉，同时做杂货收囤生意，但酱料不多，火灾后均停业不复。

聚园酱园亦在沙街，工场在东台路旧广东会馆前，酱油、腐乳、酸品、酸醋、熬酒都做，但所投资金不大，产品不多，而经纪行业又乘时兴起，便转营“全安行”，或称朱全安经纪行。

王吉程，在弓箭街（今中山中路西段），原是杂货酿酒，其家庭院颇大，广有余地，于火灾后复业，遂兼产酱料腐乳，但销量不多，抗战后改业。

谷埠街有曾福兴酱园，开业较迟，专营酱料，也是用传统方法生产，只应付门市，同街还有董太和，原售杂货粮食等，也做过酱料，但产品也不多。

柳州的酱料业，民国时多是大户，从业有十多人。商业

又兼作坊，开业者多有一套经营方法，罗致各地客户代销。酱料不能久贮，即产即销，或以销定产，能做到货源充足，质高价平，才周转得快。其货多销柳江上下游各县圩镇，从当时来说是要经过艰苦经营才创立局面的。然而尚有一着棋是关键的，即是要有技术优良的师傅，创出名牌产品，提高声誉。福兴祥靠老师傅把关，庞怡泰也由大老板庞燮寅亲自参加工场的生产，所以稳操胜券。

二、旧式酱料的生产情况

酱油生产过程颇长，其程序是先把黄豆煮至熟透，滤干拌和面粉，用大簸箕摊匀放入酵房内发酵，酵房冬天要保持 32°C 的温度，约两三天即发霉，把发霉豆饼放入缸中，每缸可放豆饼四十斤，注入煮过的盐水，由日光曝晒，夏天日光强烈晒三、四十天，冬春需两三个月以上，即得色浓味香的酱油，就用吸筒抽取。每缸头一、二次抽的叫生晒，二、三次抽的混合为生抽，三四及四五次抽的叫头抽或魁油。抽过之后注水再晒，但顶多抽五次，缸中剩的就是酱渣了。四、五次抽的色味俱淡，便倒入火锅中加入糖油（桔水）作酱色，煮浓，即是头抽和魁油，每锅可煮二千斤左右。所用的大铁锅直径和深度都有一米五，由佛山铸造的。几家大酱园的晒场都有酱缸两百个，按行序排列，依次操作。

做腐乳是先把黄豆加工成豆腐坯，一斤黄豆做两大块豆腐坯，然后每块腐坯切成十六小块，洒上酵母放入酵房或火柜中发酵。每天要发酵大豆腐坯约两百块，两三天后发霉，再移入盐水缸中浸泡，约一周时间，便把这些小块

腐乳放入罐中。从古时到民国，都用大陶罐，每罐三十块，放时层层洒上磨碎的红曲米，或加入一点点香料，用白酒浸过面，十天左右便成香喷喷的红腐乳。如不用红曲米，用甜酒糟，便是糟乳，或是白腐乳。街上卖的南乳花生，南乳扣肉等多用糟乳。腐乳入罐后，即用棉纸裱糊罐口，刷上招牌标记，便可出厂。船行数日，到达售地时，刚好成熟。滞销时便暂停生产。

豆豉是用黑豆煮熟，倒入大黄桶内，上面用石块加压，压出水份不要，再加盐和香料稍蒸后倾入大簸箕晒干即成。天气好的也要数天。晒场大，设备多的生产就多些。

海鲜酱，芝麻酱，黄皮酱，酸梅酱，以上述各类原料为主，磨碎，加入酱料。苏梅酱则加苏叶，制成各色时鲜酱类，香麻油是把芝麻炒香磨溶，装入大锅中，静静沉淀，油即上浮，用干葫芦在上面缓缓拍之，撇出香油，余渣即是芝麻麸。这些都是副产品，还有酸醋和酸品，如蕃头酸，姜酸，酸辣椒等，为餐馆、烧卤饮食摊店等多用之。

柳州宜山等地盛产黄豆，原料价廉，劳动力便宜，加上水陆交通便利，是酱料业得以发展的先天条件。所以庞怡泰与福兴祥，在火灾之后，损失殆尽，只工场尚存，仍千方百计复业，福兴祥改为福兴昌，元气已亏，已是大不如昔了。

三、抗战以后的柳州酱料业

抗战军兴以后，酱料业起了大变化。首先是户数增加了。外地来柳开业的很多。生产方法也改变了，不用上述的繁琐过程，而是把黄豆发酵制成豆酱，入布袋中压榨出酱

水，几次压榨后剩下酱渣，所得酱水入锅中加麦芽糖作酱色熬煮，于是得出酱油。

一九三九至四十年代，从江浙等地疏散逃难来柳的人陆续在柳开设酱园。如高关祐从香港抵柳，邀集从香港来的顾孔楨、徐华春、徐华红等人，合资开办大同酱园。工场设在湾塘，门市部在今中山东路新华书店右边。以后意见不合，高关祐退出，在屏山镇谷埠的一条巷子内开大通酱园，后迁谷埠上街。柳州疏散时，高到昆明，光复后回柳在谷埠下街开民生酱园，由其弟高瑞薰主持。高瑞菊参加生产，高关祐仍赴港。民生酱园一直经营到公私合营，有职工七人，资金五千元，产品有酱油、豆酱、腐乳等。在行业中经营有方，解放后高瑞薰一直任酱料业同业公会主委，合营后任副厂长，至今仍赴边远县份传授技术。

大同酱园在光复后称大同兴，仍为顾孔楨主持，工场仍设湾塘。徐华春开泰兴酱园于谷埠路，至解放后加入食品厂。徐华宾开上海酱园在大南门，以大同兴业务较好。

曾在昆明的张贵卿，来柳开永和酱园。解放前任过同业公会理事长。在天马路有泰康酱园，解北有大华，大南门有顺泰、斜阳路口有同兴友记、西门外有大同兴、河南驾鹤上街有同兴、张种路有同兴正记，以及老同兴，大同，和顺兴、万康……等，约三十家，这些都是自产自销为主，每家的一个月营业额不过一千、数百元不等，有几家是自己不产，专门贩卖的。酱油没有生晒、头抽等名称，而是冠以凤凰酱油，大王酱油等美名，其质地都一样，味道也一般了。

（市民建、工商联供稿）

抗日初期柳州文化界 的救亡活动

——记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

陈雄子

抗日战争时期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三九年夏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以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为中心的各种宣传活动。一是从一九四〇年初至一九四四年夏为一个时期。这时期主要是以“抗敌演剧四、五队（原为一、九队）”为中心的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到统一战线上开展抗敌的活动。本文所追述的是第一个时期的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概况。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从广州疏散来柳州。因常为《柳州日报》写些短稿，认识了该报的主要编辑梁琴生和编辑彭树椿。八月间，我征得梁彭两编辑的同意，在《柳州日报》第三版要了半版篇幅编辑出版每周一期的文艺性《前哨》副刊。这副刊虽然水平还是很低，可是由于是一般青年学习写

作的园地，内容又是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所以颇受青年的欢迎。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乐嗣炳，并蒙他向龙城中学校长高天骥推荐，被聘为龙中教师。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西南各地开展保卫大西南的活动。此时《前哨》副刊在《柳州日报》登载了一个“召开柳州文化界保卫大西南座谈会”的通知。座谈会地点在中山路一间小学。届时到会的约三十多人，有西大农学院师生，市各中学师生、小学教师，亦有机关单位职员。座谈会开始前，在座一个县党部来人阻止座谈进行，说是事前这个集会没有申请县党部批准。经过与会者与之一番论争，县党部来人终而缄口无言。座谈中，大家对当前抗日救亡形势进行漫谈，认为柳州文化界必须和全国各地文化界一样行动起来开展保卫大西南活动。最后作出筹备组织“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下简称“文协”）的决定，以当天参加座谈会的作为基本会员。并推举黄振璇（西大农学院教师）、陈显达（民团指挥部政治指导员）和我三人为筹备人。黄、陈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起草协会章程。十一月间，“文协”筹备工作完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中山路一间停业铺面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除基本会员外，增加了一些由基本会员所邀的人。可是却来了这些不速之客：航校政治部主任、指导员以及柳州知名的“中统”陆树珊等等。大会推举乐嗣炳主持，通过章程之后，进行“文协”理事会的选举。那些不速之客也来领选票。为防止不速之客企图渗入“文协”领导机构中，乐嗣炳和我们几个筹备人商量，决定向大会宣布会后开选票。经大会同意并推举三个筹备人负责开选

票工作。

选票比较集中在我们原来预定的人。不速之客的票我们基本将它废掉，只有航校政治部一个指导员的，藉以堵他们的口。理事会理事七人，分工是：乐嗣炳为理事长（解放后才了解乐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共组织，后因故失去组织联系，七十年代落实政策时，他在任职单位复旦大学申请恢复党籍），李伟诗负责总务部，陈显达、黄振璇负责组织部，我负责宣传部，航校指导员，我们推他负责服务部（这位理事感到自己负责的是可有可无部门，参加了一次理事会就不辞而别了）。为加强理事会工作，加聘孙文骏为组织部助理，刘纪元，吴焯才为宣传部助理，查仲轩为总务部助理。另外，还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女小学教师为脱产干部（孙、刘为柳州邮电局职员，近年来才了解，他们当时都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青年。吴是广西测量局绘图员，是木刻爱好者，曾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发表过作品。查是当时《柳州日报》记者）。“文协”地址设在福建会馆（今柳州剧场），与《柳州日报》一起。会馆是一间停了业的剧场，不久《柳州日报》另迁，整个会馆为“文协”所有。场地宽广，有现成戏台，演剧、开会都方便。

“文协”正式成立后，重点工作是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首先是“开辟宣传阵地”、“组织宣传队伍”：一、将《前哨》副刊改为《救亡周刊》。二、成立“救亡阅览室”。阅览室设在培新路一间未开业的商店，摆设了一些抗日的书报杂志，定时开放给群众阅览。开放不久，由于其中有一些进步书刊，如《论持久战》等，受到陆树珊出面干涉，要我们

把进步书刊撤去，另换入他送来的一些小册子，主办阅览室的刘纪元和我商量，决定将阅览室关闭，免得给陆利用。

三、吸收京剧团、桂剧团、粤剧团为集体会员，以他们几个剧院作为抗日救亡宣传阵地之一。此外，还请他们各义演了一晚，筹集资金开设了一所“救亡剧场”。这个剧场设在福建会馆，即“文协”会址内。四、组织“救亡话剧团”和“救亡歌咏团”。话剧团成员主要是龙城中学师生。歌咏团有四个，一是以小学教师为基础的，二是以龙中学生为基础的，三是以西大农学院学生为基础的（领导人是华恕子、刘文庆），四是以机关青年为基础的。话剧团联合京剧团、桂剧团、粤剧团及歌咏团曾于一九三八年底在体育场（现市统战部后面）作抗日宣传演出了一个晚上，歌咏团还经常上街和到各剧院、电影院利用开演、开映前以演讲和歌咏形式进行二、三十分钟的抗日宣传。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初，“文协”发动了一次反汪（精卫）卖国的宣传活动，乐嗣炳理事长和几个理事商量，推举我写了一篇不署名的讨汪短评在《柳州日报》发表，乐本人接着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陈璧君卖国罪行的短文在“救亡周刊”发表，其后又在街头贴出反汪壁报。这一活动引起柳州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先是民团指挥部黄指挥官打电话到《柳州日报》查写反汪文章的人，后是中统派人撕毁街头反汪壁报。在这期间，“文协”在“救亡剧场”举行了一次规模颇大的时事座谈会，会上乐嗣炳作了题为《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讲话。记得当时有一位从前线回到柳州的学生军，姓吴的，平南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讲了话。一九三九年春节，“文协”还参加了

柳州市各界慰劳抗日军属的活动。“文协”和广西学生军同一组。组长是学生军一位姓黄的指导员（广州人，中大毕业，后曾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

一九三九年春，乐嗣炳被人向广西省府告了一状，被迫离开西大，政治处境困难，“文协”理事会乃增选龙中校长高天骥为理事。乐辞“文协”理事长，推选高为理事长。在这时候，上海“八·一三”歌咏团、上海话剧团、广东儿童剧团等相继来柳，“文协”十分欢迎这些从沦陷区来的坚持抗日救亡战友，接待他们住宿在“救亡剧场”，并供应他们两餐伙食。为充实“文协”理事会，以利开展工作，补选了章枚（“八一三”歌咏团团长）、蒋柯夫（上海话剧团团长）、谭星（广东儿童剧团团长）等为理事会理事。并聘请上海话剧团的姚岳（又名姚平）、樊康为“救亡剧场”专任干事兼导演。陆新生为“救亡歌咏团”指导。其中姚岳由龙城中学经费开支每月给予一定生活补助费（四二年我在桂林见到姚，据说“文协”结束后他曾去过香港一段时间，后转回桂林与朱琳等组织“新中国话剧团”。当时他还邀我去看朱琳主演的《钦差大臣》话剧。解放后曾有人说他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已经去世）。

上海、广州进步文化团体来后，“文协”的抗日救亡宣传十分活跃。以龙中为基础的救亡歌咏团与广州儿童剧团联合在街头演了不少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八一三”歌咏团在“曲园”剧院和“救亡剧场”，公开演出了几场“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由章枚指挥，激荡着广大民众的抗日热血。此时，“救亡剧场”开始作售票话剧

演出，除开晚上场外，有时也开下午场。目的是以门票所得作为外来文化团体的生活补贴。演出了一些独幕、二幕短剧，还由以龙中师生（彭、刘老师两夫妇，莫真权、陈美云等同学）为主的“救亡剧团”演出了一出大型话剧《塞上风云》，宣传汉蒙民族大团结一致抗日，主角是彭、刘老师两夫妇和上海话剧团的来演，演出很成功，下午和晚上几场都满座，宣传效果很好。记得一九三九年二、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我国名戏剧家彦祥去重庆经柳，特意来访“救亡剧场”。他说目前我国话剧自己有剧场的售票演出的不多见，对“文协”的努力十分赞赏，鼓励我们努力逐步改善发展。遗憾的是“剧场”收入售票毕竟有限，维持二十多人的生活十分困难。统计几个月间收支不敷三千来元。这款项全是由高天骥理事长垫支的，最后无人偿还就一笔勾销了。由于生活困难，外来三个文化团体于四月间相继先后离柳。“剧场”只留姚岳一人，“救亡剧团”是业余剧团，不能经常演出，这样，“剧场”逐渐冷落下来，没有象过去几个月那么热烈了。一九三九年五月间，姚岳协助龙城中学全校师生下乡抗日宣传巡回团排演工作之后也离开柳州他去了。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上午，日寇敌机十余架入侵柳州上空，从鹧鸪江上空开始分成两队，一队沿现在区二安、针织厂、锌品厂、公园、解放南一带至马鞍山上空，一队沿现在柳钢、贮木场、黄村、五一路（过去叫大树脚）一带至马鞍山上空，平行无目标地密集丢下大量炸弹与杀伤弹进行疯狂轰炸，许多建筑物受到严重摧毁，无数无辜市民惨重伤亡，尤其是公园与连塘路大树脚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龙中

抗战时期香港私立华侨 工商学院迁柳复课的经过

黎远明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寇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于日寇。香港不少的学校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知名文化人士，都纷纷跑进内地复校和寻找工作，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贡献。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就是这时迁到柳州。我是从自己考进这间学校知道的。

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虽然设在柳州，但是在桂林招的生，当然在柳州也招了生。因为，当时桂林事实上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除陪都重庆以外，就数桂林了，成为大后方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特别是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每当寒、暑假时，特别是秋季始业时，全国著名大学都到桂林招生，例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

（紧接一版）与“文协”会址都在此次大轰炸中受到严重轰炸，满目瓦砾颓墙。龙中从此迁至鹧鸪江临时草盖教室上课。“文协”既失会址，又失去支持活动的主要人——“龙中”师生，而理事会理事又星散，因此各种活动从此停顿，组织亦无形解体。

1987.9

学，以及本省的大专院校，还有由江苏迁来桂林复校的无锡国专等等。桂林的报纸上登满了各校的“招生简章”。考生云集，有本地的，有外地的。外地来的，有住在亲友家里，有的还住在旅馆里，显得分外繁荣！因此，私立华侨工商学院也是桂林招的生。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季始业。那时，我正从广西省立桂林中学高中部毕业出来。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刚刚迁柳复校，所以就一九四四年的春季招生。有一天，桂中毕业同班同学周尚贤，陆川人，来邀我一同去报名投考私立华侨工商学院，我们同时报名、投考和取录的，而且都是读土木工程系，同宿舍住。后来，又是同时休学回家的。

考取后，我们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中，由桂林乘火车到柳州注册入校。当时，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设在柳州市东大路的琴园，院长是一位博士。设三个系即土木工程系、商业系、银行会计系。因刚复课一系只有一个班，土木系二十人，在戏台底的教室上课；商业系四十人，在大厅的教室上课；银行会计系三十人，在正厅的教室上课。学生宿舍设在戏台楼上，课桌椅、床等都是新的，但很简单，没有膳堂，同学们除有家在本地外，都在校外饭店包膳。不时，还躲日机。学习、生活相当艰苦。

我和周尚贤同学读到一九四四年六月时，敌寇进逼湖南衡阳，桂林告紧，我们只好休学回家，他回陆川，我回桂林，后来，桂林、柳州沦陷了。

抗战胜利后，我在报纸上看见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在香港复校的启示，并说在柳州时的学生希望回香港复学。我因跑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 西分署在柳活动概况

刘 雄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这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过“轴心”（德、意、日）军队蹂躏过的国家均有这一机构的成立。

中国的善后救济总署设于上海，广西救济分署设于柳州，署长是黄荣华。他曾经留学美国，做过广西建设厅长，是从军统局西南运输处处长调来任署长的。西南运输处的部分员工多随之而来，署的重要部门，统统安插他的亲信。但也有不是他带来的，一些职位较高的人，拿薪不做事，如顾问、专员、视察之类。

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我随署长黄荣华、联总代表欧家利、华生等视察桂北灾情，同行的有副署长黄荣芳、李运华，翻译盘宝臻和广西日报记者×××、民声晚报记者林锦涛等，从全州、兴安、桂林，沿铁路、公路两侧经敌人进出的桂北各县，所见到的 是良田荒芜、人烟稀少，偶

日本被抢光，放弃了读华侨工商学院这条路，重新投考公费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了。这时，是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事。

尔遇到的人都是骨瘦如柴形似骷髅，每日挖草根，刨树皮充饥。故此，分署在桂林设办事处，把桂北列为重点的重点救济。

救济物资的来源大部分是盟国剩余物资，一部分从战败国德、意、日，接收来过的，还有些是华侨捐赠的。

救济物资的种类：粮食，米面、豆粉、肉类罐头，罐装花生酱、芝麻酱等，还有农机、农具（拖拉机、水泵、锄头、铲，军用农用均有），农作物种子：谷、麦、豆、木薯等类，肥料有磷肥、钾肥等。木工用具有：斧、锯、刨、凿、锤、钉。工业用具有：车床、刨床、铣床。交通方面有：火车头、汽车、轮船、发动机、发电机及各种钢材等。衣着有军服、民服、呢绒布料、毛衣、毛线及各种鞋袜手套等。

运送来华的救济物资在香港、上海、天津三处起岸，广西的救济物资是由香港用船直运梧州，由储运组分发各站储存，全署有梧州、蒙江、桂平、贵县、南宁、大湾、柳州等储运站，每个站下设总务、运输、仓储、会计等股，股设有股长、股员、办事员、押运员、雇员。每个站有仓库十个八个不等，还有化肥、西药、汽油专仓，各仓有保管员和雇员、仓工等，各站收存的物资由站列表送储运组存查。

账务组根据各县救济协会的请求，按灾情轻重，经署长批准，将调拨单发给县救济协会，县协会凭单往指定的储运站提取物资，并由账济工作队监督发放灾民。全署有账济工作队六队，各队设有队长、干事、办事员、雇员等，每县或两县派一个干事，专门监督发放物资，并会同协会经办人造

表发放表册报署。

至于工厂、矿山、农场、学校发放的救济物资是直接由省、署批准，由储运组通知储运站调拨的。有些学校则借词教室缺少，无法教学为理由，工厂、矿山则借词缺少运费，把提出的物资卖给商人，因此市面充满了救济物资，吃的、用的、穿的，样样都有，尤以大米和袋装面粉、罐装的奶粉更为普遍，有钱随时可以买到，行政部门和救济机构听之任之。

关于医务方面，设有救济医院，使用的医药器械都是救济物资。群众到救济医院治病完全免费。医院有时也派医疗队下乡给群众治病，但不是经常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有部分也分到各县卫生院，同时还发放一些内外科用的混合药包，防治疾病和外伤。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蒙江储运站结束，我调回柳州城站（现东站）、和大湾站，接收最后运来的物资，城站仓库仅有一个，除衣服、药品、罐装物资入库。其它大米、面粉、肥料等只有卸在两条站台上和站台下面的空地上，用篷帐遮盖，日晒雨淋又不通风，故米面霉烂，浪费极其严重。特别是医疗器械药品损坏更为严重，成箱成箱地给铁路装卸工摔坏，待开箱取用时，才发现针药和其它瓶装药物只剩下空瓶或玻璃碎片。

广西善后救济分署于一九四六年底结束。所剩人员物资有一部分放到柳州机械厂，黄荣华等将这批物资变为私人所有，成立了理事会，变成了官商资本，当时柳州机械厂大门的柱墩上有块石刻，嵌上了该厂董事的名字，计有：黄荣

华、黄荣芳、陈良佐、童烈等（有些记不清），这个石刻解放后才除掉的，如保存下来，可供考证。

剩余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成立了一个外科医院，院址设在飞鹅路红庙，院长由救济署医务组副组长李光宜担任。剩余的汽车拨给广西省府，由储运组副组长李启乾负责，共分两队。

剩余的农业机械，成立了一个农垦公司，由分署当时的顾问陆大京负责，地址设在乐群社内（现工人医院宿舍区）。这些机构皆因有救济剩余物资然后组织成立的。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来的代表，简称联总代表，有欧家利（美）、华生（美）来监督发放救济物资，并指导各项建设工作。

除联总代表以外，尚有一个与救济分署平级的机构：“审议会”，审议会主任委员蒋继伊，副主任委员李任仁、黄旭初，委员是省府各厅长、局长、省参议员与分署的顾问等，每月开会一次，审查讨论救济物资分配各县受灾救济情况及广西战后的建设工作。

一九四六年秋，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桂林召开社员大会。会议结束时，广西省政府、救济分署邀请工程师学会会员茅以升、侯家源等来柳视察。广西省府有这样一个设想，从河南河北车渡码头筑一拦河堤，在华丰湾沿柳石路开一条运河引水到鸡喇码头建一座水力发电站。工程师们勘察结果认为柳州水位与鸡喇水位落差甚大，建造电站十分有利，如能实现，对广西工农业发展大有可观。据说：电力可供半个广西应用。在当时劫后的广西来说，人力、财力和其它技术方面

都没有具备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条件，只有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只是空想而已。

广西善后救济分署各部门负责人名单

署长：黄荣华 副署长：黄荣芳 李运华

顾问：盘珠祁 陆大京 楼亦文（余记不起）

委员：何辑五 冯权 视察：谢代生

专员：黄哈定 李希典 刘雄（后调站长）黎工劝等

会计主任：童烈 秘书室：主任秘书谢振民 秘书李瑾

总务组长：岑国铨 副组长：童烈

人事科长：洪定一 保卫队长：黄耀展

财务组长：黄荣芳（兼）副组长：何标

工作队六个队，柳州一队潘达文，后黄宪中，其他五队忘记。

储运组长：陈开 副组长：李启乾

各储运站长：梧州黄耀栋 蒙江刘雄 桂平盘宝臻 贵县林鸿就 南宁刘业鸿 大湾黄烈 桂林办事处主任杨达佐

医务组长：甘怀杰 副组长：李光宜（兼外科主任，内科主任陈××，下面有直属医疗队。

医院院长：彭瑞平 汽车队长：吴铁山

汽车保养场场长：黄顺来 车缝厂厂长×××

柳江县救济事业协会的一些情况

刘启焕

抗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发放救济物资，是通过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向各市、县的救济事业协会发放后，再由县、市救济事业协会分发各乡、镇公所。乡、镇公所分发给群众，然后造册上报县、市救济事业汇报行总。

当年柳州尚未设市。柳江县辖城区柳东、柳西、屏山、镇及广源、平川、里雍、思贤、进德、中团、穿山、百朋、小山、三都、六道、成团、水源、里高、洛满、福塘、流山、土博等十八乡（柳江文史第四期9页5—8行）。

柳州县救济事业协会成立于1946年下半年。协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干人。。搞具体工作的秘书一人、办事员一人、雇员二人、仓库警卫一人，配驳壳枪一枝。

柳江县参议会参议长刘克初任救济事业协会主任委员，柳江县县长杨义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是县参议会副议长翁振翼、社会科科长张汉义等人（其余委员已回忆不起）。赵夏亭任秘书、赵国英任办事员，刘启焕任雇员（具体任务是领

发救济品及管理仓库)。穿山乡参议员李某任雇员，肖国忠任警卫。仓库在培新路租用三层楼房一座。柳江县救济事业协会则借用县府一个小厅办公。

救济物资主要是米、面粉及美军、英军剩余物资的罐头食品，如生奶、咖啡炼奶、白糖、奶粉（5磅装的美军用KLiM奶粉及100磅木桶装的脱脂奶粉）、猪肉豆、薯仔牛肉、汤、豆粉奶油、人造奶油、花生酱、芝麻酱、果酱、军用干粮等等。衣服则是以北美、南美、加拿大等未受战火波及地带人民捐献的旧衣服。但行总仓库有全新的美军卡基及罗斯福绒军装、黄色及白色的新毛毡，未见发给县救济协会，后来却充满柳州市场。

培新路仓库仅能存放衣服及罐头食品，白天晚上均由肖国忠守卫。数百吨洋米洋面只能借用县府礼堂、厅堂、走廊堆放。百十桶奶粉也只好与米面同堆，数百箱5磅罐装奶粉，是借用县府主任秘书陈常九的办公室一间、会客室一间以及县长室外的大厅才能堆放完。陈常九则搬过县长室与杨义同办公，并共同使用县长的会客室。虽然县长室晚上锁门，但仍发生过失窃事件，被盗奶粉数箱（每箱6罐），后查出偷盗者。

数百吨救济物资要从窑埠行总仓库搬运至县府及培新路仓库，运费无着落，后经委员会决定“以救济米支付运费”，才能将数百吨救济物资领回。

救济品领回后由救济事业协会行文各乡、镇、学校来县府中领取。

医疗器材及药品，由县卫生院自赴行总仓库领取。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署长黄荣华来柳州，曾到县参议会拜会刘克初（伍廷飏兼广西建设厅长时，黄荣华曾在厅中任技正，刘是伍的参谋长、曾协助伍在柳州搞建设，故与黄是旧交），刘请黄对柳州多加照顾，黄当即应允拨X光机、及新药盘尼西林等物资给柳江县卫生院。

照会各乡镇来县府领救济品的公文发出后，仅城厢三镇及少数近乡来领，赵秘书派我下乡查情况，原来是乡公所穷，没有运费也无交通工具。后刘克初找到黄荣华派车，再由县府从各科室中抽调数十名办事员、雇员随车将救济品送到各乡公所及中心校。几天内就将积压数月的几百吨救济物资发放完毕。

1947年国立广西大学由鹧鸪江搬回桂林将军桥及良丰雁山。我到西大读书，故辞去工作。仓库由穿山乡的参议员李朝光接管。我在柳江县救济事业协会工作半年，经我手领的数百吨救济物资发到各乡镇基本发清，以后柳江县救济事业协会情况就不知道了。

柳州光复后的失依儿童 收容所和育幼院

蒋 云 蒋宝智口述 蒋 霖整理

失依儿童收容所，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西分署所辖的一个部门，设立在柳州羊角山。它的宗旨是：收容在抗战期中、或抗战胜利后，广西各县遭受日寇蹂躏的地区，失掉父母的孤儿，和家庭因战后经济十分困难无法养活的儿童。由各县列册护送到柳，交给该所设在分署过案工作人员接收，然后送往羊角山该所所在地。

失依儿童收容所的人事组织如后：

主任	吴建平	保教长	林开
教师	高兰馨	赵良秀	招佩贤
会计	梁国忠	事务	冯晋礼
过案工作	姚建辉	医师兼护士	徐瑞芳
保育员	林坚	黄天贞	冯萍 蒋云

各县送来的儿童由过案工作人员带到羊角山收容所后，交给保教长，并建立档案，由保教长将这些孩子编入各个班级，白天由教师给他们上课，搞各种文娱活动，晚间则由保育员照顾休息。有的年龄较小的编入幼儿班，由保育员率领他们识字、记数和做游戏、唱歌。这些孤儿吃、穿、用的全是救济品。这些救济品是由事务工作人员在分署储运组领

来，盖的有棉被，垫的有席子、毛毯，挂的有蚊帐，穿的有衣服、鞋、袜，有时不合穿，保育员在值夜班时，就帮他们改装。每日三餐：早餐不是粥、就是面条或牛奶，配有包子或馒头；中餐、晚餐是吃饭，菜肴一般以罐头为主，罐头有猪肉、羊肉、鱼肉，有青豆、黄豆，还有做汤的黄豆粉。

1946年收容在这个所的孤儿有杨启霖、张树良、覃炳勋等一百多人，因为收容人员常有增加，所以没有准确的数字，这些孤儿大都是广西各县送来的，但也有北方各省份的。

1947年初，该所撤销。由当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民政厅接管，所址则由羊角山迁往沙塘，更名为广西省立第二育幼院，人事也有变动：

院长 吴建平 保教长 林开
保育员 林坚 （以上人员是收容所人员）
教师 邓云彪 梁志新 苏冉冉 杨若瑜
训育长 周乃文

据说，这四位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训育长则非常凶狠，动辄就用鞭子打人，但在进步老师的批评帮助下，被逼得自己张贴出“乃文放下你的鞭子”的标语以自警，改变了过去恶劣的作风。

当时在这里接收下来的孤儿有二百多人，分成四个班，每班约五十多人。还有一个幼儿班，总共是五个班。他们的装备都是从羊角山带来的，救济分署还拨了一批食用的救济物资，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基本同羊角山相似。

解放以后，这批孤儿都参加了工作，张树良现在郊区税所，唐明在区公安厅，蒋宝智现在郊区企业局，温志明现在

市财办，周耀北在计委，还有周耀东、周耀西、周耀南、杨强、陆德明在柳州印刷厂，陆德光在广州，是八级电工，何松喜在北站粮店，蒋宝信在市设计院，胡昌文在宜山怀远车缝社，蒋群良在鱼峰区医院，他们有的是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如今正为国家的四化建设、为柳州的腾飞，在本岗位上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949年8月18日，该院奉令结束，发出了致各家长函件：原文为

广西省立第二育幼院函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保字第一七六号

逕启者本院奉令结束停办在即，所有儿童一律遣散回籍，兹限新历九月一日（即旧历七月初九日）以前来院具领贵子弟蒋宝信、蒋宝智、蒋群良回家，如逾限不领者，恕不负责。希即如期领回勿误为荷，此致

蒋先生 院长 吴建平①

（盖有关防大印）

同时还附发有给各个儿童的修业证明书
原文为：

修业证明书

学生蒋宝信广西省柳江县人，现年九岁，在本院初级小学部修业满贰学期，各科成绩尚属及格，兹值奉令结束，合行发给修业证明书，以资证明此证。

广西省立第二育幼院院长 吴建平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

（盖有关防大印及院长私章）②

注①②在我会存档

遣散以后，有家的都将自己的子弟领回来了，院里还送了一些衣物、毛毯、食品之类的东西，也得了少量的遣散费。以暂时维持生活，没有家的就流落在市区帮打零工，直到解放以后，他们才走上为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

在育幼院奉令结束停办的前一个时期，育幼院里进驻了一批人，听说是国民党行政院的一个机构。邓云彪、梁志新、苏冉冉三位老师的身份暴露，被柳州专署派军警到院围捕，当时，把邓云彪、梁志新两位老师抓去，押回柳州专署关押，苏冉冉老师逃脱了，杨若瑜老师当时看到情况不妙，就走出院外避风，大概她的身份未有暴露，事情过后，她又回到育幼院，解放后在妇联工作，邓、梁两位老师在专署被关押期间，院长吴建平还想方设法到监里探视，解放前夕，再将这批政治犯解送到别处，未卜其下落。

行知公学的前前后后

邓凡平

(一)

一九四八年秋季一天中午时分，柳州私立文惠小学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一队队衣着华丽、秩序井然的文惠小朋友放学离去不久，一群群衣裳褴褛、光着脚板的穷孩子，蹦蹦跳跳地涌进他们往日望门兴叹的学校大门，跨入教室，正襟危坐，面展笑颜，等待着老师和小先生来给他们上第一堂课。一间新型的学校诞生了。它的名称叫做“行知公学”。

这样一件现在看来平常之极的事情，当时何以引人注目，视为稀奇，究其原因，不外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名称古怪。“行知”者，明眼人一看便晓，这是被国民党迫害致死的民主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大名。在陶先生尸骨未寒之时，打出他的旗号来，对当局未免不恭。“公学”者，就更为明显了，当时中国只有革命圣地延安有一间赫赫

有名专门培养红色干部的“陕北公学”，胆敢借用这个犯忌的名称，难道不怕有沾色之嫌？这是知识界中产生的疑虑。而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好奇的是：打民国以来，只见小学、中学，从未听说过有什么“公学”、“母学”的。

二是待遇优异。众所周知，文惠小学是柳州一间收费昂贵的名牌私立学校。连公立小学也进不了的贫寒子弟，对它是从来不敢问津的。如今怎么突然出现这般离奇的事，它对两百多名行知公学学生。不仅分文不收，而且还赠送课本、文具、作业簿，甚至课外读物，真是令人费解。

三是师资过硬。在国统区，过去也有人搞过所谓义务教育，但都是牙牙乎；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教师滥竽充数，教学极不认真。因此，群众望而生畏，文盲越扫越多，原因是，他们的脚跟没有站到劳动人民一边来。心不诚，则事不灵。文惠与之全然相反，他们怀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把办行知公学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从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中挑选出一批热情很高，经验丰富，工作认真的老师担任行知公学兼职教师。他（她）们的名字是：刘秀容、张光珍、李铨、戴端钧、莫时灿等等。依靠这支过得硬的师资队伍，打开了公学的局面。它的牵头人是地下党员、我的得力助手刘秀容同志。行知公学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我则兼任校长。我们还特地在文惠高年级和文惠铁木耳儿童团骨干中，物色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小先生（现在柳州一中教师吴树奎便是当年文惠儿童团团团长小先生的头头），做大先生的助手，从事教学辅助活动。这种小先生制，也是直接从陶行知先生那里学过来的，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仅

负责发动文惠小朋友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捐赠课本、文具、作业簿，还负责维持秩序，组织课间活动，进行课外辅导，帮助批改作业，以及手把手地教小师妹们描红习字。有的还登台讲课，登门补课。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与文惠老师们一道，为创办行知公学倾注了心血，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们也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文化知识。

这是一间与众不同的新型学校。在浊流遍地的国统区，它的出现，象是从深山野岭中淌出了一泓沁人心脾的溪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一新事物问世后，人们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人热情鼓励，赞扬它是教育界的创举；有人讽刺挖苦，责怪文惠“乱弹琴”，也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二)

我们为什么想起办行知公学来的？说来话就长了。得先简单介绍一下行知公学的母体——文惠小学的有关情况。

文惠小学创办于1946年春，她从1947年11月起，就成了地下党和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站。学校的领导骨干和三分之一左右的老师，都是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简称“桂师”）的学生。1948年夏，老校长邓锡藩老师病故，由我接任校长。从此，文惠小学的人事、教学、财务等大权，全部掌握在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手中。鲜明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的办学思想，是这间小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正如唐诗上说的“应缘近水花先发”，行知公学诞生在文惠这块良田沃土之上，绝非偶然之事。

我（当时的进步教师，和杨才能同志先后入党），既是秘密

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又是文惠小学的领导者。我们远在1941——1943年间，还在桂师当学生时，就曾亲身经受过陶先生的高足、晓庄师范出身的戴自庵老师的薰陶；从戴先生的讲课和日常言谈中，我们不仅知道了向往已久的晓庄师范的一些办学情况，而且对陶先生的教育主张、政治态度以及为人处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对陶先生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我们曾暗暗立下志愿，待将来走向社会之后，要以陶先生为榜样，在教育事业上好好干一场，有所贡献。毕业之后，我们远道来柳，与邓锡藩老师一道，呕心沥血办文惠小学。“衣带渐宽终不悔”，这种对教育事业的虔诚态度、献身精神，无疑是受到陶行知先生的影响。无怪乎当时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送我们一个雅号，叫“小陶行知”。诚然，今天来认识，这纯属溢美之辞，过份拔高了人物。但我当时年轻幼稚，又有点自负，竟沾沾自喜，引以为荣。由于我们对陶先生的由衷敬仰，当他被国民党迫害致死之后愤慨之情，郁郁在胸，历久不散。创办行知公学正好找到了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说实在话，公学以行知命名，与其说是对陶先生的纪念，勿宁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陆续从重庆《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上，看到有关延安杨家湾小学校长陶端予和淮北解放区小学教师夏陶然办学事迹的报道。这两陶办学经验，对正在进行探索、渴望在教育工作中闯出一条路子来的我，启发很大，鼓舞很大（至于这两人后来销声匿迹，又当别论），在我心灵中产生了强大的撞击，闪出了火花：一是坚定了我为

劳动人民办学的信念，二是增强我向传统教育挑战的勇气。文惠五年的办学实践证明，我们实行的这一套，与国民党教育部的要求是大相径庭的。难怪别人要骂我们“乱弹琴”了。两陶事迹的启示，是我们创办行知公学，并将它叫做“公学”的直接原因。

最后一个因素，是地下斗争的需要。文惠秘密联络站，担负着从各地撤退，转移来的同志的安排，接待和掩护工作；有的还长期在此治病养伤；一些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也常来这里指导工作。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决定花大气力来搞好与学校附近群众的关系，一旦发生变故，我们同志只要翻过一道矮墙，便可躲进群众家中，如鱼入水，如鸟投林，悠哉游哉，反动派其奈我何！如何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呢？我们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学校四周几条街，是有名的贫民窟，柳州的“龙须沟”，房屋简陋、火灾频繁、疾病流行，生活艰难。这就是对这儿的真实写照。绝大多数的居民靠打柴、卖水、搞搬运、拉泥砂、做小贩糊口。他们的子女，除少数几个有幸能入公立学校念书外，大多数失学，当光眼瞎子。他们或在家带弟妹，或跟父母打柴、卖水、推板车，或擦皮鞋摆香烟摊，有个别的则游游荡荡与小偷扒手为伍。我们认为，要搞好与群众的关系，光口惠而实不至是无济于事的，关键在于真心诚意地为他们办好事，使之得到实惠，而从我们这帮两袖清风的穷秀才的实际来说，除有点文化以外，此身别无长物。于是大伙一致认为，我们目前能为劳苦群众的好事，莫过于教他们的子女读书识字，创办行知公学的主意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良好的愿望，群众对之却反应冷淡，为什么？原来这些穷孩子不能入学，有其实际困难，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将家长们意见概括起来便是：“读不起”和“没得闲”。实际是两个字：一曰穷，二曰忙。我们摸准情况之后，对症下药，采取了一切为群众着想的办学方针。具体措施是：针对他们家里“穷”，我们规定免收一切学杂费，还保证无偿供给课本、文具及作业簿，连他们胸前佩戴的“行知公学”襟章，也是文惠送的。一句话，读书不花钱。针对他们“忙”，我们还规定公学分中午、晚间两班，白天有事晚间学，晚间忙的白天中午学，做到家务劳动与上学两不误，家长、学生双满意。我们还宣布，可以带弟妹来学校（小先生负责照顾），也可以背着弟妹听课。还规定，学生因事、因病误了课的，我们派小先生登门补课，等等。这一系列便民措施，铁石心肠也会感动。因此，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他们感谢文惠老师们想得太周到了，表示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支持孩子上学。对孩子们来说：羁绊他们双脚的无形绳索剪去了，他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了，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招生布告张贴不几天，便有两百多人前来报名，盛况空前。

（三）

一些具体情况和潜在的不利因素。

一、人力问题。行知公学没有配专职人员，从校长到教师，全部由文惠老师兼职。这些同事都是文惠的业务骨干，多是秘密联络站的核心力量，本职工作够繁重的了，他们是在出色完成文惠任务之后，不顾身体疲劳、放弃休息的时间

来公学上课的。这种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至今思之，犹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无疑也有不利的因素。人不是铁打的，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有限度，超负荷运转，短期尚可，长期坚持确有困难。行知公学的持久性也就存在了问题。这在财力有限、人力紧张的文惠小学，是难于解决得了的。而当时我头脑比较热，对这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缺乏认识。后来，眼看着体质较弱的同志累瘦了，病倒了，心里才着急起来。

二、名称问题。开始曾打算取名“武训小学”，主要是取武训热心为穷人家子弟办学堂这层意思，后来，经过反复掂量，觉得这个名称有问题：其一，小学里面套小学，两“小”容易混淆，何况我们原来打算不仅办小学，将来有条件还要办初中或职业学校，如果用小学命名，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了；其二，我们认为，纪念武训远不比纪念陶行知先生有价值。武如土丘，陶似高山。文惠这帮蔑视权贵、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秀才们，对于武训向豪绅财主磕头下跪的一副奴才象，厌恶极了；陶先生不仅是全国闻名的大教育家，而且又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伟大民主斗士，学校用他的名字命名，意义十分重大。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学校正式定名为“行知公学”，并慎重其事地给学生制作了白底金边红字的布质襟章，与正规学校无二。学校命名的变化，反映了我们思想认识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也就是从幼稚到成熟的提高过程。当然，用这四个颇为刺眼的字命名，可能会招来一点麻烦。对此，我是有了思想准备的，甚至连辩护之辞，也打好了腹稿。假如有人想在行知先生身上扯是非，我

则“王顾左右而言他”，回答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校，主张知而后行，我们将这两者关系颠倒过来，主张行而后知，别无他意。但如有人要以“公学”两字作文章，我则准备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孙中山先生认为天下都可为公，学校怎么不可为公呢？公学者，众人之学堂也。文惠为街坊失学儿童办义务教育，顺乎情，合乎理，政府不奖励，不资助，于理不当，反来吹毛求疵，就更岂有此理了。我们想过，在民心和社会舆论方面，我们有得道多助的，站得住脚；更何况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何惧之有？因此，我们正气凛然地办我们的行知公学，根本不去理睬他们，就连正常的申请备案手续也不办它。我们大笔一挥，招生布告一贴，就开学上课了，干脆利落之极，痛快之极！

三、教材问题。行知公学主要设算术和语文两门课程。虽然我们也采用国统区通用课本，但只选择其中有益内容。我们的原则是：算术除教授加减乘除基本知识外，以学习实用知识技能为主，使学生懂得打算盘，会记简单的帐，能折斤计两，等等。语文课则采取传授文化与灌输进步思想紧密结合的原则，以讲授自编语文教材为主。四八年暑期，南宁师范学院的张谷（原桂师同学）等人途经柳州，我请他们帮选编了一本语文补充教材，供中高年级使用，其内容选自“马凡陀山歌”、“李有才板话”等进步文艺书报。这份教材，思想进步，生动有趣，好懂易记。讲的人带劲，听的人高兴，课堂效果不错，有的学生还把课本当歌来唱。我们发现，这些内容通俗，针砭时弊的课文，他们兴趣挺浓，学

来津津有味，这与他们的家庭环境及个人较早地接触社会，不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生活使得他们的思想早熟了。当然，我们的语文课也存在不少缺点：重视思想教育，忽视文化教育；重视国内政治斗争的实际，忽视儿童学以致用的实际需求；此外，自编教材系统性不够，循序渐进差，等等。

四、经费问题。行知公学一应办公用费，均从文惠开支。锅里有，碗里自然也有。前面说过，小朋友们的学习用品，是由文惠铁木耳儿童团发动文惠学生捐赠的。由于刘秀容同志领导学生开展学习铁木耳活动搞得好，友爱互助蔚然成风，只需一声号召，不要几天功夫，三百多文惠小学生，便将行知公学两百多人的所需课本、文具、作业簿等，一一解决停当了。表面看来，经费不成其为问题。但是，正是在经费的来源这个问题上，文惠小学存在致命的弱点，隐藏着危机，威胁着它的生存。文惠小学与行知公学，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惠的致命弱点，自然也影响行知公学的前途和命运。文惠小学是一间经济基础十分脆弱的私立学校，唯一经费来源靠收学生的学费。老校长在世时，将学费托人做生意，可以增值，加上董事长尹承纲在柳州，遇上困难可以找他想法解决，学校日子过的还算平稳。我接长学校之后，实行经济民主，财务公开。管钱的人廉洁奉公，深得教师们的赞许。但是，一介书生，理财终非其长，又不会经商谋利，学校经费出现了困难，左支右绌，若一旦形势发生剧变，学生少了，收入减了，董事长走了，学校就将陷入困境。那时候，支撑一个文惠就够吃力的了，哪能还有余力来顾及行知公学的呢？这个潜在危险因素，随

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对文惠生存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四)

行知公学坚持了整整一个学期。进入一九四九年，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淮海、平津两大战役，先后于1949年1月胜利结束。我百万人民解放大军，正准备南渡长江。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危在旦夕。国统区内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柳州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又系桂系后方重镇，估计会有场恶战。富商大贾，远走高飞，殷实之家，迁回农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各校学生锐减，文惠尤为显著，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为了保全文惠这一红色据点，我们采取了紧缩开支、精简人员、降低薪俸等应变措施，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宣告行知公学暂时停办，候机再行复课。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文惠不关门，行知公学就有恢复之日。我们认为，天快亮了，黎明之前的黑暗是不会长久的。一位诗人说的好，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寒夜，文惠老师们心头暖和和的，他们满怀兴奋之情，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向往着解放之后，在那“春风桃李花开之日，正是英雄用武时”的新社会里，大显身手，重振雄风，完成陶行知先生的未遂之志。

行知公学停办了，它犹如黑夜中一只小小的萤火虫，在拼命闪烁了一阵微光之后，自身便无形无踪地消失。但是，

柳州私立克强小学沿革

陈显达

一 柳州私立克强小学，初名楚材小学，取“唯楚有才”之意，为湖广会馆所创办。

湖广，为我国历史上行政地区：元置湖广行省，明置湖广布政使司；清置湖南、湖北两省。会馆，为地区、省、县同乡人旅居外地联谊组织聚会之馆所。

克强小学1929年开办，校舍仅用湖广会馆之一部份。开办时有四班学生，校长李泮源、教师赵国英（女）、周天枢均湖南籍。采复式教法：两班（不同年级）同一教室上课，一班作业，一班讲课。经费由会馆所有房地产租金供应。据1950年统计会馆所有房地产110余间：西门外马草坪至雅儒桥头有简陋厂房90余间；分部在柳江路、小南路、映山街等楼房铺户20余间。这些房地产来源，系旅柳经营手工业、商业的湖广老乡回籍时所捐赠；也有客死柳州，后事无人处理，由会馆办理丧葬后所留下的遗产。

旧社会以每年农历5月13日为单刀会，纪念三国时的关羽

（紧接上页）它那闪烁的微光，却映入了人们的眼帘，嵌入了人们的心头。在人们的记忆长河里，这微弱的萤光，是永远永远也不会消失的。 1987.2.28—3.2

“单刀赴会”，届时会馆值年理事主办纪念活动，大摆筵席，招待来自柳州及附近各县同乡，并在会馆舞台连续演戏二、三十天助兴。

1941年间，李泮源调柳江县教科任职后，校长由聂述和担任，1944年冬——1945年秋柳州沦陷，学校停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改名为克强小学，名誉校长覃连芳（曾任桂系军长，祖籍湖南）。校务主任冯健南（实际负责人），教导主任金梁。学生仍为四班，但从这年开始，每年初小毕业一班，就增办高小一班。

在此期间，学校曾遭火灾，烧毁部份教室，经覃连芳申请，救济总署柳州分署拨款，新修建了校门及五间教室和一小间单身男教师宿舍。

1949年11月24日，柳州解放前夕，冯健南、金静宜（庶务）夫妇，携家人往覃连芳家乡百朋暂住时，学校所收学米（当时学生学杂费折收大米四十斤），引起一伙不良分子觊觎，拥进学校企图抢走学米。幸得青年教师谢承贤（爱青会员）与谢荫春、罗永孝、陶建中奋起护校，保住了校产。

解放后1950年2月，我应克强小学校董会（董事长为杨义）任聘，并经市教育局批准，担任校长职务。当时学校仍为六个班，全校仅有教职工八人。会馆有三座大殿及偏堂等，而学校只用后园所建四间教室，其余地方楼上楼下均为同乡居住，他们都是用木制机织土布、毛巾的，成天机声嘈杂不绝。为了扩充班次，我们只得请泥菩萨让出殿堂作为教室，到1952年上半年，有高小四班，初小八班共12班学生。开始打破克强用人的地方观念，两年内先后增聘一批青年教

师，他们是：全德康、吕芳、吴嗣强、陈永贤、韦固、全美珍、曹玉琴、何金浩、刘德麟、张佩萱、查静敏、陈立平、杨镜晞、吴子浑、林秀萍、游若虚（校医）。这批教师，有部份为柳师毕业，大多数为柳高毕业，素质好、有朝气，教学认真。加上原有教职员：冯健南、金梁、金静宜、谢承贤、谢荫春、张志一、罗永孝、吴振武、罗铃川、罗汉松、陈文彩、唐辉周等共二十余人。

不久调整了学校机构，取消了名誉校长，因覃连芳解放前已往香港，取消校务主任职称，提升冯健南为副校长。任全德康为教导主任（金梁已考取艺专），谢承贤为训导主任（主管学生政治思想教育），韦固为总务主任，林秀萍兼会计，教导干事罗汉松，总务干事陈文彩兼管校产收租员，工友唐辉周。职责分明，为解放后新克强打好基础，1951年作了工资调整，总的要求是待遇略高于公立小学的处理。以求教职员在克强安心工作。

在教学方面，校长兼课、听课，每月总结并摘要交流教学经验，以提高教学质量。五二年高八班投考初中，仅一人未被录取。五一至五二年间全市小学生作文比赛，高八班学生简胜智、吕绰鹏、郭淑珍，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书法比赛，简胜智、刘耀喜分别获一、二等奖。学校课堂秩序良好，学习风气较浓。

在抗美援朝捐献中，全校师生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鼓舞下，踊跃捐献，在全市小学中名列第一。仅谢承贤老师就捐工资五个月。

通过政治时事教育，少先队有关知识教育，一九五〇年

三月，在全市首先建立少先队组织。五一年招考幼年空军时，本校十五岁的学生罗得喜，荣获录取，五年前回柳探问老师时已任空军某部飞行大队长。

大力开展文体活动，成立腰鼓队、舞狮队、歌舞队、话剧组，丰富学生课外活动。每次家长会后演出，均受到家长们赞扬，不少兄弟学校不断来校取经。

解放后会馆房地租金，日渐难收，学校开支困难，市教育局本着“民办公助”原则，拨款维持，首次补助旧币五百斤（今五百元）。但长此以往，终非办法。五一年向市教育局建议，将学校改为公办。局长沈章平，原则同意，勉励希望把克强不断搞好，以便接管。

解放前的克强小学，由于控制在地方观念浓厚的封建性质的会馆手中，用人行事，因循守旧，有“封建堡垒”的称号，解放后只有在党领导下，在全校教职工协力同心，努力工作下，在两三年内，才能以不平凡的面貌，展现于柳州教育界。一九五二年二月，我调离克强，改为柳州市立第二小学，由于钿接任校长。所有一百一十余间校产，移交人民政府接管。湖广会馆亦经动员撤消。

金田抗敌史料一束

莫兆端

一、二纵队全称 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挺进第二纵队。

二、少将司令唐纪（号际时）。上校参谋长汤济。参谋室上校主任张鸣霄，辖参谋六人，分管作战、情报、后勤三项业务。上校副官主任韦文富（不到职）。上校军需主任朱汉新。译电员二人，军法官一人。

三、司令部直轄有特务连一，通信连一，无线电台一，医务所一。

四、纵队辖：独立第二团，团长毛振铎；独立第三团，团长李华；保安第四团（该团在开赴前线时，另由长官部直接下令开往宜山，未参加作战）。

五、二纵队于1944年10月初在柳州组成，中旬开赴武宣，受夏威所部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周祖晃指挥（指挥部设在武宣城）。

六、第一次接受战斗任务是在桂贵石龙一线布防。当部队行至中途，改令扼守金田隘口，由三里渡河。10月25、26日进入作战地区。

七、司令部住东乡界顶以东约30华里的三江圩。前进指挥所在甘王庙（金田村与三江圩之间）。独立第二团团部在大宣（桂平县城北约20里）。以两个营沿浔江北岸警戒，警戒线

由弩滩以东直到桂平城北岸，长约40余华里。另一个营随团部驻大宣圩。独三团整团在金田布防，作纵深配备。

八、10月29日中午，敌人分股渡过浔江。独二团在沿江的警戒阵地被各个分划，形成各自为战态势，下午2时，便被敌人各个击破，部队溃散。此时毛团以电话向司令部报警。唐在电话中指示毛团长死守大宣。下午4、5点钟，敌人潜伏在大宣圩的便衣、汉奸即向团部突袭；敌人正规部队约一营多兵力，向大宣圩发动攻击。此后即未接到该团任何报告而失去联络。

独三团在金田进入阵地。29日黄昏，敌约1个联队（相当于团），向我金田阵地发起进攻，30日凌晨，阵地左翼一角被敌突破。李华团长组织兵力，由副团长陈绍禹指挥反击侵入之敌，数次被敌击退。白天战况沉寂。我军调整阵地，用迫击炮连和两个重机枪连封锁隘口。30日薄暮敌人主力进攻。午夜，独三团主阵地制高点失守。我军死伤不多，但溃散则不少，在甘王庙布置第二防线之时，兵力已不足两个营。31日上午约10点，毛振铎团长带领余部不足一连回到司令部。独二团第二营损失不大，唐令该营王法式营长即驰回东乡界顶占领阵地。准备掩护纵队撤退。31日下午3时许，颜增武师长拨两个连归李华指挥，以加强该团战斗力。司令部撤到界顶东侧的石狗村。31日午夜，敌人渗透到司令部附近，将司令部与独三团分割。11月1日凌晨。唐司令决定放开正面，退入大瑶山（象县大樟乡以东）的东昏村。整个部队兵力勉强编成两个营。司令部与武宣副总部失去联络。11月2日早，在界顶布防的王法式营与敌接触。2日中午，

唐派参谋莫兆端赶到大樟乡公所，用电话请示周副总司令，奉指示：纵队绕道回东乡据守界顶。3日早，邓龙光派一个师兵力接替王法式的防线。纵队经庙皇、象州、马平圩、经穿山回柳州整理。

统计：二纵队从10月29日中午起，到11月3日早，独二团只打了半天；独三团与敌激战两天两夜。王法式一个营打了一天一夜。

九、参谋室主任张鸣霄与参谋覃一岷临阵脱逃。唐下达手令参谋主任职务由参谋莫兆端代理。11月1日凌晨，唐司令放开正面，使敌人直扑界顶，是最大的错误，所以1945年1月中旬在百色举行的战区柳州战役检讨会上，唐纪被扣解重庆审判。日寇投降前得到释放回柳。

十、11月12日，二纵队开抵迁江，独二团驻韦里警戒，独三团守柳邕公路上的清水河渡口。14日下午，与由南宁北进之敌接触，抵抗到当天午夜，奉命撤退。此后再未与敌接战。军次白马圩，始得彻底整编。独二团只编成两个营。独三团仍维持三个营的建制。但每营只辖步兵二连，机枪一连，迫击炮一连。

十一、12月中旬，开抵天保，奉命向靖西方面警戒。桂林失守后，守城的170师下落不明。夏威乃令二纵队改称170师，唐任师长。

1945年3月军次都安，许高阳的170师残部亦驻都安，二纵队被归并于许高阳。许只收兵而不要官，因此编余军官大部资遣，少数列册入田州第五军官总队为队员，待命安置。莫兆端是其中之一。

十二、二纵队自成立起被归并止，只有五个半月。

抗战时柳州沦陷前夕的回忆

黄克群

我于一九三七年参加上海抗战受重伤入院医治。一九三八年伤愈奉调回桂，派任第十七团管区副司令。不久，日军进犯南宁，柳州告急，柳州成立游击队，命韩绍奇任游击队司令，我奉调任游击队第三大队长。该游击队辖五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分队，全大队士兵共600人，分布在百朋、小山、成团、太阳村、凤山一带山区驻扎训练，为时数月。南宁方面日军撤退后，该游击队奉令撤销。所有官兵大部分拨交第五战区。仍另有一部分官兵拨交柳州民团指挥部编成第一、二两个特务大队（即警卫大队）。我任第二大队长，驻柳市训练。是时，黄季桑任民团指挥官。一九三九年，柳州民团指挥部奉令改编为柳州保安司令部，尹承纲任司令官。原民团指挥部所属两个特务大队官兵拨交第四战区。我改任保安司令部副官主任。

一九三九至四四年，柳州沦陷前，尹承纲任柳州行政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警备司令、防空指挥官。保安司令部继承前民团指挥部工作任务，办理调征、训练征兵。

一九四四年十月间，日军由湖南、广东进攻广西，柳州已成战备状态，此时我任广西省保安第三大队长，配属柳州保安司令部指挥。因战况日益加剧，柳州保安大队奉命改编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第二纵队第二团第二营，唐纪任二纵队

司令。冯世芳（字伯荣）任第二团团长，副团长为姚延杰，覃瑞霖、黄克群、苏焕章分任第一、二、三营营长。我团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命令，负责掩护柳州军民撤退，驻鸡喇、升官塘、三门江、鹧鸪江一带至柳江东岸高地，阻止敌人前进；并将柳州市内之铁桥、浮桥、电厂等概行彻底破坏，以免资敌；督促市民迅速疏散，实行坚壁清野。

冯世芳团当机立断，命令：苏焕章营负责鸡喇、升官塘一带高山；覃瑞霖营负责三门江西、南岸高山；黄克群营负责鹧鸪江（今柳师后面）一带高地，防止敌人沿铁路向柳州前进，并派人破坏铁路大小桥梁及酌情沿铁路、公路设置障碍物，团部随第二营营部驻黄村小学（今油脂公司）。

我受命到鹧鸪江，即命第七连连长蒙汉明率兵破坏铁路沿线所有桥梁，在铁路要冲处设置障碍，同时派便衣队六名，随带报话机到洛埠附近高地监视敌方行动，随时报告敌情；我亲率五、六、八连在鹧鸪江渡口、凤凰嘴、回龙岭一带构筑防御工事。

此时敌人正在包围桂林，但我团一、二两营长接收征兵尚未回齐，兵员不足，实难负担守土重责。团长冯世芳、副团长姚延杰，第一、三营营长覃瑞霖、苏焕章等四员已不知去向。我抱定死而后已的决心，坚持抗战到底。

我一面将情况电报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夏威，并请示我团今后任务和行动。一面自行代理团长，亲临各据点视察，督促加固防御工事；在第一、三营防守阵地各派兵一排继续坚守，阻止敌人渡河；接着派人破坏铁桥、浮桥及电灯，并催促市民紧急疏散，对柳江河面所有船

只，强行疏散到运江以下小河港内停泊；又派人在各街道上巡逻、维持治安。时为十一月七日，柳州已变死城。

夏威夷来紧急电报，命我接任团长职务，率领官兵在原指定地点，阻止敌人渡河。

十一月八日早八时许，突然接得夏威夷来电命令我团放弃柳州，相机向南丹方向撤退。我立即命令各据点守兵于十一月八日晚九点钟作秘密行动，向拉堡迅速撤退，并限于九日上午八点钟以前到拉堡荫蔽集中待命，以防敌人追击。从此我部决定：由拉堡经成团、土博、南乡、洛东、里苗、北三、白牙到达河池听命。我营保存实力，完整无恙，但次日柳州即告沦陷，又一大片国土遭到日寇蹂躏。

编者按：本刊本期刊出黄克群、谢贤修两位老先生记述抗日战争期间柳州沦陷前后国民党军队布防和溃退情况的文章，在某些事实的回忆方面互相略有出入。为求实存真，请知情人阅后提出补充和订正，把当时的历史面目弄得更加清楚。

抗日时期的柳州制革厂

卢钟明 金炳礼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入侵广西。原南宁制革厂于1941年迁来柳州窑埠，随在九头山、柳江河畔建立新厂。

1942年新厂房建成投产有准备工程、鞣制工程、整理工程、制鞋制箱及动力等车间，设有柴油机、转鼓、辊压机、刨皮机、打光机，并在河边设水泵船抽河水自用。

本厂属广西省营企业公司。窑埠厂址是租用民房数间作办公及堆放机器设备，又修理附近一个岩洞放置成品。在窑埠临时设有营业处。

厂内设总务、会计、生产技术、化验等科室，市内有营业门市部、设于培新路（当时的广西银行对面）。

厂经理卢景肇是留美国回的制革专家。一九四四年夏病故，由原总务主任王荊桥继任经理。

厂内人员简介：

经理王荊桥：中山大学毕业，广东人；

工程师黄杰：广东勸勤大学毕业，武鸣人；

助理工程师：卢钟明、金炳礼、李超民、均系中山大学毕业，李系广东人、卢为桂平人、金炳礼是柳州人；

会计主任：黄道茂、南宁人；

技术员刘春露、广西大学毕业、后转中学任教、柳州人；

生产主要以牛皮为原料，产品有面革（珠皮）、带革（箱皮）、底革等。

抗战期间，皮浆、软皮油、鞣料等，来源短缺，依靠全厂职工，就地取材，用牛尾树皮、薯蓣、五蓆子鞣制底革、带革。并配制一些皮浆、软皮油等，制成较优的面革、带革和底革。各种皮革除销往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各地外，一部分由制鞋、制箱车间制成皮鞋、皮箱及一些军用皮革制品，直接在市内销售。

1944年冬，日寇进犯柳州，制革厂被迫从水路疏散，迁往维客运江圩，不幸船行至导江时与日寇遭遇，日军掠劫工厂全部财物，并将机器设备倒入江中，强夺船只载运日寇渡河，数十名职工亦被拉去做苦工，以后生死不明。

1945年秋部分职工转回柳州恢复生产。王菊桥未回厂，由工程师黄杰，卢钟明负责领导经营。但设备全部无存，只靠手工少量生产。

解放后由广西人民政府工业厅接管继续生产。及至1951年底，由于皮源短缺，上级决定停产。全厂职工由柳州市另行安排工作。

柳州沦陷时保二团的撤退和 在宜山作战溃散的经过

谢贤修

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寇进逼，桂林大撤退，广西绥署撤出桂林后，大火燃烧全城。绥署迁到柳州，即把四个独立团和几个专区的保安大队改编为两个纵队。派参谋处第四科科长冯世芳（号伯庸）为保安第二团团长，我当时在参三科当参谋，就命我为少校团附，由来宾县调姚延杰任中校副团长。团部设立于东大路琴园。第一营中校营长张景德，第二营少校营长黄克群，俱率部下原保安大队人枪归编。当时张景德（柳州人，住文武巷）见部队编入第二纵队战斗序列，他坚决辞职，营长一职就由副营长吴成福代理。第三营未调到，全团就只有两营实力。我介绍柳州人白日光为军医主任，封应邻、孙绍兴为军医，戴某为通信排长，李灿高为军需主任。第一营住河南，第二营住河北。

十月下旬，情况紧急，纵队司令唐纪奉命开赴武宣东乡布防，阻击日寇。冯伯庸以人员未齐，不去武宣。如柳州失守，则开往宜山与纵队集中，希望保存实力，原来也是没有作战任务的。十一月二日，闻武宣桂平作战的第一、二纵队战斗激烈，失利后撤，冯伯庸将部队集中柳江河南。十一月六日，江水猛涨已无浮桥，我乘小艇渡河。七日晨，冯团长也到河南，在柳邕路见到柳江县府警佐冯华堂，赠送了多余下的枪枝弹药给冯警佐。

七日中午，全团人马取道西陂向洛满前进。当晚住太阳村，次日到洛满的水潭村住宿，冯伯庸送他的家属在水潭村避难。因该村在丛山之中，不明外间情况，住了两夜。黄营长见情况急迫，不应在此逗留，叫我转达意见，立即向宜山进发。九日晨，在水潭村街口已闻洛满有枪声，我团遂白鱼窝狼洞，南乡取道小路赶往宜山。

十日下午，到达洛东附近，即闻枪炮密集，竟与日军相遇。我团第一营在前，立即占领阵地，阻击日军，当时日军炮弹猛烈向我射击，机枪亦密集扫射，我第一营官兵勇猛还击，团指挥所亦遭炮击，在我身旁的士兵被炸掉双手，鲜血淋漓，我即着人送救护所包扎。随即又接报告第一连连长梁元亮阵亡。此时究竟有多少敌人，两翼情况如何，俱不清楚，只好坚持到黄昏，全部撤退至洛西后面山上。是夜宿营，议定次日一早趁敌人在友军阻挡下未进宜山之前我团抢过宜山。十一日黎明进发，至九时许到达距宜山十余里处，遭到先占宜山之敌伏击。这时是团部和第一营在前，被敌机枪猛扫，死伤狼籍，通讯排戴排长阵亡，副团长姚延杰左膀受伤，军医主任白日光伤脚（被日寇俘虏，死于柳州），团部与第一营官兵在敌人四出搜捕下彻底溃散，我与孙军医伏草丛中幸免，当夜潜返洛西山中，后知四面皆敌，在山中数日，幸农民通信找到冯伯庸，他把流散的士兵和枪枝武器送与当地的抗日自卫队，待机以定后图。

第二营黄克群在后闻报，即转移山中，不敢逗留，遂取小路过忻城北山北牙，转赴都安。该营因此保全。

柳州光复后，冯伯庸，姚延杰和我一同去见绥署参谋长张任民，汇报经过，张说“算了”不久冯伯庸被任命为靖西专区保安副司令之职。

柳州市被日寇焚烧破坏图说

彭 德

日本侵略军1944年11月9日占领柳州。1945年夏，随着德、意法西斯的覆灭而相继败亡，终于6月29日撤离柳州城圈。

日寇退兵前一个月，预先陆续烧毁近郊所有各仓库物资——如鹧鸪江火车站、大桥干训团（接近洛维农场）、三门江林场、飞机场及标营等许多地方，每夜烈焰冲天。到6月下旬撤出柳州前三天，公开布告实行放火烧毁柳州。首先将城区原来繁盛的小南、庆云、培新等主要街道，付之一炬。

河南方面：

今驾鹤路临江一带房屋，东起驾鹤山西麓今河沙公司以西，包括河边巷，烧到汽车渡码头，河南下街仅存一两间地基较高的青砖封火墙房屋。对面从太平东街路口天主堂左侧及红十字会医院第二门诊部起，向西烧到鱼峰路口。鱼峰路从今之柳江大桥头路口烧到今鱼峰区政府、工商银行、郊区税务所。太平东、中街（今前进路）全部被焚。今光明路原是板木房屋尽成灰烬。

谷埠路接近今工人电影院后面的房屋被烧毁一部分。立鱼峰下今鱼峰小学右侧。原美军招待所设的娱乐厅，烧剩一座空架子，屋顶残留几个招牌的铁皮字母。柳邕路口今加油

站及其后面的小巷，大部分民房烧得七零八落。文笔路和云头岭烧得所余无几，尚存旧法院和看守所。

九头山今社会福利院，原是广西省企业公司柳州制革厂，日寇军利用其厂房，大片草地及四面环山的有利条件用作军马厰，但日寇军慑于当地民众力量，自己又远离市区，孤立无援，逃命为先，制革厂赖以幸存。如谷埠街和西闸一头，已经安排了日程还没来得及烧就狼狈鼠窜了。

至于半山酒店、天主堂、及驾鹤山麓部份房屋，是敌军司令部、宪兵队、维持会、县府、公安局等所在地，尚未烧到。

河北方面：

东西向街道柳江路全街房屋几乎烧尽，所剩者不过新柳江、马两益等三几间幸免。兴仁路今红星戏院右侧烧掉几间，又从商会（今市政协所在地）右侧及其对面往西烧到小南路口。位于从柳新街通往柳江路的挑水巷口侧边郭万福三家，因有人在家扑救，幸未成灾。

东大、庆云路从培新路口往西烧到今柳州商场附近，仅存基督教宣道会。今柳州商场左侧及其后面的天星巷、皇荡巷烧得七零八落。公园路至景行街除今之文联（原图书馆），公园路幼儿园（原柳东镇公所）、斜对面39、41两家砖房、今柳江饭店一带、文武巷口一带、清真寺大殿无恙外，其中国国民党县党部、湖广会馆，黄庙、县中，俱遭火劫。

连塘路从现在的五一菜市菜店往西烧过柳荫路，柳荫路的特察里（娼妓馆）一直蔓延到雅儒桥头。

南北向街道文惠路接近东大路口烧毁一段，面对柳侯公

园露天剧场的平房烧掉三家。培新路房屋大部分被毁。今已改建成“鸳鸯楼”所在地剩余一两间。正南、潭中、北大路烧得一塌糊涂。龙城路也烧得零星落索。小南路全归于尽，显而易见的是广芝堂药店，现在从街中仰视其三楼，尚可见劫后余窗——孤立着的三个窗框。福兴昌酱园（今螺钉厂）的铺面与后进，中间隔着一个晒坪，阻断火路，后进房屋未受株连。青云路的几条小巷多是板木房屋，日寇军侵入柳州时先被焚烧，顷刻化为灰烬。

这一番，烧去柳州南北两岸的大小房屋三千余间，占房屋总数的75—80%，一片焦土，触目伤心。其余虽未遭焚房屋所有的大门、窗片、梯板、楼板，板壁，全被拆除当柴烧了。十室九空，破坏极端严重。

值得称赞的是：当东门城起火之时，住东门街年届七十六岁高龄的熊应辅老先生挽起桶水，直奔城楼扑救。但无济于事。龙老先生情急智生，用双手掬水含喷，最终把火压息。今日东门城楼得以完整保存，实赖熊老先的威力所救。

柳州光复后，捉获伪公安局长大汉奸石补天归案，开庭公审。经证人指明当时石补天率领小汉奸四处放火，罪恶滔天。结果。国民党法院竟判处石补天“无罪”，实属怪事！汉奸国贼，分明是共穿一条裤子的。

日本帝国主义给柳州人民，中华民族造成的灾祸，为中国人民应切记勿忘的！

解放前柳州的兵工厂

彭 德

一九三〇年以前，广西尚无象样的兵工厂，只有一些修理破旧枪枝的修械所、翻新逼码（枪弹）的手工场。这种落后的作坊，远远没能适应形势需要，桂系加紧筹建新型兵工厂，由来已久。一九三〇年间，滇、粤军阀混战，当时广西军方面土造的木柄手榴弹，发挥了重大威力，李、白非常赞赏。事后任命赖瑞麟当主任，在南宁首创军械部，监制大批木柄手榴弹，库存满满。足够全军每名兵士平时配备四颗。这时，广西开始出现专业性的小型兵工厂了。

桂系军队沿用北伐时期“第四集团军”、“第七军”等番号，全军更新武器，向德国购进大批的新式七九毛瑟步枪，将过去使用的旧式汉阳造七九步枪，少数发给民团。为了统一枪械口径，其余的六八步枪、双筒、单响、大十（即上满九颗进仓、膛内可上一颗子弹，又叫十子连）之类老家伙，完全淘汰。更在南宁成立机械部，制造捷克式七九轻机枪。还附带生产少量八二迫击炮。桂军编制乘势扩充机枪连、机枪班、炮团。每排增加一个机枪班，每班配备轻机枪两挺。果真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了。

一九三三年李、白投资七百万银毫，在柳州蟠龙山与灯台山夹谷之间原广西上敏土（水泥）厂旧址兴建柳州制弹厂，分设枪弹部和炮弹部。委任王仍之当厂长，徐冠池当枪弹主任，马国恒当炮弹部主任。王是江西人，留学法国攻读炮

科，由他亲身主持炮弹生产，平均日产八二迫击炮弹（也生产少数九一迫击炮弹）达五百颗。生产七九步枪弹（并生产部份射击坦克车、装甲车用的钢芯弹头枪弹），平均日产量四万颗。若达不到指标，要加班加点补足。制造枪弹机器是德国禅臣洋行输入，它自动化程度较高，当时在远东居第一位、在世界上居第四位新式。全厂职工一千二百多人。所需原材料如：枪弹头的镍钢孟、合金钢枝（钢芯弹头用）是从捷克进口的。枪弹壳的黄铜孟、黄铜板、无烟火药、迫击炮弹的炸药也是向国外省外购进的，平时必须充分准备。这样，每年所需材料、半成品，和军械库存的成品，及所需工资、管理费用等等，实是桂系一笔浩大的军费开支，也是压在老百姓肩上的沉重负担。

七七事变，抗战开始；蒋介石乘机把各地兵工厂纳入蒋记体系。柳州制弹厂统一编号为四十兵工厂，派刘守愚当厂长刘是一个鸦片烟瘾很重的大道友，总务科长赖洪杰是同道中人，日夜奉陪厂长吞云吐雾。

桂系保留的一间军用雨衣胶布厂不让收编，从南宁悄悄搬到柳州，几经选择，没有适合的地方住脚，便迁到桂林象鼻山下复工，改头换面，生产民用橡胶产品为主。从华东搬来的专业研制、生产防毒面具的归属中央编为第四十二兵工厂，在今窑埠区卫校内山洞里开工。

一九四〇年冬，南宁沦陷，日本侵略军进逼迁江，柳州震动。蒋介石匆忙命令在柳州的第四十兵工厂、四十二兵工厂，设在融县（今融水老君洞里）的从广东石井迁来的第四十一兵工厂速迁四川！顺顺当当收归他掌握之中。桂系对此

虽极不情愿，无奈局势临危，装箱起运。桂系苦心经营多年的对抗手段，一旦自送老蒋。等到桂南祝捷，柳州转危为安，可这批兵工机械，早已入川了。李、白如失至宝。

抗战胜利结束，李、白、黄俱授要职，无须与蒋介石继续抗衡，没有再置私属兵工企业之必要，至于战后的柳州虽有第三十兵工厂之类，乃是修理性质的厂场，不复往日的庞大旧貌了。

注：作者一九三六年在柳州制弹厂当学徒。

质疑 订正 补充

一、《柳州文史资料》第四辑

（1）封面

朱 蒂画竹，落款字迹模糊。原为：画用老可（宋代名画家文同字与可）、老坡（苏东坡）二法。

（2）10页10行“三花”应为双料。

10页11行“双料”应为料半。

（3）44页8行“韩嗣瑞”应为韩世瑞，（原沙塘小学学生陈国庆1987年4月来信提）。

（4）53页倒4行“全文华”应为金文华（卫生局梁汉隆来信）

二、《柳州文史资料》第三辑

242页第二自然段：“十二月初，在柳江县里雍乡，走投无路的秦镇……中旬一个傍晚，到了高（天骥）的住宅……”

1987年秋，刘启焕来信，说：“秦镇不是从里雍直接到柳州投诚。他事前来信征得我父亲刘克初同意到双桥圩刘克初的别墅暂住数日，之后，刘克初从城里叫肖国志到双桥接秦镇到柳州投诚。”

按：朱焕章、刘启焕所写的、说的都是事实，仅时间的前、后不同。

三、《柳州文史资料》第二辑

（1）63页9行第14、15字应为决徙。

（2）99页14行“潘屢芝”应为潘履之。

（3）144页4行“黄萝年”应为黄梦年。

（4）127页2行“十余万”应为上万。

（5）131页11行“鲁地”应为鲁比（村名）。

（6）132页3行“陈明仁、覃连芳”应为陈金城和 牟廷芳。

（7）132页倒4、5行“委韦日上为柳州警备司令”应为：委韦日上为柳州警备副司令。（摘自韦日上遗札）

编 后

1987年是抗日战争暴发50周年。我们征集、编辑了以反映抗日战争在柳州的史实为主的一辑文史资料，让读者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整个民族和柳州市带来的深重灾难，了解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柳州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坚持民族大义奋起抗战的业绩，了解抗日战争期间柳州各方面的变化。在征集编辑这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得到民革、民盟、民进、民建、工商联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柳江县政协和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今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柳州解放40周年，又是柳州建城二千一百周年。我们期望各界仁人志士的支持，征集到更多更好的反映柳州二千多年来发展变化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柳州解放前后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社会各方面斗争、变化的历史资料，以便编印成集，传诸后代。

热切地盼望着各方面关心柳州文史工作的朋友们惠赐大作！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柳州文史资料 第五期

作者 =

页数 = 1 4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